

Between HOPE and HISTORY

希望与历史之间

迎接21世纪对美国的挑战

Meeting America's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BILL CLINTON 比尔·克林顿 / 著



金灿荣 邱君 张立平 王荣军 / 译

海南出版社

前 言

历史惯于考验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概莫能外。这就要求我们在希望与畏惧之间，在想象事物应该如何和接受现实这两种态度之间，作出正确的抉择。1996年7月27日，星期六，凌晨1点25分，一个粗糙的雷管炸药轰然爆响，震撼了亚特兰大百年奥运公园的夜空。一位无辜者丧生，多人受伤。人性中最光彩的一面和最卑劣的一面在这一瞬间同时展现给世人。就在世界各国搁置分歧，以卓越的表现来共庆奥运盛典的神圣时刻，人们得到警示，那些法儒而邪恶的势力还在活动，正在向我们的信念、价值、甚至生命发起挑战。

悲剧发生后的数小时内，每一位运动员，每一个运动队，每一位会议组织官员，每一位参加夏季奥运会的人，都必须就如何对悲剧进行反应作出自己的选择。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人们看到了百年奥运盛会最了不起的胜利的一幕：希望战胜了畏惧，对奥运精神的永久期待战胜了恐怖。奥运会场的每一个席位都坐满了人——运动员们准备好发挥最佳水平，观众们准备好为他们加油鼓励。

爆炸和由此带来的恐惧不会使信念坚定的人消极无为，不会使那些对将来有明确认识的人迷失方向，也不会摧毁决心奔向胜利的人们的意志。相反，只会增强我们的信念，澄清我们对未来的展望，坚定我们的决心。

奥林匹克运动向美国展示了它最光辉的一面，向世界展示了我们希望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生活方式，来自不同国度、种族、宗教和部落的人们，都遵循奥运规则，尊重对手，竭尽全力追求佳绩。奥运会还提示我们，甚至在最神圣的时刻也难免出现破坏势力，这也就告诉了我们要如何去对付他们。

历史常常要求美国作出选择，使希望战胜恐惧，使崇高意愿战胜消极倾向。在每一个时代，美国人都要迎接历史发出的挑战，并且在接受挑战的时候，忠诚于我们立国的价值准则，坚持人们缔造其生活所需的希望与梦想。

以我们的时代为例，保持领先地位意味着要与盟国一道在波斯尼亚建立和平，尽管我们的战士要为此而承担风险；意味着要在中东地区支持抱有良好愿望并愿意创造和平的力量，尽管这里发生了暗杀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这位英勇的领导人的事件；意味着要与前苏联的那些奋力前进的新兴民主国家站在一起，尽管那里的进步并不尽如人意；意味着要坚定地反对恐怖分子以及其他分裂破坏势力，尽管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将面临痛失生命的悲哀和重建生活的任务，正像俄克拉荷马城爆炸发生后我们的处境那样；意味着我们要团结一致，以确保使我国的公民及其家庭和孩子过上最好的生活所必需的手段，尽管有人想使我们放弃责任。

我国的公民总是使美国保持高标准，我们因此而得到了丰厚的回报。美国是而且必须永远是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个人的梦想能够成真，勤奋工作的人们能够成功，不同观点和不同历史传统的人能够共同生活并且共同成功；在那里，通过尊重不同意见和共同承担责任，我们能够在自由和机会方面获得金牌。

差不多4年以前，我进行了就职宣誓，那时我就决心使美国继续保持高标准。首要的是，我想让“美国梦”在美国重获生机，并使每一位愿意为此而努力工作的人都实现“美国梦”。其次，我想使尊重（甚至爱好）多元化

并且基于多元化的美国，成为更强大的国家共同体。第三，我想通过保持为世界和平。自由与繁荣所必需的最强大的力量，来确保美国获得持久的安全。

美国的政治辩论已经趋于极端，充满陈词滥调，并且常常与我们面临的挑战毫无关系，这种状况持续太久了。公民们经常被迫在两种错误论调之间进行选择。一派论调看来是认为政府应该花更多的钱，而旧的官僚机构仍然按原样运转。另一派看来是认为政府从来就是不好的，只要摆脱政府，让人们自己照顾自己，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在我入主白宫前的 12 年间，后一种观点主导着美国政治，不过同时也部分地受到持第一种观点的人的制约。这种思维方式给我们带来什么结果呢？结果是我们经历了 30 年代“经济大危机”以来就业增长最缓慢的时期。仅仅 12 年间，我们的国债就增长了 4 倍。不同种族和不同的民族集团更加对立分歧。更成问题的是，我们是否有决心支持美国在冷战后的世界继续发挥领导作用。

对我来说这一点是明确的，假如要使我 21 世纪美国的期望变成现实，我们就必须打破过去的思维方式，就必须面向未来进行新颖而大胆的尝试；而新战略必须植根于美国的三种基本价值观中，即：确保所有公民都有“机会”充分享受其生活；期望每一位公民都承担起抓住机会的“责任”；在“社区”集体中共同工作以使全国团结一心。这三种价值观塑造了我们人民的特性，确保了国家的成功以及我们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它们是构建美国的基本条件。

我们中的多数人是在生活中学到这些价值观的，包括在家里、在学校、在工厂、在宗教场所以及在与邻居和朋友的交往中。每一位美国人的成功的故事都有助于加强上述价值观念的普遍吸引力。我本人对于这些价值观的信念植根于我看到和听到的一切，早先来良我母亲和祖父母那里，还来自老师、布道牧师。其他关心别人的大人以及朋友们；此后，则来自我与之一道工作并为之服务的美国同胞。这一点始于我的家乡阿肯色州并延续至今。

在白宫的近 4 年时间里，我做的每一件事无非都是运用这三种价值观（机会、责任和社区）来回应挑战。每当作出抉择的时候，我都要抱心自问：这一决定会给人们更多的机会以充分享受人生吗？会使各位公民承担起对家庭和对工作的责任吗？会使我们跨越隔阂而更加团结吗？

在我对或许是去年最有争议的问题作出决定时，这几种价值观发挥了很大作用。当时争议的焦点是如何削减联邦财政赤字和平衡预算。近 4 年来，我努力促成在一系列广泛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上形成新的共识，其中包括对平衡预算的共识。人们认识到只有平衡预算才能保持低利率并促进经济增长，才不会给后代留下债务负担。不过，一年前这种共识受到国会削减预算的威胁，因为当时在平衡预算名义下提出的削减计划，损害了医疗照顾和医疗补助计划，损害了教育和环境保护，并威胁到劳动家庭的养老金的安全性——所有受到攻击的方面原本都是我们对他人应有的责任。

我致力于减少政府的浪费并平衡预算。我们的政府是 1840 年代以来连续 4 年减少赤字的第一届政府。我们把赤字从 2900 亿美元减少到 1170 亿美元，削减幅度达 60%。而且，我过去和将来都不会允许通过这样一种预算：它使我们的老人、穷人和青年人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它扩大我们努力缩小的社会裂痕；它有损于我们的人民在新的世界经济中的竞争能力和成功机会。总之，由于它减少了机会，放弃了责任，减弱了社区团结，因此我只能否决这种预算案。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努力奋斗以保护那些遭到攻击的计划。为了

诸如《家庭和医疗休假法》和《布雷迪法》之类的计划，为了反对国会解除攻击性武器禁令的企图，为了把 10 万警力投入街道的计划、学校反毒品计划、国民服务计划，为了国内和平队和环境保护法，我已经进行了战斗。围绕这些问题和其他倡议而展开的斗争，是关于我们是否履行对他人的义务、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变得更加团结的根本性斗争。这些倡议以及它们所代表的义务目前保险可靠，但是要使它们在未来也保险可靠，我们就必须团结一心并忠诚于这些基本价值观：机会、责任和社区。

我们生活于充满多种可能性的时代，然而，这同时也是艰难转型的时期。在我们从工业时代跨入信息时代、从冷战进入地球村的时候，变化的速度和幅度都是巨大的。信息、资金和服务可以在一瞬间流向全球。一种普通的福特公司金牛座牌汽车上的计算机功能，就比尼尔·阿姆斯特朗登月用的“阿波罗 2 号”飞船上的计算机功能多得多。在今天，孩子出生的时候，传统的读书方式就已经过时了，有 1 亿多人已在互联网络上阅读和工作。甚至我家的小猫索克斯都在“万唯网”上有自己的家庭主页。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的机会异常丰富，较之以前任何时代的美国人，今天的孩子们有更多机会使梦想成真。

不过，这个时代的挑战也是异乎寻常的，失败则会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们今天的行动将决定明天的美国人拥有什么样的工作，将决定我们的企业在全球经济中具有怎样的竞争力，还将决定我们的孩子（特别是其中最贫穷的孩子）为日后成功所作的准备如何，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未来的安全保障和健康保障如何，以及今后我们城市的街道在多大程度上是安全的，我们如何保护我们的土地、水和空气，还有在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上如何确保我们国家的安全。

这些挑战是真实而深刻的，我们文化传统中的许多方面似乎正在遭到攻击，有时候这种攻击起源于我们经常享受的大众娱乐活动，我们中有太多的人（既有孩子又有成人）得不到向善的引导。我们获得的新闻和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是我们却常常怀疑其真实性。这种怀疑主义可以导致对一切事物的玩世不恭，包括不相信最基本的社会制度（特别是政府）对我们有什么用处。

在世界其他地方，虽然核武器的威胁正在消逝，新的威胁却正在形成。我们社会突出的开放性，使我们易于受到新的跨国破坏势力的攻击，这些破坏势力包括有组织的犯罪、毒品卡特尔，包括生物和化学武器在内的危险武器的蔓延以及所有这些破坏当中最邪恶的恐怖主义活动。

我们工作和生活于其中、并且使我们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世界正在经历着的变化，就其速度，或就其范围而言，都是空前的。尽管如此，不久前的历史仍可以给我们目前的状况提供某些启示。

差不多就在一个世纪以前，美国同样处在一个深刻的、有时是前后矛盾的变革时期。随着我们的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大批人群从农场涌入工厂，从乡村涌入城市，人们抓住了新的机会，但是同时其生活方式也经历了脱离传统根基和陷入混乱的巨大痛苦。

工作的性质改变了。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们，现在必须严格遵守工厂的时间表——经常是白班和夜班相交替，而且许多工厂的条件常常是不安全的。老式的工作消失了，新型的工作在出现。随着铁路和电报的发明，过去常常是与世隔绝的自给自足的小乡镇，发现自己与外部世界联系在

一起了。随着城市的扩展，随着新城区在整体上的扩大和旧城区得到改造，城市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不过也有许多城区变得过于拥挤、肮脏不堪、缺乏安全。人们为眼前道德水平的退化感到担忧，并发起运动去支持他们认为正在动摇的价值标准。

一百年前，公众要求全国一致行动以对付迅速变革带来的挑战，结果导致产生了“进步运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为该运动摇旗呐喊并提供方向性指导，他致力于确保自由市场体制为所有美国人服务，保护人们不受工业时代弊病的危害，保护国家的自然资源，改革政府，以及确立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西奥多·罗斯福以及后来的伍德罗·威尔逊，都在思想上超越了各自的政党界限。他们决心运用美国政府的权力，确保美国在新时代来临的过程中获得益处，如此，我们才形成国家保有大同，人民保有个性化的格局。而在此过程中，《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所表达的理想则再一次对新时代产生影响。进步运动表达了关于美国能够怎么样和应该怎么样的共同愿望，昭示了关于如何纠正家庭破碎和社区分化的弊病，关于如何驾驭变革的力量使之服务于个人的梦想和全国共同的目标。今天，引导我们前进的仍是这些共同的愿望。

面对使人困惑、节奏紧张、有时是不可抗拒的变革，人们作出了不同的反应，那些试图逃避未来的人，或者想让时光倒流，或者在变革中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传统。而那些拥抱未来的人，则欢迎一切变革和挑战，并且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法官曾经说过的那样，投身于我们时代的“行动与激情”中去。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今天的选择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在本世纪的每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们国家都面临这种抉择——是拥抱未来还是拒绝接受未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平息之后，我们的历史进入了一个痛苦转折与普遍忧虑的时期，当时最受欢迎的作家司科特·菲茨杰拉德说过，这一时期的人们在成长的时候发现“所有的神都死了，所有的战争都打完了，所有人类的信念都动摇了”。美国从世界事务中脱身出来，在孤立主义与保护主义中寻找安全寄托。在国内，我们也向后退缩了，退缩到种族偏见与偏执行为的壕沟中，放弃了对我们的公民和经济体制的保护。10年之后的1929年，长达10年之久的冷漠无为终于导致“经济大萧条”。此后不久，我们明白了自己并不能与受到独裁者威胁的世界完全分开，我们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了。

在那次大战结束之际，我们作出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选择。我们决心团结一致奔向未来——不仅实现国内团结，而且与世界其他民族团结一致。依循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的传统，我们支持这样一种看待我们自身和我们的民主政治的观点，即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所形容的，它是“建立在为了共同事业走到一起来的每一位男人和女人的不受阻碍的首创精神基础上的”。在海外，我们把以前的盟友和敌人都从废墟中扶立起来，并且组织了一种国际体系，该体系开始时使我们能够遏制共产主义，最后则使我们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在国内，我们通过投资于胜利归国的战士们而向未来投资。我们通过了《士兵权利法案》，帮助数百万美国人获得教育、购买住房，从而缔造了庞大的美国中产阶级。这些努力以及其他明智的投入，导致了持续40年之久的强劲的经济增长和不断扩大的机会。

今天，在新世纪的边缘，我们面临新的至关重要的抉择：我们是抓住众多的机会并迎接艰巨的挑战，还是逃避它们？我们需要确保所有美国人都得到为最好地享受生活所必需的技术和教育吗？我们是否应该巩固我们的家庭，保护我们的孩子，并使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都能过上有尊严的退休生活呢？我们需要对威胁到价值准则、健康和孩子们的商业力量作出反应吗？我们将留给后代一个比今天更清洁、更安全的环境，还是进一步滥用大自然的恩赐？我们是继续成为希望的灯塔与和平的支柱，或是再度成为内向化的只管自己的国家？

我相信，我们已经吸取了过去的教训：我们要拥抱未来。我们必须迎接新世纪的挑战，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保护在过去两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陪伴我们的那些基本价值。

《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应当常备案头，反复诵读，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处。我们立国文献中的承诺今天仍然是清楚明了的：美国保障自由，但要求人们承担公民责任；美国保证提供追求幸福的机会，但并不确保人们一定得到它。要使这种承诺惠及更多的人，我们必须向所有愿意勤奋工作的人提供条件和手段，必须按照这种规则行事，即抓住机会最大限度地发挥上帝赋予他们的潜力。

这就是美国的承诺。今天，正如在“进步年代”一样，我们只有共同迎接未来、共同面对挑战、共同抓住机会，才能真正履行我们的承诺。

美国总是保持高标准，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这种高标准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三种核心价值——机会、责任和社区。它们适用于一切社会和一切时代。

序 言

这本书是过去我与美国人民的对话在今天的继续，涉及国家的命运、为迎接新世纪所需承担的责任以及就 21 世纪在美国建立共识的必要性。新的共识可以使我们在这个充满可能性的时代抓住那些异乎寻常的机会。

《旧约·箴言》告诫我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之所以在 1992 年竞选总统就是因为认识到我们国家对于自己的未来缺乏一致意见，更没有导向未来的明确战略，而漫无目标地跨入新时代是危险的。

我期望在新世纪之初的美国，所有愿意工作的人都能实现“美国梦”，多元化美国社会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更加强大，我们能为确保一个和平、自由和繁荣的世界继续发挥领导作用。

为实现这一愿望，我们必须推动 3 个方面的步骤：首先，为每一位美国人创造机会；其次，要求所有的美国人承担自己的责任；第三，形成更强有力的社区。

在本书的 3 个主要部分（“机会”、“责任”和“社区”）中，我考察了今天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考察了过去 4 年我们所取得的进步以及还需要完成的事情；还考察了在迈向下个世纪的时候，个人、家庭、企业、劳工、社区领袖和政府各自的责任。我们知道，只要我们坚定信念，同心协力，胜利总是属于美国的。

我相信，美国必须在这样的道路上奔向 21 世纪。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已经踏上了这条坦途，成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创造了 1000 万个新的工作机会；联邦政府赤字从 2900 亿美元降到 1170 亿；在精减 22.5 万多雇员后，政府变得更加精干，但却是更有效率；犯罪率在稳步下降，因为我们在大街上投入了更多的警力，并且不让那些恶棍、亡命之徒和偷袭者得到枪支；我们的环境和公众健康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我们的家庭更加健全，并且更有力量。当然，还有更多的事需要去做，这正是本书所论述的问题。

不过我们首先要做出一个选择：是生活在畏惧中，对一切都心怀不满；还是满怀希望，为我们珍惜的一切而工作，并且憧憬美好的未来。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出的选择——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区、每一代人，每天都必须进行这种选择。

我个人的天平绝对偏向希望的一方，这正是美国的选择，是永远的选择。我们必须忠于这种传统。如果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并受到激励，那么我们就能够实现美好的未来。

出版前言

在美国，政治家纷纷著书立说，已成为近年来司空见惯的一件事。究其意旨，大抵两种：一是为征逐权位而阐发理想，以期影响公众而争取选票；二是卸任之后总结政绩，以便给曾经信任过自己的国人一个交待。而本书，则属前者。

比尔·克林顿是“二战”后出生的新一代政治人物。这个诞生于世称“婴儿潮”时期的“政治神童”，几乎二十几岁就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自1992年正式入主白宫以来，其施政方略对冷战结束后的美国经济的提升是较有影响的。当1996年新的大选开始之际，他推出了这本书，一方面用以讲述自己现任的成就，另一方面则对内政外交提出新的理想，为争取连任而大张声势。

就在这本书被美国媒界“炒”得沸沸扬扬之际，1997年1月20日，克林顿总统也正式开始了他的连任期。显而易见，本书对他的选战胜利是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的。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一个超级大国的总统，毫无疑问，他透过本书所阐发的思想和主张，必然首先是期于美国利益的。但作为一个自称的“新民主党人”，其政纲在某些角度上，也具有一定的公共意识。比如他一方面精简政府，同时又强调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责任，并不完全迷信市场。他认为“市场并不能给我们安全的街道、清洁的环境。平等的教育机会、贫穷婴孩的健康孕育以及健康而可靠的晚年”。实事求是说，这样一些观点对人类的整体进步和文明发展，是具有其正面意义和价值的。

克林顿和他的许多前任总统一样，喜欢用实现“美国梦”这一理想来号召他的人民。所谓“美国梦”，是一个具有综合涵义的大旗，它包括平等机会、广泛就业、共同致富；也包括和平生活、减少犯罪和保护环境等等。在此旗帜下，有美国式的民主精神、也不乏美国式的强权政治色彩。这从若干年来美国在世界格局中所扮演的角色上，也都可以反映出来。

中美建交许多年了，很多方面都有了沟通与合作；虽然在某些问题上，由于两种文化、体制等方面的区别，还不能完全达成共识，但在维护和平和稳定及促进全球经济繁荣等人类共同的目标方面，所要努力的意愿是一致的。因此，加强平等对话，加深相互了解，都是彼此应该做的一件事。

现在，克林顿总统正在准备他三月份的访华之行，我社选择在这样一个时候，获得授权出版他这本新著的中文简体字本，应该说是别具深意。就国内读者而言，通过本书可以加深对美国政坛和新一代政治人物的认识，同时还可以了解克林顿本人的政治思想和美国在今后几年的政策倾向，尽管他的这些言论反映的都是他的美国本位和政治立场，但对于关注国际形势的读者来说，依旧是较有裨益的。不过，书中关于“遏制共产主义”以及希望维护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所谓“和平”的说法，则明显地暴露出他个人思想的局限性。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没有任何权利干预。对于这样一些横议，我们认为是毫无道理和意义的。

另外，本书还附录了这次美国总统竞选的辩论词，从中还可以领略克林顿本人的口才和辩术，借以管窥美国式选战的实况。

这是在职美国总统的政论性书籍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敬请广大读者鉴阅。

海南出版社
1997年1月

历史说：“在坟墓的这一边
别抱希望。”

但是，生命中，总有一次
勃发的渴望，

期盼正义的波涛飞扬，
和着希望与历史的乐章。

——谢默斯·希尼——

献给我的妻子希拉里

她的爱情、支持和榜样力量
使我工作顺利、生活幸福

献给我的女儿切尔西

她的挚爱和活刀每天都在提醒我
我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

希望与历史之间

I 机会

本世纪初，移民们总是在给他们家乡的亲戚朋友的信中写道：在美国，大街是金子铺成的。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说对。铺设我们街道的“真正的”金子是黄金般的机会，即任何背景的人只要努力工作，机灵能干，就可以获得新机缘，开创新生活。

机会的观念作为统一的动力贯穿于我们的历史。它引导我们尽最大努力，它吸引其他国家的人们抵达我们的海岸，它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投身于一个共同的美国梦，它是美国契约的首要部分。

让我从一个真实的故事说起。1984年，10岁的玛丽琳·康塞普西翁的母亲怀着使家人过上更好生活的希望，把家从波多黎各的马亚圭斯搬到罗得岛州的普罗维登斯市。有一段时间，玛丽琳成绩良好，但是读了几年中学以后，她辍学了。她在工厂、电影院、杂货店工作，干她能找到的任何活计。玛丽琳说：“我努力工作，但是我认识到我的机会有限。”这时她发现了“国内和平队”计划。这是一项国民服务计划，是我担任总统的第一年经过艰苦斗争推广开来的。玛丽琳说：“我看到年轻人在其社区发挥积极作用，这给我很深的印象。”她提出申请，成为一名助教，在一所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小学里教英语。

现在，玛丽琳说：“教书转而促使我去学习。”经过一个月的学习之后，她成为家里第一个获得中学同等学历证书的人。目前她的姐妹都在以她为榜样学着做。她很快就成为一名国内和平队队员。不久以后，她被选派到加利福尼亚的圣何塞，去帮助那里的人们制定一项类似于普罗维登斯的社区计划。去年秋天，21岁的玛丽琳·康塞普西翁作为一名医科大学预科生走进布朗大学。玛丽琳说：“通过国内和平队计划，我能够帮助我的社区、我的家庭和我自己。”她希望将来返回她的社区当医生。

作为国家的职责，确切地说，作为总统的职责就是，通过创造有利于所有美国人的经济增长环境，通过确保所有美国人都有机会抓住增长带来的机遇，开辟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正如康塞普西翁女士的故事所证明的，国内和平队是我们为建设这个国家必须继续履行的职责的象征：给人们提供机会，要求他们对自己的未来负责，加强属于我们大家的社区的建设。因为只要使每个人都有机会活得体面和成功，我们会干得更好。

在美国，这永远是获得成功的规律，而把握这个规律，一直是改变我们国家各个方面的关键。让我们回顾一下1992年，当时失业率达到了高峰，赤字达2900亿美元并且继续上升。在仅仅12年的时间里，我们的国债上升4倍之多。迅速增长的全球经济要求我们的公司具有新水平的竞争力，有些企业也的确为此正在奋力拼搏。技术进步对每个人都提出了新要求，尤其是教育和技术方面的要求。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那种机会。于是那些没有机会的人即使加倍努力地工作，还是被抛在后面。

为了再创机会，我们必须扭转逐步上升的赤字，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并给予人们提高其收入的机会。自从1993年任职以来，我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推行了一项扩大机会的战略：首先，整顿国家经济，促进企业繁荣，增加新的就业机会；其次，扩大美国产品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第三，在我们的人民身上投资，使所有的人都拥有在信息时代获得成功的手段。目标是明确的：为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能够参与21世纪的竞争，并在竞争中取胜而做

好准备；为在 21 世纪使每个孩子——无论其种族、阶级、宗教或信条如何——能像他们的前辈那样追求大街上处处“铺满金子”的未来而做好准备。

为了实现这个机会战略的第一部分——整顿国家经济，我们集中精力削减一半赤字，促使利率下降，刺激私人投资以推动国内停滞不前的经济。这一战略成功了。当我竞选总统时，就业增长处于“大萧条”以来的最低水平，失业率接近 8%，赤字剧增失去控制。我当选以后，与国会进行了艰苦激烈的斗争以通过一项新的经济计划。这一计划以最微弱的差额在两院通过。共和党人没有为之投一张赞成票，而副总统阿尔·戈尔投了打破平局的一票，使该法案在参议院通过。当时，现任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说：“这将导致衰退。”现任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理查德·阿米则对我们的计划发表意见说：“很显然，这是扼杀就业机会的计划。”现任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约翰·卡西奇认为：“这项计划行不通。”得克萨斯参议员菲尔·格拉姆说：“如果我们正式通过这一法案，美国经济将变得更虚弱，而不是更强大；自今日起，4 年后赤字将比现在更高，而不是更低。”

好了，3 年半以后，我们没有扩大赤字，我们把它削减了一半有多。当我开始执政的时候，赤字是 2900 亿美元，并且在下一年可能达到 3000 亿美元。今年，我们将把它减至 1170 亿美元。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要支付我执政前 12 年来迅速积累起来的债务利息，我们就会实现预算盈余。

进一步削减赤字，实现预算平衡，对我们的未来至关重要。赤字包袱今天拖住我们的后腿，明天还将危及孩子们的未来。降低赤字带来利率下降，使更多的美国人能买房子，买汽车，能开业，能上大学，能为他们自己及其家庭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当然，我们也不能为降低赤字而牺牲我们的未来。

这就是去年预算战的全部争议所在。去年底和今年初，我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就联邦预算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国会和我的政府都提交了为达到预算平衡而大力削减开支的预算案。现在，分歧不在于做什么，而是怎样去做。他们的方案是急剧减少必不可少的教育和环境方面的投资，并大幅度减少医疗照顾和医疗补助项目的开支。正如我在国情咨文中所说的那样，我认为大政府的时代过去了。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可以放弃我们对孩子们、对双亲和祖父母，以及对子孙后代的责任。这就是我的预算案（到 2002 年它同样能够消灭赤字）不急剧削减医疗照顾、医疗补助、教育或环境投资的原因。

国会顽固地坚持进行这方面的裁减。他们不是着眼于平衡预算，而是着重提出他们的观点，即我们的政府靠边站，让人们自谋生路，市场就能解决问题。市场确实是了不起的，然而市场（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中）并不能给予我们安全的街道、清洁的环境、平等的教育机会、贫穷婴孩的健康孕育以及健康而可靠的晚年。共和党相信我仅仅为了保证政府在资金大减的境况中维持下去，就要屈服于他们。但是我并不是为“政府”而战，我是为美国的未来而战，为一个不同以往的、较少官僚主义的、帮助人们自救的现代方案而战。当我不屈服的时候，他们两度关掉政府，从而伤害了許多人。最后，我们又回到议程上来，如何平衡预算的讨论仍在继续。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相信，我执行的政策对美国来说是正确的。让我们看看证据。事实上，与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相比，现在我们的赤字比率在世界所有大国中是最低的。正如我说过的，如果我们不为前两届政府迅速积累的债务支付利息的话，我们已经实现预算盈余。

就经济方面来说，现在的经济状况是 30 年来最健康的，表现在低失业

率、低利率、低通货膨胀率诸方面。拥有自己的住房的美国人增加了 440 多万。有 1000 万美国人以更低利率的再筹资金支付房屋贷款。妇女和少数民族拥有的企业空前增多。美国已经成为创造就业机会的世界冠军。从我的政府于 1993 年 1 月开始工作到 1996 年中期,我们的经济已经创造了 1000 万个新工作机会,这些工作机会几乎都在私营部门。企业缩编在过去几年里被新闻媒体广为宣传,那些因为缩编遭到裁减的人们确实应该得到大力支持,他们应该重新找到有前途的职业。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已经提供了千百万个新工作职位。

几年前,大量新增工作的工资水平很低。现在不同了,最近两年里新出现的正式工作机会中,有三分之二的工作属于中等以上工资水平。经历了 10 年停滞以后,平均工资终于又开始上升了。

随着利率降低以及通货膨胀降至肯尼迪政府以来的最低点,美国企业正在茁壮成长。1994 年,瑞士世界经济论坛把美国列为世界上最有经济竞争力的国家,这是 10 年来的头一次。1995 年,他们仍将美国排名第一,并且指出,美国对德国和日本的优势地位还在扩大。我们的出口达到创记录水平。企业投资达战后最高水平,并已经初见成效。例如,美国钢铁制造业重新振作起来,它创造了比 1940 年以来任何年份都高的出口额。通用汽车公司去年新增 4000 名工人,而该公司近 10 年来不曾雇佣过一名新工人。实际上,到 2003 年,3 家最大的汽车公司将以优质高薪雇佣近 17 万名新工人。美国再度成为世界汽车制造业的领导者。

结果,目前这一时期成为大多数美国人的最好时光。但是我完全知道,仍然有很多美国人生活在困苦艰难之中,对他们来说,我们这台经济机器引擎中的齿轮还没有磨合好。部分问题在于美国正以一种世界其他国家无以匹敌的经济动力创造着就业和机会,这种经济动力具有内在骚动性和破坏性。新企业形成,老企业衰亡;新职业出现,旧职业消失;新工作增加,旧工作剔除。

我们还必须面对这一事实:我们的一些同胞很愿意努力工作并遵纪守法,但是他们没有得到奖励。处于这种境况的美国人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居住在经济上孤立的内城地区和农村社区的人们,因为那里没有新工作,所以他们没有感觉到经济复苏。二是这样一些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挣时薪的钟点工。由于不具备在全球经济中获取酬劳的那种技能,所以他们虽然努力工作,但没有成功。还有一种是在企业缩编中被裁减下来的人,他们大多人到中年,要花很长时间寻找与其以前工作报酬相同、福利待遇相当的新职位。

解决他们的困难的答案是:通过已使我们的经济得到复苏的政策,通过富于创新精神、带有预定目标的切切实实的努力去促进更多的经济增长,增加更多的高收入的工作机会,实施更多的教育。不能为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针而放弃我们所做过的一切,这一方针不仅无助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而且会暗中损害其他人的机会。

从二战结束到 70 年代中期,大多数美国人都富足平安。从那以后,直到两年以前,实际工资下降了,大多数有工作的美国人只能被钉在一个地方上班。另外,各种补助金(健康保险费、公司抚恤金分配额、红利)在某些人是增加了,但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周末信封中的工资支票没有明显增加,而且收入不像以前那样有弹性,实际购买力(与我们拿到的工资相比的购买东西的能力)下降了。对许多美国人来说,美国梦似乎正在飘逝,难以企及。

我认为，除非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走向成功的机会和能力，否则美国的民主不能存在下去。美国人不忌恨成功的人们，而是欣赏他们。不是在成功的人们更成功之际，而是在没有成就的人们没有机会做得更好的时候，怨恨才会在我们的社会浮现。人们希望获得机会以做得更好，这是美国梦的核心。我们有责任保证他们拥有那种机会和能力去抓住它。

整顿经济对我们实现这个目标大有帮助。认真负责、目标明确的减税计划也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诸如为那些小企业减税的计划和“收益优惠计划”。“收益优惠计划”是专为降低最贫困的劳动家庭的所得税而设计的，这样的家庭计有 1500 万人。一个年收入 28000 美元的四口之家，所得税的减免大约相当于 1000 美元；对于那些税收不到 1000 美元的家庭，甚至可以从政府得到现金补贴。这个计划的目标是保证每个全日工作并且有孩子的人摆脱贫困，而不致于因纳税而陷入贫困。

另外，通过我们的“特许地带和企业社区倡议”，我们已经采取措施使整个社区摆脱贫困。在这种努力的引导下，千百万美元的新投资进入全国各地的街道和社区，这些地方在过去总是缺乏经济机会的光顾。

要得到更多的增长和使勤奋工作的家庭得到更多的经济机会，我们仍然有很多能够做而且必须做的事。我有一项为美国家庭提供特定目标减税的预算平衡方案：在标准所得税扣除额的基础上，给他们的每一个孩子 500 美元的税额减免；条件更优厚的个人退休金帐户，该帐户含有可用于重要投资而不受处罚的基金，如首次购买房屋，继续教育，甚至急诊；给交纳大学学费提供的税额扣除数高达每年 10000 美元，而上两年制的社区大学的税额减免则达到每年 1500 美元。

当我们进一步展望未来，就会清楚地看到未来经济机会的重要决定性因素之一就是掌握技术优势，这对个人和企业同样重要。这是我努力奋斗，避免减少我们在基础科学研究和发展方面投资的原因。技术发展，更重要的是先进技术的民主化，不仅对我们的国家利益，而且对我们的每一个国民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能让国家分出技术的富人和技术的穷人。我们必须在跨入下个世纪的时候，使技术成为服务于我们而不是伤害我们。团结我们而不是分裂我们的一种力量。我们必须使它成为一种增强我们的才能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将使我们作为个体、作为国家适应新时代，并在新时代里竞争和获胜。

我相信在 10 年以后，当我们回首这一时期就会看到，《电信法案》的通过将作为促进技术民主化的最重大的贡献之一载入史册。这是一个范围广泛的法案。它不仅包括广为宣传的、可以帮助父母清除暴力和其他一些不合时宜的电视节目的 V-芯片技术，而且包括大量的促进技术向乡村、内城街区、医院和学校扩展的条款。即使如此，这也只是个开始。

在我们可以认为所有的美国人都有机会充分享受自己的生活之前，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但是，美国人目前正处在比 4 年前更好的经济状态中。

我的经济机会战略的第二部分是，帮助美国人获得最大的全球贸易增长利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已经深深地影响到工作、工人和工资。资金、管理和技术是流动的，开放市场就意味着外国产品进入美国，这些产品是由低工资的人制造的，美国人不能靠这样低的工资生活，这有可能使一些美国人失去工作，并使另一些人的工资得不到提高。

但是，总的看来，贸易已经给大多数美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由于出

口我们的飞机、电信设备、食品、电影和汽车，美国人获得了成千上万个好工作。出口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大大高于那些只在美国国内经销产品的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

如果你关心过最近两年关于贸易问题的狂热争论，你也许会知晓关于处理我们的经济全球化问题有两面之辞。一方面，你会听到有人主张，围绕我们的国家修一道城墙，阻止外国产品进入，只在我们自己之间进行贸易。另一方面，你会发现有人说，我们需要完全自由的贸易，我们向其他国家广泛开放市场，同时希望他们也对我们开放他们的市场。这两种观点都错了。我们不必建城墙，我们需要架桥；我们不需要保护主义，我们需要机会。但是在一个存在强烈竞争的世界里，我们也需要比自由贸易更多的东西。我们需要公平规则下的公平贸易。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为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关税贸易总协定如此努力奋斗的原因。前者有效地为美国产品打开了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市场，后者正在帮国外的美国公司开辟公平的竞技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美洲首脑会议期间通过艰苦努力，加强我们与拉丁美洲之间的贸易，并探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员的扩大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通过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与我们的太平洋周边邻国密切合作，创建世界上最繁荣的地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和另外一些先进的工业国继续努力实现国际经济体制的现代化，进一步协调我们的经济和金融政策，并在开放贸易的全球经济规则基础上，进行艰苦但是公平的谈判。

在3年半时间内，我们总共谈判签订了200多份贸易协定——仅和日本就签订了21项。另外，我们于1993年制定了美国第一项“国家出口战略”，最近又制定了一项新的农产品贸易战略。主要由已故商务部长罗恩·布朗的卓越领导，我们与美国企业界领袖共同努力，为我们的产品和投资开辟新市场。结果如何呢？出口额空前高涨。的确，仅以我们与日本的21项协议计算，出口额增加了85%，这些出口项目包括汽车、移动电话，甚至包括大米！

作为我们努力创建一个新的世界贸易体系的结果，对美国人来说，今天的世界不仅是一个更好的经商、赚钱和提供就业的地方，而且也是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实际上，在自由市场基础上与国外进行公平贸易比在美国单独致富的收益要多得多，它还使每个交易伙伴都富裕起来。全球贸易扩大了我们的产品在世界各地的消费需求，促进了投资和增长，使人们摆脱了贫困和无知，增进了理解并有助于消除相互之间长期持有的敌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努力地去帮助东欧、俄罗斯和前苏联成员国建立自由市场体系的原因。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支持在中国这个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市场推进商业自由化的原因。正如民主为商业创造世界安全一样，商业也为民主创造世界安全。这是一条双行道。

在即将到来的岁月里，我们必须努力捍卫这些成就并在它们的基础上前进。我们必须继续与贸易伙伴在减少关税壁垒和坚持要求他们遵守公平贸易规则方面进行谈判。我们必须努力保护全球经济和我们的企业，使之不受欺诈和不稳定的贸易体系的损害。当我们继续努力开辟新市场时，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工人和环境受到保护，并探讨在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动质量，改善环境状况的途径，我们的经济安全有赖于这一进程。

我的机会战略的第三部分，就某些方面而言，是度过这次长期衰退的关键部分，即向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未来投资，即在科研和技术方面，在教

育和技能方面，在加强工作的家庭方面进行投资。在这一章的其余部分，我要依次谈到各个方面，但实际上它们构成一个整体，即每个美国人在下个世纪获得成功所要具备的“职业技能箱”。

今日普通美国人的前途受着一个主要力量的驱动，这一力量是：瞬息万变的经济——我们生产什么（更多更复杂的商品和服务，较少的基本产品）；我们怎样生产（更多的技术，较少的体力劳动）；谁来生产（更多的熟练工作，较少的非熟练工作）；以及我们生产得怎么样（生产率的高低）。

对这些变化的恰如其分的反应不是像某些国会共和党人所鼓吹的那样，削减我们未来的投资。恰如其分的反应是对人们的能力增加投资，即通过每个人在他自己身上，通过私有企业在其雇员和生产技术上，通过政府在经济机会的各个基础方面如教育、培训和技术方面进行投资。这样我们就能够抓住并广泛地分享这种迅速变化产生的利益。

需要什么样的投资呢？是那种有助于今日美国人在未来获得成功的投资；是那种培养孩子们使其能在下个世纪参与竞争的投资；是能使美国人经受住无常变化，并从变化中受益的投资。简短地说，是那种保证所有美国人有能力做出真正选择的投资。

不久以前，我访问了新泽西州的尤宁城，并在那里看到我们的未来。尤宁城是一个移民人口和低收入家庭很多的城市，这个城市的学校在极端贫困的境况中运作，以至于州政府最后威胁说要撤掉这些学校。但是，尤宁城的人们没有认输，没有把教育他们孩子的任务交给州政府或私营企业，像有些教育机构所做的那样。相反，他们齐心协力地办学。教育委员会投票赞成学校现代化，该市提交了新的保证书，州政府拨付了新基金。教师和另一些专家编制了新的基础课大纲，并彻底检查了学校管理制度，给予学校更多的预算控制权。该地区的电话公司贝尔大西洋公司捐赠了计算机，并建立了信息资源室。他们还向家庭捐赠计算机，并使它们与学校联网。父母周末能到学校接受培训。现在他们能够通过电子信箱与老师保持联系并且更直接地参与孩子们的教育。结果呢？考试成绩和毕业率上升了；逃学率和退学率下降了。

尤宁城运用技术不仅加强了学校的工作，而且也强化了社区的整体性。实际上，他们使技术民主化了，使它更迅速地被孩子们和父母接受。

今后我们必须做得更多。这是我和副总统戈尔试图在今后4年内，使全国各地的每一间教室和图书馆都与互连网络联网的原因。这一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了。1996年3月9日，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州参加了一个电子聚会，这时全州的学校都开始与互连网络联系起来。学区当局负责组织工作，家长则尽其所能做各种事情，从卖杯形蛋糕筹集资金到修整校舍。全州100多家高技术公司，包括Sun Microsystems公司、苹果电脑公司、MCI公司、AT&T公司、Netcom公司、AmericanOnLine公司、Scholastic Networks公司、网景公司以及微软公司，捐赠了硬件和软件。而电讯工人国际兄弟会和另外一些劳工组织帮忙铺设了600万英尺的计算机电缆。这只是个开端。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该州将近四分之一的学校接通了互连网络。同时根据本届政府发起的另一项全国性倡议，全国家长—教师协会、教师联合会和美国学区委员会联合会正努力保证美国的老师们能像使用粉笔黑板那样轻松自如地使用电脑。按照“21世纪教师倡议”，10万名教师将培训50万以上的教员，使之学会如何利用电脑、软件和工作网教学。

但是，仅有这些创新，我们的工作还不够。我国增长的关键一步是，我

们还必须提高我国的教育水平，跟上时代的要求。正因为如此，我国在上世纪实现了基础教育义务制，在本世纪完善了中学教育水平，并通过了《士兵权利法案》，使大学可以面向复员军人。

现在是再一次提高教育水平的时候了。1983年，当在我的家乡阿肯色州担任州长时就开始了这一进程，我决心使本州成为教育改革的带头人。我创办了“教育标准委员会”。经过几个月的工作，通过与乐于提供帮助的家长 and 教师进行数十次公众会议讨论，我们宣布了一项内容广泛的教育改革计划，为学生、老师和学校制定了标准。同年，“全国杰出教育委员会”发表题为《处于险境的国家》一文，对全国学校中的“庸才增加的趋势”发出警告，并号召全国公立学校实行彻底的改革，以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迎接新时代的教育和技能方面的挑战。

1989年，我和其他州长与布什总统举行了第一次教育首脑会议。我们一起拟定了一个广泛的教育改革目标。我们要让每个愿意学习的孩子进学校，要让每个孩子熟练掌握一些关键科目，精通数学和科学，要让每个孩子从安全的、没有毒品的学校毕业，准备为世界工作。我们确信，你对学生期望越高，他们对自己的期望就越高，他们达到的目标也就越高。我们觉得对老师和学校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对他们期望很高，并训练他们，使其发挥水平，他们就对自己期望很高，并会作出创造性的、令人惊喜的成绩。

今年州长又聚首开会，这次会议有许多我们国家的企业领袖参加。他们检查了改革进展情况，并重申了他们的义务。自第一次教育首脑会议后的7年时间里，60%以上的4岁孩子现在都上了学前班；接受核心课程的年轻人已经从1982年的14%上升到1994年的51%；全国数学和科学成绩上了一个等级；86%的年轻人正在完成中学学业。

另一方面，制定“国家标准详细说明”的努力成效不一，这种“国家标准详细说明”具体规定了学生在升入下一个年级之前应该学到些什么。数学和科学教育水平已经取得进步，但是制定全国历史和英语教学标准的努力受到广泛批评，致使标准评估的主要工作已经转移到州和地方政府官员身上，毕竟是对美国公共教育负有主要责任。

在联邦政府一级，我们努力帮助他们制定明确无误的标准，即我们希望我们的老师教什么，我们的孩子们学什么，评价他们在完成这些标准中过程的表现，并做到在他们没有尽职时使其承担责任。例如，我们调集了各种资源，以帮助扩大“启蒙计划”，使孩子们上学之前就有所准备并能够学到东西。我签署了《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案》，授权教师、校长和家长通过运用尖端技术、尽量少的联邦法案和挑战性的学术标准，通过日益增多的父母对学校以及孩子的日常功课的参与，来改进学校工作。

现在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保证教育能满足孩子们的需要，能适应未来的要求。首要的问题是，我们必须支持学生、老师和学校达到最高水平。我们必须保证学生能够证实自己有升学和毕业的能力，教师也必须证实自己的能力，而且我们要准备奖励最优秀的教师，并将那些不合格的人公正而迅速地免职。同样地，我们应该奖励那些最好的学校，而关闭或重新设计那些失败的，尤其是那些不安全的学校。这是我扩大学校选择权和发展特许学校的原因。特许学校是由父母和老师创办的，由学区核发许可证的新学校。这是我宣布一项50亿美元新计划的原因，该计划将与州和地方政府共同进行总额达200亿美元的投资，尽可能地整修翻新内城地区、郊区和偏僻市镇的校舍，

并使之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如果这些地区的学校残破不堪或者教室太过拥挤，我们就不能，尤其是不能在 1996 年秋季学生入学高峰期之后培养好我们的学生。

我们还必须继续重新考虑学校在我们社区中所起的作用。我们支持推广创办“社区学校”，这种学校 3 点钟以后继续开放，并且既是青年人，又是成年人的社区活动中心。我们还必须做出更多这样的努力，使青年人更少地在大街上自相残害。在多数州，我们鼓励由企业团体设计的“从学校到工作机会”的计划，为那些没有马上进入 4 年制大学的青年开辟更多的通向未来的途径。我们必须尽更大的努力。

人们即使在一流的中学受过教育，也不足以在今天的经济竞争中获得成功。这是我致力于推进重要的“大学机会战略”的原因。过去 10 年里，我们的经济生活最清楚地表明，获得高工资的途径是接受高等教育。在今年的教育首脑会议上，美国公司领袖最明确的表示之一就是，今年他们需要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拥有更多技能的新员工。

像许多同代人一样，我经常想起《士兵权利法案》对我们的父母和我们的国家在促进战后空前繁荣方面是多么重要。这是我要在世纪之交为尽可能多的美国人大开高等教育和机会之门的原因。

在过去 3 年半期间，我们采取了许多步骤使大学对美国人来说，更容易进去并能够负担得起费用。我们实施了一项大学直接贷款计划，这一计划降低了贷款费用，并向学生提供更多的还债途径，包括按其未来收入百分比偿还的方法，这样就使学生不至于因担心不能偿还债款而离开大学。我们试图每年为来自劳动人民家庭的学生扩大“佩尔资助款计划”。当然，我们还通过了国民服务计划，建立国内和平队，这一计划已经使将近 45000 名年轻人通过为国家和社区服务的方式来读完大学。

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做更多的工作。这是我号召到 2000 年将“大学工作学习计划”由 70 万个名额扩展到 100 万个名额的原因。我要求各大学更好地运用这些资金，使千百万大学生从事社区服务工作。我要求各中学奖励每个能做一些社区服务工作的学生，并要求给那些为其社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学生每人颁发 500 美元的国民服务奖学金。

此外，我建议让美国人能够用他们的个人退休金帐户交纳大学学费；我要让每所中学的 5% 的最优秀学生每人得到 1000 美元的奖学金。

这些都是了不起的进步。但是我认为，我们的时代迫切要求我们让所有的人都能够上大学，让第 13 年和第 14 年的教育像头 12 年一样普及。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已经提出了两项新的家庭减税方案。它的费用全部由我的预算平衡案中的经费削减部分来提供。首先，我要求国会通过一项使一个家庭每年税额减免高达 1 万美元的法案，以帮助支付中学以后的所有教育费用。其二，我提出一项费用达每人每年 1500 美元的税收信贷计划，为社区大学或 4 年制大学学生提供头一年的费用。如果学生平均成绩保持良好（B）或更优秀，该贷款可延续到大学二年级，这样每个人至少可以完成两年的大学学业。我称这项税收信贷计划为“美国希望奖学金”。

这些新提案将为所有愿意为美国服务的美国人敲开大学之门，提供就学机会，而不用考虑他们的支付能力如何。这些新提案还使每个成年人都有可能接受教育和培训，从而使其不必固守在某个没有前途的职位上。简而言之，只要学生们承担责任，它们就为其创造机会。这些提案重立契约，这个契约

过去使我们建设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它也是保证美国人在下个世纪有能力赢得机会的关键因素。

至少两年的高等教育，将增加美国人获得并保持高薪工作的机会。美国不能担保所有的人在同样的公司的同样职位上终其一生。那不是，而且从来就不是我们的制度所要做的事情。但是，在当今动荡不定的经济中，人们必须懂得：如果他们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他们总是有办法找到为寻找新工作所需的培训的途径。值得欣慰的是，大多数美国人都住在有良好的社区大学的地方，这些学校驱车可至，距离不远。它们在为其毕业生安置好工作方面成绩斐然。

前不久，我收到一封来信。写信人是个 65 岁左右的失业工人，他 4 年前失去他在航天飞机工厂的工作，并且不知道转向何方。但是他写信给我们，我们就帮他联系参加一种国会有些人试图取消的培训计划，那个人在他 60 多岁时又开始了向上的新生活。他又工作了，有尊严，能养活自己和家庭。这不是一种浮夸的计划或过时的主张，这是帮助人们走向未来的计划。

我认为，就像根据《士兵权利法案》送二战老兵上大学符合国家利益一样，帮助现职工人扩展教育技能，帮助下岗工人重返学校，也符合国家利益和机会原则。我们已经进入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知识一直是获得个人机会的关键，而现在则成为整个社会获得成功的关键，并且真正成为划分那些一生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人与那些有落后之虞的人的界限。我们现在知道，任何一个工人，现在无论处在什么年龄段，每接受一年的工作培训或高于中学水平的教育，其未来赚的钱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会提高 6% 到 12%。如果我们要让美国人挣更多的钱，我们就必须帮助他们学习更多的东西。

美国最好的公司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哈利·戴维森公司，这个使汽车工业重返美国的公司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设立培训中心，对其全部工人进行数学、写作、阅读技能方面的基础性课程和高级课程的训练。摩托罗拉开办了自己的“大学”。联合技术公司提供给它的雇员获得另一个学位所需要的时间并资助其学费——不管该学位与其工作是否直接相关。它们都认识到，受过较好教育的职员会是较好的职员，实际总是如此。另外许多公司提供了广泛而持续的培训，以便他们的雇员能轻易地从一个工种转向另一工种，并以更大的责任心提高其工作质量。

我鼓励更多的公司向美国公司中的先行者学习，这样做最符合公司自己的利益。正如联合航空公司总裁杰拉尔德·格林沃尔德在我今年于华盛顿召开的一个关于企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会上所说的那样：“在美国，每个企业领导人都认为雇员是我们最重要的财产。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为什么在我们的机器大修方面的投资比我们培训……雇员方面的投资更多呢？”我知道许多公司太小，不足以提供复杂的培训计划。但是我也不想让他们的工人落后，因为我不想让美国落后。

因为下岗工人和仍然在职的工人都认识到他们需要提高技能，以求进步，所以我于 1994 年，并于 1996 年再一次为美国工人提出了新的《士兵权利法案》。该法案简单可行。首先，它把 70 项重叠的项目合为一体，废弃过时的联邦财政担保金培训制度，并用这些替代资源来资助一项简单的每份 2600 美元的技术补助，当工人们愿意上学或接受培训时，可以使用这笔补助金。第二，给州政府更多的灵活性，以满足雇主和工人对培训的需要。第三，扩大“过渡职业中心网”这个已经由各州政府创建的网络计划，向现职工人

和正从学校学习过程过渡到工作的年轻人提供有关工作、职业和各种不同训练机构的成功率等各方面的信息。

法国伟大作家阿纳托尔·弗朗斯曾经说过，穷人和富有有同样的自由晚上躺在大桥下面。哪怕在一个自由社会，只有当人们有能力享受自由时，才能进行真正的选择。我认为，我们国家的职责就是保证美国人拥有这种能力，即让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作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公民，能够真正地享受人生。而这意味着投资——明智而又始终如一地——在教育方面，在扩大大学教育途径方面，在培训和再培训美国劳动者方面。我们不能保证每个美国人成功，但是我们能保证每个美国人拥有成功的机会。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他们大多数人都将抓住这种成功的机会。如果我们尽职，我们所有人都将在 21 世纪的美国拥有更多的机会。

在对各个层次的教育机会进行全面考察的同时，我们还需为劳动家庭建立安全保障，在新的经济中保持他们的健康，保证他们的养老金的可靠性。养育家庭，关心父母，平安退休，这些机会依赖于如下改革：保证工人在职业变动期间不失去他们的健康保险，保证任何公司不非法盗用在雇员的退休金或限制新雇员获得退休金的机会。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小公司工作，这些小公司不给他们提供健康保险，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这个原因，劳动大军中享有健康保险人数的比例比 10 年前更小了。尽管 65 岁以上的美国人享受医疗照顾，但我们却是西方工业国中唯一不向 65 岁以下的所有劳动者提供健康保险的国家。

在本届政府执政初期，我们努力推进内容广泛的健康保险改革。多亏两党通力合作，所以尽管还存在更大的挑战，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项新法规，除了别的一些规定外，该法规保证，人们在变换工作或者家里有人生病时，不会自动失去他们的健康保险。这是为劳动家庭提供经济保障的重要新途径。

但是我们还必须继续努力。首先，我们应该向失业工人提供帮助，使他们在找到新工作以前不失去健康保险。这项改革是我的而不是共和党人的预算平衡方案的一部分。我们还要让小企业更容易地购买保险风险金，这种保险风险金数额很大，能以较合理的成本向小企业提供保险。例如，斯塔巴克咖啡店现在是一家大约拥有 15000 名雇员的、遍及全国的大连锁店，但它并不是一直这么强大的。然而，他们却一直向其雇员提供健康保险，为什么呢？这首先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合理的。其次也因为他们搞了一项调查研究，发现如果他们不向其职工提供健康保险，这些职工一年内可能离职。由于斯塔巴克已经花了数千美元培训每一个新员工，他们简直承受不了那种人员流动所造成的损失。健康保险不仅使他们的职工感到更安全，它也为公司带来回报。这样做不仅给职工，而且也给雇主带来更大的利益。有时候人们的行为既合乎道义，又对自己有利。我们应该鼓励这种行为。

我们还应该鼓励公司为其工人提供抚恤金和退休金计划，要保护努力工作的美国人的退休金不被其雇主非法盗用。全国职工中，大约只有一半的人受益于退休金计划。在雇员少于一百人的绝大多数公司中，四分之三的雇员没有退休金。这不太好。我们要让工人更从容地从其现行的收入中留出足够的钱供其退休后使用。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由于养老金资金储备严重不足，且易于被雇主滥用，所以我们必须确保退休金的安全。1994 年，国会通过了由我提出的

保护 4000 多万美国人的退休储蓄金的法规，这些人原来的储蓄金或者严重不足，或者因为企业兼并或破产而处于危险境地。从那时起，我们就呼吁保护工人的退休金，使其不被雇主骗取；我们还努力阻挡由共和党国会制定的那些使雇员的退休金更易于被雇主“非法盗用”的计划。我最近签署的最低工资法中，包含了我提出的关于提高退休金覆盖面，增强退休金的灵活性和可靠性等建议的许多内容。它创立了一个自愿的小企业退休金计划，该计划使这些企业更容易地向其雇员提供退休金。

关于健康保险范围，当工人变换工作或失业时，他们应该能够带走退休储蓄并保持对储蓄金的权利。现在，可以转移的退休会不多，可是越来越多的人在可以领取其退休金之前改换了工作。当美国工人改变工作或从原来的岗位裁减下来时，他们必须能够马上使其退休金转移到新的雇主的计划中而不需要等一段时期。所以我们要让雇主更易于接受这种来自新雇员的滚动式退休金。这项法律还包括我提出的，取消新雇员加入新雇主的退休金储蓄计划的等待期的建议。

当然，这三项经济机会战略——整顿经济秩序，挖掘全球贸易潜力，对人民的能力投资——要改善一般美国人的基本生活轨迹尚需时日，但是变化正在发生。1994 年，我的经济计划得以通过后的第一年，家庭收入多年来第一次全面提高。从最穷到最富，每个类型的家庭的收入都真正提高了。从 1994 年开始，个人收入持续增加，超过了通货膨胀的速度。1995 年，个人收入增加率比通货膨胀率高 2.6%。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工资增长是 5 年来最快的。无可置疑的是，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了，房产拥有率已经达到 15 年来的最高水平。

我们的机会战略正在发挥作用。现在我们必须依循它去创造更快的增长，更多的高报酬工作，以及更多更成功的企业。我们可以平衡预算以保持利率下降，为那些需要的人提供更多的健康保险和养老金方面的选择权，为我们的产品开辟更多的市场，对教育、新技术和研究进行更多的投资，并且把教育、儿童抚养和那些经济仍然很虚弱的地方作为减免税的目标。这些措施将帮助更多的美国人救助自己，保证经济更快增长，保证我们共同走向未来。

有些人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策略，他们以前也提出过这样的战略：实行全面的、我们难以承受的税收减免。如果将其付诸实现，就会急剧扩大赤字，提高利率，还会放慢经济发展的速度；甚或为这一战略付出代价，即要求我们削减医疗照顾和医疗补助项目，大砍教育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费用，其数目甚至大大超过已经被我否决的那个预算计划。两种途径都会减少机会，放慢经济增长速度，彻底伤害努力工作的美国人。这样的计划是不负责任的。

机会是美国契约的一半，另一半是责任。

责任

在商业部长罗恩·布朗及其他许多优秀的美国人因飞机失事遇难后，我在布朗的办公室见到了布朗的老友和邻居肯特·阿莫斯。让我给你们讲讲他的故事吧。

15年前，肯特·阿莫斯是施乐复印机公司一位成功的管理人员，并且是该公司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经理。他的妻子卡门也在这家公司工作。他们住在华盛顿特区，有两个孩子，一个叫威斯利，另一个叫德比。另外他们还抚养着87个孩子。第一批孩子是他们自己的孩子的朋友——来自破裂家庭的朋友，来自苦苦挣扎的单亲家庭的朋友，以及根本没有家的朋友。他们放学后围聚在阿莫斯的家里等着吃饭，吃完后还留下来住宿。这些孩子中有许多人陷入困境或正在走向困境。阿莫斯一家供养他们，关怀他们，保证他们每天晚上刻苦学习，参加他们的游戏，分享他们的快乐，使他们大多数获得大学的奖学金。每年肯特家供养孩子的人数都在增长。肯特和卡门未能挽救所有的孩子。他们埋葬了“他们的”4个孩子。另有一个因为偷盗进了监狱，在同一所监狱里还有他的生身父亲和继父。但肯特保证让这孩子在这孩子中获得正常的教育，当他刑满释放后为他找到一份工作。

阿莫斯夫妇推测，他们每年要花自己的两万美元来抚养这些孩子。接下来，肯特创办了一家非赢利的组织，有像施乐这样的公司对此提供了帮助。今天，他的城市家庭研究所倡导改革家庭和社区养育孩子的方式，使任何一个面临危机的孩子都在有责任感、有爱心的成人的监护、督促、抚养和关怀下成长。他已经找到其他家庭来帮助抚养孩子，目前他正在同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亨利·西斯内罗斯商谈有关把公共住房项目变成“城市家庭大学”的事，在“城市家庭大学”里，父母亲和孩子能学到他们在生活中要取得成功所必须知道的东西。

肯特和卡门夫妇是典型的美国梦的最好范例：他们有前辈非洲裔美国人得不到的机会，他们取得了成功。他们在个人、家庭的生活和工作中表现了责任感。对他们来说，这还不够。恰如肯特告诉我的一样，他逐渐认识到，如果他想要他的孩子有一个学习和成长的良好、安全的环境，他就必须把他的影响和父爱推及到他孩子的同班同学身上。当肯特·阿莫斯这样做时，他就开始建立了一种用来养育孩子的非凡的居住小区，正如我妻子在有关这个主题的书中所提到的一样。

我知道，我们不能邀请街坊中所有遇到麻烦的孩子都到我们家里并且供养他们，但是我们每个人能够首先在自己的个人、家庭生活 and 工作中负起责任，其次作为公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来使我们的社区和国家强大起来。

如林肯所说，我们的开国元勋们创立了一个“信奉自由”的国家，但他们清楚地了解当今许多美国人所忘记的东西：自由只有在与责任一起运用时才发挥作用。例如，我们有言论自由，但同时也有根据民法来讲话的责任；我们有集会的自由，但也有和平集会的责任；我们有新闻自由，但也有真实、准确、公正报道新闻的责任。

没有责任感，任何自由社会都不会繁荣。例如，如果没有责任感，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制度就盛行欺骗消费者、内部交易、虐待雇员等现象。如果没有责任感，社会精英的智力只会创造出一种狭隘的利益集团政治，为自己的无能辩解，而不能为更大的公众利益服务。如果没有责任感，个人的自由只

不过是自私自利。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美国的被共同目的凝聚在一起的社区就会受到削弱。

美国不只是意味着个人享有他们的权利。我们民主的标识在于个人和家庭，企业和劳工，政府和社区组织，它们全都对我们的孩子、老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负有责任。开国元勋们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在《宪法》的序论中说：我们的目标不仅是“确保我们自己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而且要确保“我们的后代子孙”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工作“增进全民福利”。他们认为前者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眼前的喜悦转向我们对孩子的责任，而后者则把我们的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向彼此间的责任。因此，从一开始，机会和责任就相辅相成。

这个政治理论虽然创立于两个世纪以前，但在今天仍然适用。在我成长的那个时代，美国人可以很随便地走在任何一个城市的街道上，心中毫无恐惧感。有私生子是很稀罕的，也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父亲放弃他们对子女的责任。社会福利是那些能工作但暂时处于困境的人们的一个驿站。在全美国的街头巷尾，随便一个人都能说出林登·约翰逊总统离开华盛顿回得克萨斯家乡小镇时说的话：“在你生病的时候，人们理解你；在你离开人世的时候，人们关心你。”对于生长在今天的许多年轻人来说，那只能存在于电视中再度上演的黑白电影里。

从事政治的人正竭力找到解决各种各样深刻的社会问题的办法。我们大家都知道，许多社会问题是由缺乏个人责任感而引起的：十几岁的少年母亲离开学校靠福利生活；赖账的父亲放弃他对自己孩子的责任；罪犯向我们周围的人伸出魔爪，掠劫同胞；邻里们向贫困的孩子背过身去；企业的总经理不能善待他的职员或埋掉有毒的废物。

美国是建立在相互的责任的基础上的。如果我们想使 21 世纪的梦幻成真，那么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加强这个基础。因为许许多多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要求人们重新节制自己的生活，承担义务，承担自己行为的责任，我们必须发展基于社区合作的个人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依赖庞大过时的官僚机构。我们必须主动帮助人们，作出对于他们来说不是灾难性的、对于我们来说也不是代价高昂的决定，那是全国的责任。

过去 4 年里，我们在 4 个广泛的领域里执行这种责任：首先，通过别的事情，如福利改革和预防犯罪来加强个人和社区的责任；其次，通过革新联邦政府来更好地担负起公共的责任；第三，鼓励企业对工人及其家庭的福利承担起更多的责任；第四，对社会各阶层做工作，通过促进保护我们的自然环境来表明我们对后代的责任。

在这些领域的每一个方面，政府都能够起带头作用。但最终我们必须强调，公民、企业、社区帮助自己，承担起责任，使这个伟大的国家过上更好的生活，一个又一个人，一家又一家，一个街区又一个街区，一个社区又一个社区都应如此。无论如何，个人的责任感是基础。在强调政府的责任、公司的责任、社区的责任以前，我们必须强调个人的责任。

没有哪一个问题比福利问题更能说明个人的责任的了。15 年来——这要追溯到担任阿肯色州州长的时候——我一直致力于福利改革，使之成为第二次机会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我曾与人谈论福利问题，问他们发生什么事情会使他们依赖福利生活，要怎样才能改变他们的现状。我的调查所产生的结果是，阿肯色州成为全国在广泛改革家庭和福利计划方面的领头羊。我们

通过扩大母亲的健康服务来降低婴儿的死亡率；通过中等收入的工作的双亲担保人制度来增加对孩子的照顾；通过加强教育、培训、医疗保险和对孩子的照顾，并要求双亲找到适当的工作，来减少对福利的长期依赖。我们促进了双亲、甚至是目不识丁的双亲，为孩子在学习班的教育投入。面对抚养孩子成为全国优先考虑的问题，我们加大了抚养孩子的力度。我还代表全国的州长，帮助起草了 1988 年的联邦福利改革法案。

在过去 3 年半的时间里，我们帮助各州发动了《纽约时报》所称的“悄悄的福利革命”。我们没有大张旗鼓，也没有立新法，就精简了有关福利的繁琐程序，并支持大约 40 个州的“从福利到工作”的计划，其覆盖面占全国依赖福利生活者的 75%。我们加强了福利救济的时间限制，要求工作，要求十几岁的少年母亲呆在学校，还建立了更加严厉的抚养孩子的强制制度，强制范围是跨越州界的。

这项工作有了成效。今天，依赖福利的人比我就职时要少 130 万，食品券减少了 200 多万张。几年前，在一次听证会上，我问一个不再依赖福利的阿肯色州的妇女，她的最大好处是什么。她直视着我的眼睛，回答说：“现在，当我儿子去学校，有人问他‘你母亲干什么的’时，他可以作出回答了。”这种回答所表现的自豪感，或它对一个孩子的积极影响，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

那位妇女脸上的表情使我有理由继续与国会协作，试图在全国范围内就全面审查福利的立法达成一致。我否决了国会提交给我的两个有缺陷的法案，因为这两个法案不符合一项负责的福利改革所要求的基本条件：即对工作和责任严格要求，但是对孩子和有责任感的想工作的双亲不太苛刻。国会愿意继续拟出一项能符合这个条件的法案，这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能对福利进行历史性审查的缘故。

我在 1991 年就说过，我们需要结束大家所熟知的福利。而现在，随着新的福利改革法案的通过，我们有机会结束损害我们关于工作、责任、家庭的基本价值观的制度，这个制度曾使一代又一代人陷入依赖和贫困中，损害了正是这个制度所想要帮助的人们。

我们将有机会建立一个新的制度来取代它，这个新制度符合我一开始就说过的改革的基本原则。首要的是，它应该动员人们从福利走向工作。其次，它应该规定享受福利待遇的时间限制。第三，它应该给那些需要从福利走向工作的人以有关孩子和健康保险方面的帮助，这个制度不能伤害孩子。

新的法律植根于这些原则中。它给各州和各社区提供了促使人们从依赖走向独立和更多尊严的机会。但是，真正的工作仍有待人们去做。各州和各社区必须保证提供工作和对孩子的照顾。它们可以用那些过去用于福利支票的钱来为社区的服务工作偿付报酬，或者给雇主几个月的薪金补助以鼓励他们雇用福利的享受者。它们还必须在适当的时候提供教育和培训，并照顾那些主要不是由于自己的过错而找不到工作的人。这些举措不仅对于福利的享受者而且对于各州、各社区和各企业来说都是重要的新的责任。但是，要使福利改革有效，所有的人都必须肩负起自己的责任。

我也必须申明，福利改革法案并非尽善尽美，主要是由于非福利条款过度地削减费用，用来支付共和党人的预算计划中的过度的减税，而这种减税只是为了迎合并不存在实际需要的高收入阶层。法案有些部分有明显的错误。我们必须在未来的岁月中努力工作，矫正这些错误。例如，该法案再一

次减少了孩子的营养补助，这主要伤害的不是福利家庭，而是那些勤恳苦干、竭力摆脱贫困的家庭。该法案还砍掉了合法移民和他们孩子的补助，这对于努力工作依法纳税的合法移民来说是非常不公正的。共和党人坚持对那些家庭说：“你可以工作、纳税三、四年，但如果你的孩子出车祸，生大病或者成为犯罪的牺牲品，我们不会帮助你。”那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加以矫正。

重要的是要记住，这项改革只是一个开端，我们必须谦恭地走向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当我们从最成功的州的福利改革倡议中学到许多东西的时候，我们还有许多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完善这项法案，在某种程度上真正促使人们从福利走向工作，而且这对我们的孩子有好处。我们将在未来某个时候完善这项改革。

不过，我确实明白一件事，这就是改革福利不会改变通常导致福利依赖的潜在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少年怀孕问题。每年，大约有 100 万的少女怀孕。事实上，每年将近三分之一的新出生的婴儿是属于未满 18 岁的少女所生的，毫不奇怪的是，这些少女中将近 70% 未婚。十几岁就怀孕，这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代价高昂的，对孩子、对家庭、对社会都是灾难。这是一个“错误”。对于少年母亲来说，这也是导向贫穷的快车票。今天将近一半的长期福利给了那些生第一个孩子时年龄不足 17 岁的妇女。

除非我们面对责任——年轻女性有不要怀孕的责任，男人有不要使她们怀孕的责任，父亲有抚养孩子的责任，父母亲有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家并教育他们对性行为负责、鼓励他们节欲的责任，教堂有宣讲这些教义的责任，社区组织有发展计划帮助少年母亲和她们的孩子开始新生活的责任，官员则有理解少女怀孕是复杂的社会问题乱麻中的一部分的责任，否则我们不能结束福利依赖和少年怀孕的恶性循环。在过去 3 年半的时间里，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事。我要求各州规定少年母亲住在家里或与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住在一起。我们现在要求少年母亲留在学校并签一个继续住在家里个人责任合同——当然除非她们家的环境很糟糕。对于那些不能回家的人，我建议为“再生之家”捐钱，像那些已在美国几个社区建立起来的组织一样，“再生之家”为少年母亲和她们的孩子提供了一个安全的、辅助性的由社区组织和管理住所。

这些年来，少女怀孕第一次得到控制并开始减少。但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它需要全国来关注。这就是我要求社区、宗教、企业的领导人肩负起更多责任的原因，也是我支持“全国减少少女怀孕运动”的努力的原因。为确保这个问题成为我们人民心目中优先考虑的问题，我们要做一切可能做的事情来扩大以社区为基础的方式的影响，在我们的年轻人中间灌输一种责任感。而我的政府也在资助以节欲为基础的项目来教育学校里的十几岁的学生。我们有必要告诉那些生有孩子的孩子：我们爱护你，但请你也爱护你自己。除非你已准备承担广泛的责任，否则千万别怀孕或成为孩子的父亲。如果你这样做，只有你自助，我们才愿意帮助你。你不能摆脱责任，如果你想逃避，我们会迫使你承担起责任来。我们在孩子抚养问题上的成功表明了我们的决心。1995 年我们征集了创记录的 110 亿美元的孩子抚养费，几乎比 1992 年增长了 40%；从那时起，我就指示各州要求母亲帮助证实和找到离去的父亲，以便我们能够使他们抚养他们的孩子。

但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做得更好。如果所有欠孩子抚养费的人都付清这笔钱，那么 80 万母亲和孩子将立即告别福利券。新福利改革法案给我们提供了

一个强有力的新工具，使我们得以在那些跨州的案件中追回拒付的孩子抚养费。

我对那些失职的父亲劝告很简单：如果你漠视你的责任，我们将对你进行追踪，扣发你的工资、停发你的证件，让你偿清你的欠款。养育你的孩子是你的责任，而不是政府的责任。

个人和社区的责任也是解决美国犯罪问题的关键。只有我们对自己的社区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我们才能真正达到这一目标，那就是使近来犯罪率历史性的下降成为长期趋势。

1992年新罕布什尔州预选的10天前，我在纽约对聚集在一个大饭店的人群发表演讲。当我穿过饭店的餐厅时，一个身穿饭店制服的工人走过来，抓住我，用浓厚的移民腔调对我说：“州长，我有话要对你说。”于是我停下来听他说。“我10岁的孩子在学校学习选举，他决定我应该投你的票。但如果我投你的票，我要你为我做一些事。”

他继续说道：“在我的祖国，我们很穷，但我们很自由。现在我们住所的那条街对面有一个公园，但我儿子不敢在里面玩，除非我陪着他，因为他会遇到危险。我们有一个学校，很好的学校，离我家只有两个街区，但我孩子不敢去上学，除非我和他一起去。”

“所以，如果我投你的票，你会使我的儿子自由吗？”他说这话时直视着我的眼睛。

任何一个政府的最基本的职责就是保护公民的自由。如果它不能完成这个任务，那么所有它代表我们做的其他事情就等于零了。如果你走在街上时要左右提防，这就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你也就不是一个自由的人。除非犯罪得到控制，否则我们就得不到应该得到的自由，如那个勤奋的移民的孩子一样。我就职时决心采取新的措施来打击犯罪。让我们来回忆一下那时的情形吧：暴力犯罪连续4年直线上升，被判有罪的重罪犯可以走到随便哪一家枪支商店买手枪，除了杀人外没有其他目的的攻击性武器像猎枪一样自由出售，普通的守法的美国人害怕走在他们自己家门附近的街道上，甚至害怕送孩子上学。由于国会里的枪支游说集团的阻碍，对那种情况作明智的改变的努力多年来一直枉然无效。

我已决心改变这一切。决心惩罚罪犯，不替他们的行为找任何借口。决心不使枪支落入坏人的手中。决心主要通过使年轻人有事可干来预防犯罪。首要的是，决心恢复美国每一个街区警察的中心作用。

实施法律主要是地方和州的责任，但联邦政府会提供帮助，我已决心为这种帮助寻求资源。这就是我的1994年的《反犯罪法案》所要做的。

我也知道，联邦政府不能单独解决犯罪问题。犯罪问题最终还是得要每天在美国各街区的街道上得到解决，这就要求个人负起责任，要求社区共同努力来推行负责任的行为。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我们正在取得进步。到1995年，犯罪率连续4年下降。凶杀下降了8%，抢劫下降了7%，强奸下降了6%，盗窃下降了5%。1995年是纽约市自1972年以来犯罪率下降得最大的一年，也是休斯顿——社区警察行动的先锋之一——19年来凶杀率最低的一年。

由于我们永远不能消除潜伏在人性中的阴暗，所以美国永远不会出现没有犯罪、没有暴力的时候。但我们可以使之成为非常现象，而不是一种经常的规律。我的目标是创造这样一个美国，在这里，当人们打开电视看晚间新

闻而头条新闻是严重的犯罪事件时，他们会感到震惊而不是仅仅当做普通的和不可避免的新闻来接受它。

为达到那个目标，我认为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方法，一种综合了我们现有全部工具的方法：警察、惩罚和预防。使用这些工具时，我们不仅需要政府和司法系统，还需要全国每一个社区的每一个美国人承担起赢回街道和我们孩子未来的责任。

我在 1994 年提出的《反犯罪法案》完成了我向美国人民许下的一项承诺：把新增的 10 万警察投入街道以加强社区警卫。确实，这是一个旧办法。它意味着警察要走出警察局，走出警车，回到街道上，回到居民中，这样他们能够和居民一起发现罪犯，关闭有问题的房子，防止家庭暴力，熟悉街道上的孩子，预防犯罪，防患于未然。

社区警卫发挥作用不仅是因为有更多的警察在街上，而且是因为居民的参与。联邦政府可以把 10 万新警察投入全国的警察局，但如果没有居民区、学校、企业里乐于支持那些警察的公民，如果没有愿意承担起教育孩子分辨是非的责任的父母，那么我们不会成功。当警察走在街上的时候，他们应当感到每一个守法的公民都会与他们携手同行。邻里相互帮助，朋友支持朋友，父母教育孩子识别对错。居民与警察建立起信任的纽带，这就是社区警卫的全部含义。

打击犯罪是每个美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不仅仅是一个公共的问题，还是一个个人问题。它意味着当你看见有人陷入困境时，要拿起电话，请求帮助。30 多年前，吉蒂·热诺弗斯惨死在纽约街头。邻居们在听到她遇难的尖叫时，却关上窗户，拉上窗帘。我们不能让那个时代重演。这就是我要号召 100 万美国人志愿加入社区警戒活动以帮助警察维护街道和我们居民区的安全的原因。这也是我要求移动电话企业向全国居民戒备组提供免费的时间和 5 万架移动电话的原因。企业热情慷慨地响应了我的话，我希望其他美国人也以同样的态度来迎接挑战。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同时也会遇到无数的承担责任的机会。我们可以参加一个居民戒备组或者帮助成立一个居民戒备组。我们每周可以抽出几个小时帮助男孩或女孩俱乐部或 D.A.R.E. 反毒品计划的年轻人。这就是打击犯罪的方法：公民帮助公民，街区帮助街区，邻里帮助邻里。

然而，好的警备还需要相应的严厉惩罚。我们的《反犯罪法案》和最近的《反恐怖主义法案》正是这样的惩罚工具。我们已推动各州采纳政府用于联邦监犯的规则，要求他们服满刑期的 85%，这期间不得被假释。对于那些屡次犯有重罪的人，我们要制定像球场规则“三击不中就出局”的法律，犯三次罪就玩儿。我们把死刑的范围扩大到将近 60 多种暴力犯罪，包括杀害联邦执法人员。我们还限制了过分的死刑案上诉。我们还强化了对贩毒犯的判刑，并告诉那些涉入公共住房项目的毒贩，他们只要犯一次罪就玩儿。公共住房是一种优惠，滥用它，你就滚蛋。

我们也通过建立新的加强保护秩序的严厉刑法，通过把家庭虐待档案与我们用于武器背景核查的制度联系起来，通过建立一条全国的家庭暴力热线，来惩罚那些恐吓、威胁、侮辱妇女和孩子的人。现在，通过那条热线（1—800—799—SAFE），每月大约 7000 位陷入困境的妇女能迅速地得到帮助，找到避难处，向当局报告所受到的残害。

严刑固然重要，但是每一个警察都会说我们不能通过监禁来解决犯罪问

题，我们必须做更多的事来防患于未然。今天，经过几年与特殊利益集团的斗争，美国终于有了《布雷迪法案》，这是一个恢复常识的法律，建立了 5 天的等待期和背景检查等购枪制度，使得大约 6 万重罪犯、逃亡者和其他罪犯不能拥有手枪。

我们还制定了法律，禁止出售 19 种攻击性武器，这些枪支明显是用来杀人的。与此同时，自从禁止攻击性武器出售和《布雷迪法案》生效后，美国没有一个猎人失去武器或错过了捕猎季节。此外，我们还通过新的办法来打击国内外的恐怖主义。一个新的“全国毒品管制战略”把年轻人作为教育和预防的对象，把吸毒者从街道上赶走，让他们接受治疗。这个战略旨在减少因滥用毒品对我们的健康和福利制度造成的危害。这个战略试图在边境上堵住毒品并切断毒品的来源。

预防是斩断犯罪恶性循环的最有希望的战略——确实是唯一现实的希望。如若不信，你可以去问美国任何城市执勤的警官。他们将会告诉你堵住毒品、解散帮派、禁止出售手枪和攻击性的武器，以及破坏那些滋生罪犯行为的条件是禁止犯罪的根本方法。

警察、惩罚和预防的结合使犯罪率下降。但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且取得这些进步的许多倡议正陷入危险中。目前，我们社区警卫所需要的 10 万新警员中的 4.4 万人的装备款项已经到位。我们已经提前实施了计划，但国会的共和党人却一再企图撤消这项法律。枪支游说集团和它在国会的盟友正在竭力撤消禁止出售攻击性武器的法案，他们还阻碍使追踪爆炸物的根源更容易的措施并阻碍通过禁止买卖枪杀警察的子弹的禁令。大多数但不是全部的共和党人继续拒绝预防计划项目，他们宁愿选择监狱来关押罪犯而不是通过集体的努力来预防犯罪。我们必须斗争以维护这些改革，使它们得到彻底地执行，减少犯罪。我们应该有一个宪法修正案，使犯罪的受害者在法庭讨论诸如罪犯的保释、减免、判刑和假释的过程中有介入权、知情权和发言权。

最后，有一个所有父母（实际上是所有的美国人）日益忧虑的犯罪问题隐隐呈现，而我们才刚刚开始控制这个问题。这就是青少年犯罪问题——或更准确地说，是青少年犯罪和对青少年的犯罪这样一个孪生问题。从 1984 到 1994 年，青少年凶杀率增加了 82%，现在，枪杀已成为 10 岁至 19 岁青少年死亡的第二大主要原因。许多枪杀是青年人杀青年人。枪杀的原因常常是过度饮酒、吸毒、贩毒，而且经常是由帮派组织的。

这个问题的一个主要方面是：许多青少年是非婚生的孩子。他们没有在双亲的监护下成长，生活在困难和危险的家庭环境中，他们被抛在一边自己养活自己。许多这样的孩子发奋改变了生活，但其他许多人的生活没有改变，他们滑入犯罪、毒品、帮派和暴力的阴暗世界中。

所有的美国人都应当关心这些孩子。他们是我们的未来。即使我们不能效法肯特和卡门·阿莫斯夫妇的做法，我们也必须自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建设一个将这些孩子养育成人的居住小区，教他们分清是非，给他们一个有希望的未来，把他们走向未来所需要的品质和价值观传授给他们。许多美国人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同时，我们还需要保护我们自己和孩子免受青少年违法者的暴力。自从我就职以来，我们就宣布：任何一个年龄未满 18 岁的人，在没有成人的监督下携带手枪就构成联邦级的罪行；我们还要求学校将带枪上学的学生停学一

年。我们鼓励学校严厉对待校园暴力，采取像加州长滩市那样统一校服的政策，通过促进个人自尊，减少暴力行为。我们支持像新奥尔良一样实行宵禁政策，减少孩子暴露在危险中的时间。我们支持我们能采取的最有效的步骤之一，这也是最老式的一个步骤：确保实施《强制防止逃学法》，以使我们的孩子在教室里而不是在大街上学习。我赞同并签署了《梅恨法》，该法是以7岁的梅根·康卡命名的。两年前，她被一个住在同一街区的两次被判有罪的儿童骚扰者强奸后杀害。新法律要求各州把释放的和假释的儿童骚扰者和性犯罪者通知各社区。

最后，我们还建立了一个“全国黑帮跟踪网”，并且警告那些作为当今毒品文化和青少年暴力根源的帮派：我们要把你们赶走，打断你们组织的脊梁骨，阻止你们恐吓邻居和孩子，把你们放逐很长一段时间。

即使这样我们仍有工作要做。今年，我递交了一份旨在对青少年暴力犯罪者更加严厉的法案。几个月前，我宣布建立新的计算机系统，通过追踪枪支的来源来遏制枪杀案上升的势头。在波士顿这个创议很成功，今年迄今为止尚未有一个青少年被枪杀。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用来挽救陷入困境的孩子的。如必要的话，夜晚实行宵禁，让孩子们呆在家里。白天，他们属于学校而不是大街。任何时候，孩子都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从根本上减少犯罪是美国每一个公民的任务。今年夏天我们有些好消息。7年来，青少年暴力犯罪的逮捕率第一次有了下降，青少年凶杀逮捕率下降了15%。这是10多年来下降得最多的一年。但问题仍然很多，它需要我们竭尽全力，在一个又一个社区，使我们的青少年脱离毒品和暴力。

在应付福利和犯罪问题时，很清楚的一点是：联邦政府不能单独提供解决办法。全国共同体的各个方面——企业、劳工、宗教、社区、地方政府——都必须更广泛地承担起责任来。当然如本章所阐述的，联邦政府在迎接这些挑战时可以起到重要作用。

当我们应付21世纪工作、家庭生活将发生的巨大变革和其他新的挑战时，联邦政府应当做什么、又如何去做的问题显得尤其重要。这就是最近几年我们把重新改革政府、重新思考政府作用置于优先考虑的原因。

开国元勋们创立联邦政府，让它做只有全国性政府才能做的事。它最初确定的那些基本问题至今仍极其重要：国防、外交事务、财政制度，当然，还有保护我们的宪法权利，执行联邦法律。它逐渐包括了保护和管理我们的国土、农业和商业。随着工业时代的成功及其所带来问题的增多，联邦政府要做的事包含着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问题。后来，冷战和美国社会、经济的挑战使得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府都致力于限制工厂和市场滥用权力，保护穷人，改善教育和环境，应付原子能的问题，扩大民权，还有其他许许多多。自从邦联条款的失败导致各州一致同意全国性的《宪法》，通过一个联邦政府来获取那由公民、自由市场体制、州和地方政府不能获取的重要的公众利益后，我们就已经扩展了“合众国”的视野。

这就是政府成长的方式——在被统治的人民的同意下建立的。但美国历来对“大政府”持怀疑态度。正如时常为人们所提到的，在我们历史上大多数时候，我们在思想上对政府的作用一直持保守的态度，甚至由于情势需要，我们赞成政府的特定的干预措施时也是如此。

在我们的时代，由于这些原因使人们关于联邦政府作用旧的争论获得了新的力量和迫切性：首先，对社会问题的老办法看来没有一个很好地发挥作

用；其次，在一个激烈的全球竞争的世界里，我们不能支付一个浪费的官僚习气严重的政府的开支；第三，信息技术革命和工作的组织化使政府必须学会事半功倍，更企业化、更有效率，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的政府机构太庞大了吗？就其基本方面而言，答案是肯定的。今天的许多做法仍像一元化的政体和大工业公司一样，实行由上而下的命令式的管理，用制订规则、从事大规模生产、一个型号适用于全部的方法来进行许多微观的管理。这种模式在工业中已不起作用了，这就是私营企业部门集中精力来提高生产率和灵活性的原因。然而，政府慢慢才认识到这一点，作出反应则更加迟缓。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改革政府？自从 1980 年的里根革命以来，共和党的主流已从“小政府几乎永远比大政府要好”的论调转变为“政府永远是个问题”。这种论调在这一届国会的预算中，在使我们致力于改善环境和公众健康的努力受挫的立法倡议中达到了顶峰。

我们的政府和新民主党持不同的看法。我们说大政府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但我们不该回到“各自为战”的时代。我们需要政府做如下必要的事情：为我们大多数人谋生提供所需要的手段，为我们彼此间的义务给以荣誉，建立强大的经济，保护公众健康和环境。我们相信我们能够缩小政府的规模，削减它的负担，提高它帮助美国人迎接新时代挑战和保护我们价值观的能力。可以说没有证据证明，如果我们放弃了一起继续前进的努力，把美国的未来留给全球市场的柔弱同情，却会使美国更加富裕。

事实是，美国人不想使我们的政府受损。我们从经验中知道，有一些事是政府应该做而且必须做的：保护我们免受国内外敌人的袭击，援助我们对付天灾人祸，打击犯罪，保护我们中弱者的健康和福利，恢复并维护我们的环境，保障我们的食品的安全，为那些保卫国家的穿制服的人提供供给，为每一个人提供优质的教育机会。去年我反对国会的预算法案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放弃了许多这样的责任，特别是那些有关教育、环境和对孩子、老年人照顾的责任。

我们不要政府挡我们的道，但是当我们急需它时，我们确实想让它站到我们身边。譬如，当发生地震、洪水和可怕的俄克拉荷马城大爆炸的悲剧时，我们不要一个软弱的联邦紧急事件处理署。当我们工作的地方不安全时，我们不要一个瘫痪的职业安全和卫生审查委员会。我们也不要不能保障喂养孩子的食物不会伤害他们的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真正的问题不是大政府与小政府。

我相信美国需要一个比原来小的而又更关心人民的政府；一个效率更高而浪费更少的政府；一个把权力从联邦层次尽可能下放到州和地方层次的政府；一个当私营部门能把工作做得最好时，依赖私营部门企业家的政府；一个少些繁文褥节多些鼓励的政府。总之，一个多些常识、追求更多共识的政府。

现在的美国正朝这个方向转变。在副总统戈尔领导的“革新政府倡议”的指导下，我们裁减了 22.5 万联邦工作人员，废除 1.6 万页冗长的、常常是过时的规章条文，削减了近 200 个项目和计划。我们也进行了政治改革——例如通过了逐项否决方式；终止了没有配套资金的联邦命令；要求国会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遵守相同的法律；改革游说法以限制滥用游说权；通过了流动选民法。我相信这将会增加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我们没有在精简人员后止步，我们已经改革和完善了现存的政府。这里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我们已经使服务性政府机构对人们更加友好相待了。去年，《商业周刊》把社会安全署列为向消费者提供电话服务的头号供应者，其他大公司如 L.L.比恩公司和联邦特快均落在它的后头。职业安全和卫生审查委员会及环境保护署的执法机构正在建立与管制对象的新型伙伴关系，以促进公共利益，这样它们行动起来就不仅仅像执行法规的警察。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在未放弃保护美国人健康的职责的情况下，大幅度地缩短急需药品包括有助于延长爱滋病患者寿命的那些药品的批准时间。过去常常准许免费使用无线频道的联邦电讯委员会，现在已将大部分频道向私营部门拍卖，几十亿美元随即进了国库，这有助于将财政赤字降下来。联邦紧急事件处理署本身几年前就是一个紧急问题，现在它对于那些遇到困难的人及时作出反应，从而受到每一个服务对象的夸奖。小企业管理局把它的贷款申请表从一英寸厚减少为一页纸，缩短了批准时间，它的贷款额与 1992 年相比翻了一番，包括大幅度增加对合格的妇女和少数民族企业的贷款；与此同时，它的呆账率下降了——该局是在预算压缩的情况下做到这一切的。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同私营企业联合，促使住房拥有率达到创历史记录的水平，这就为更多的穷人提供补贴以便他们选择自己的住房；他们还正在致力于摧毁全国大约 3 万个破损的、犯罪盛行的公共住房，代之以新的更安全的、更清洁的综合性花园公寓，在那里新的规则会促进自给和责任。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和联邦住房管理局使第一次买房的人在预付款上平均少付 1000 美元。农业部 20 年来首次使食用肉和家禽的安全管理实现现代化并使其得到强化。教育部减少了学生的贷款成本，减少了违约率，并使学生可以按收入的一定比例的方式来偿还贷款。随着我们的“革新政府倡议”继续保持良好势头，这个成绩单还会更长，每年都会加长。

革新见效了。革新不仅精简了联邦政府而且还改革了它。革新使我们摆脱关于大政府或小政府的陈词滥调，使我们认识到政府应该更小但是更好。这样做有助于把美国政府恢复成它的合法主人——美国人民——的政府。

联邦政府还有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责任，这就是创立一个使我们的经济能够增长的结构。政府在削减赤字、降低利率、控制通货膨胀、限制恶劣的企业行为、扩大世界贸易的机会、支持科学研究和技术、增加教育机会等方面起着中心的作用。

不过，政府不创造就业机会，创造就业机会是企业的责任。美国的企业已经非常好地履行了这个责任。自从我当总统以来，超过 1000 万个就业机会被创造出来，93% 的就业机会来源于私营部门。

但在美国社会中，创造就业不是企业的唯一责任。如果要使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为家庭提供更好的条件，满怀信心地面对未来，那么美国企业还有更明确的责任：成为繁荣的动力，让世界羡慕。我再说明白一点：企业的最基本的责任是通过竞争和增长去赢得利润、创造就业机会和收入。而精简联邦政府的一个意义就是：今天的企业不仅肩负着增长和做得更好的责任，还肩负着另一种责任，即帮助处理新时代附加给美国工人、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社区的紊乱并帮助他们迎接新时代的挑战。

我认识到并非每个企业都能负担超过他们的关心能力的部分，尤其是许多小企业。但许多美国最成功的企业与他们的雇员达成了新的交易：雇员致力于使公司更加赢利，公司致力于使雇员更有价值。换句话说，他们不是把

雇员当作原材料，而是作为必不可少的财产。

看看 NUCOR 这家不愿意解雇工人的钢铁厂吧。NUCOR 钢厂工人的基本工资属于中等，但根据公司的经营状况，他们每周可得到红利。当公司经营状况好时，工人分享了它的成功，即使工厂出现下降趋势，一个雇员都不会被解雇。相反，大家平摊损失。行政人员的工资像工人的工资一样与公司的业绩挂钩。去年，NUCOR 钢厂工人的平均年薪超过了 5 万美元。每个有孩子上大学的工人还可得到 2200 美元的学费津贴。或者看一看哈曼国际立体声扬声器公司吧。当企业走下坡路时，为避裁员——他们已在雇员身上投资很多——哈曼国际公司与其雇员一道创办了一家新企业“外线企业”，工人们利用哈曼公司的破铜烂铁生产出他们自己的新产品。它使雇员努力工作，发挥创造力，也使公司赚钱；它还向每个雇员说明公司关心他们，珍惜他们。或者看看普鲁克特和盖博公司，他们很崇敬家庭，因而给产妇一年的假期，为新当父母的人在 5 年内减少工作时间，补贴照顾孩子的费用。

并不是只有大公司才承担这些责任。譬如费尔—普罗公司，一个历经了四代的、生产汽车部件的家庭公司，它的雇员中有 50% 是少数民族，它为它的雇员提供每样东西：从个人法律和家庭咨询服务到全天候的康复中心，从雇员孩子的夏令营到这些孩子继续深造所需要的学费。费尔—普罗公司的肯尼思·李赫曼在今年我主持的“公司公民大会”上说：“人们习惯把广泛的家庭朋友的利益同公司赢利截然对立起来。然而，我们感到公司与雇员的朋友关系增加了赢利；只要基本承受能力许可，我们还会继续这样做。”这些公司没有制造头条新闻，但他们通过做好事来赢得好的业绩。他们创造了家庭般的朋友般的工厂，为工人提供健康服务、津贴、培训，与工人形成新的伙伴关系，并提供安全的工作场地。他们在加强他们的基本承受能力，并对雇员的福利进行投资。结果他们雇员怎么样了呢？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使他们自己和家庭获得更全面的社会保障。企业又怎么样了呢？跳槽的人数很低，保有了高度忠诚的更好更灵活的雇员。这是一桩好买卖，恰如构建美国的基本关系一样：机会与责任联姻。出席今年“公司公民大会”的另一位总裁认为公司的责任已从雇员的福利扩展到全球的福利。伊万·乔伊纳德——五角公司（户外纺织品和设备公司）的创立者对我说，除了做好日常环境评估，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公司污染的程度以外，五角公司拿出销售额的 1% 来维护和恢复环境。乔伊纳德说：“我们的顾客欣赏我们的努力，我们全都感到有希望留给我们的孩子一个适于居住的地球。”

维护环境是一项全国的乃至全球的义务，对此我们全都责无旁贷。4 年前，在纪念地球日 22 周年的会上，我说过，美国人需要为环境订立一个新的契约，使我们作出保证：留给孩子一个空气、水和土地未被污染、损坏的国家，一个自然风景未失去光彩的国家，一个持续增长的其领先地位无可比拟的国家。我也说过，要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必须使环境的保护和改善成为一项共同的任务——每个公民、每个社区、每个企业和公司、每一级政府都要致力于这个任务。尽管我们面前的任务很繁重，但是事情确实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

这里有一个特例。在纽约市荒芜的南布朗克斯的中心地区，有一种顽症正在吞噬着竭力谋求生存的居民的灵魂。25 年来，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的 19 英亩废弃的、古老的哈莱姆铁路调车场的情况越来越恶化，这里的土壤浸泡在污水里，荒凉的广阔的土地上覆盖着垃圾和废墟。它立即成为毒贩、黑帮

和各种犯罪分子的圣地。

但是，今天，这个全国最糟糕街区之一的地方正在获得新生，它的中心同样是那个古老的哈莱姆铁路调车场。一个地方社区发展公司、一个全国性的环境组织、两个国际造纸公司联手在这个地方建造一个艺术纸厂。林瓊，这位构思华盛顿特区越战纪念碑的建筑家，正在设计该厂。布朗克斯社区造纸公司以最先进的生产技术、能源效能和污染控制技术，将创造几百个永久性的就业机会，该公司也是二战后纽约市建造的最大的造纸厂。

更重要的是，这个年产值 5 亿美元的工厂造纸不用砍一颗树。相反，工厂将从纽约市的“城市森林”取材——每日该城办公楼里产生的成吨废纸——来制造 100% 的循环纸。它的工业用水的 80% 也将来自污水处理厂的循环水。

这还不是全部。它将投资建一栋宿舍，为 20 个以上没有固定住家的学生提供住处；建一个南布朗克斯家庭学习中心，为住户提供健康照顾、孩子照顾、识字课程、就业和培训的帮助、住房机会；建一个新的零售中心；提高地区图书馆质量；为住房和企业发展提供长期贷款；建立一个儿童捐助的基金来为四邻的孩子扩大受教育的机会。这是怎么产生的呢？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市场导向起了作用。不久前，我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要求所有的联邦机构要用循环纸。单是这一行动就为全国循环纸的制造商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全新的市场。但真正的功劳应该归于辛勤工作了 4 年使计划付诸实现的社区和公司的职员。布朗克斯古老的哈莱姆铁路调车场不是怀俄明州的黄石湖，不是佛罗里达的大沼泽地，也不是阿拉斯加的荒野或加州的沙漠，但它仍然说明了一个重要的环境教训。多年来，美国富饶的土地和资源促成了一种“随意处理的”的心理，我们占有所需要的，扔掉我们不需要的。现在，道德感终于点醒我们这些梦中人。全国成千上万的街区中堆满废弃物，有成千上万亩掠夺性开发后的、荒芜的土地。还有荒山秃岭、过度放牧的牧场、野生动物受到威胁的栖息地和不安全的水源。布朗克斯社区造纸公司给我们的启示是：只要我们振奋精神，我们就有能力来改变这些情况。通过发挥创造性和合作精神，我们能够恢复美国失去的大片的环境，使它们变得有益于健康；保护其他土地和资源免遭破坏；甚至在这一过程中创造有利环境的就业机会。

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我们只用了 25 年就把工厂的有毒排泄物减少了一半；孩子血液中含铅的水平降低了 70%；千百英里的溪流，一度被污染到易燃的程度，现在又变得清澈了。伊利湖，曾被人宣布为死湖，现在产鱼很多。许多濒临危险的物种，从最低等的到最高级的，如美国的秃鹰，得以衍生。荒野、景色优美的河流、野生动物的避难处，一度受到威胁，而今得到了保护。

但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们中三分之一的人还在呼吸着危害健康的空气。我们的国家公园急需资金来维持适当的维修和工作人员的费用。许多濒临灭绝的物种仍处于灭绝的危险中。许许多多社区的饮用水不安全。大约 1000 万名 12 岁以下的孩子在距有毒废弃物 4 英里之内的地方生活和玩耍。我们已经清洁了许多水域，但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溪流仍需要清理。

工作清单上需要完成的事情还很多，然而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最近 4 年，我们扩充了社区知情权的法律，该法要求工厂告诉公民什么物质被排放在水中和大气中。我们减少了化工厂 90% 的毒气污染。由于严厉的《清

洁空气法》，55 个城市的 5000 万美国人现在可以更舒服地呼吸空气了。在消费者组织和肉、禽加工工业的密切合作下，我们彻底检查了检疫系统——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这样，现在人们用科学测试来保证：当父母给孩子吃鸡肉或带他们出去吃汉堡包时，他们能对食物的安全放心。在一些全国最好的社团公民的合作下，我们从市场上剔除了几十种危险的化学品并很快地用更安全的東西来替代它们。

我们如何保护环境也十分重要。在早些时候，环境保护经常是决心捍卫其极端立场的两派的战场：要么是更多的管理，要么是没有管理。他们不愿意谈判，几乎总是要战斗到僵局的地步；他们的战斗常在法院了结；由法院来解决的办法常常没有为常识留下余地，并产生了深刻的仇恨和持久的不信任。整个过程极端化了，并把美国人在一个罕有的真正会使我们团结成一个民族的问题——我们的自然环境——上分裂了。

我从未认为我们必须在清洁、安全的环境和增长的经济之间进行选择。保护全体美国人的健康和安全不必以牺牲我们经济的基础为代价，而创造兴旺发达的公司和新的就业机会也不必以牺牲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饮用的水、我们吃的食物、我们居住的自然环境为代价。我们能够而且确实必须兼有二者。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的任期内，我们改变了政府维护环境的方法的原因。今天我们在环境保护主义者与私营部门工作的人之间建立了更多的合作关系。我认为要集中注意结果，而不仅仅着眼于制定法律。我认为要取得那些结果，要有灵活性。在最近 3 年半的时间里，我们采取措施在环保署减掉 1500 万个文牍工时。我们从总统的“特殊基金储备用地”中删掉 2.7 万个勿需进一步行动的所谓“布朗菲尔德城区”，使它们又成为十分急需的工业和商业发展可用的地方。我们使大约 1.2 万家在特殊地区投资的小公司免于负债。在那里，它们的参与是地区发展的起码条件。我们鼓励负责任的公司建立自己的花费不大的、有效的方法以达到防污标准以上的水平。当他们那样做时，政府的种种规定就可以搁置不用了。由于我们的“常识倡议”，政府官员、环境保护主义者、企业领导人都一起致力于建立环境保护战略，那就是用更清洁的、更廉价的、更聪明的方式来保护全体美国人的健康和我们共享的资源。

我们在管理公共自然资源时采取同样的方式。我们与全国极重要的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农场主一道起草“栖息地管理计划”，以保护珍稀物种免于危险并保护农场主不受未来政府的限制。我们用类似的技巧来管理木材、山地和国家公园。

尽管在环境保护方面有了显著的变化，前面还有不少的麻烦。25 年来，两党都致力于清洁环境，但现在情况变了。美国在清洁环境和维持一个良好的自然资源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第一次处在危险中。去年，一小撮为污染辩护的游说分子在国会山对环境保护和公众健康发起大肆的攻击。他们与国会的盟友一起坐下来修改《环境法》，并降低两党有良好愿望的一代人所努力创造的环保标准。他们知道美国人民决不会容忍公开地撤销《环境法》，于是他们采用偷梁换柱的办法：他们提出的预算不可能执行土地法，同时，他们悄悄地开始提交议案；特殊利益集团的附加条款将会一再损害环境保护。

他们建议关闭或出售一些国家公园，削减维持公园的经费。他们建议将清除有毒废弃物的费用从污染者身上转嫁到纳税人身上，与此同时还削减了

“特殊基金”预算的 25%。他们还建议钻《清洁空气法》的空子，使产生污染的企业受惠，而减少保证清洁空气标准所需要的资金。他们还建议减少 45% 的用于安全饮用水的资金，减少 29% 的水基础结构——管道、水泵和处理厂的资金。他们试图撤销对几百万英亩的野地，包括阿拉斯加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地的保护。他们还试图扩大由纳税人支持的阿拉斯加堂格斯国家森林的伐木范围。他们建议以其真正市场价的很小一部分价格出卖公共土地的挖矿权和放牧权。他们还企图建立一个几十亿美元的授权计划，要求纳税人给污染者付款以求得后者不污染环境。实质上，他们想撤销《清洁饮水法》和《濒危物种法》。也许，最恶毒的是，他们建议否定给人们知情权的法律，而该法律规定公民有权知道污染公司把什么污染物排放在人们居住的地区。

我否决了送到我书桌上的每一次对环保攻击的法案并将继续这样做，直到国会的那些提出建议的人认识到“保守主义者”这个词的核心是“保存”。

当我们向前进时，我们为取得新进步仍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恢复佛罗里达大沼泽地，重建国家公园的设施，寻求一个有约束力的国际协定来减少那种导致全球变暖的大气污染，消除一切从一国向另一国倾倒有毒废弃物的做法。我期待着加倍努力，把提高水质、清除有毒化学品和在全美国推广社区与街区的知情权作为全国性的目标。

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出现在地平线上。在公愤的刺激下，国会缓和了对环境和公众健康保护的攻击，就在 8 月休会前，实际上是一致通过了两个很重要的法案：《清洁饮水法》和保护我们免受食物中的杀虫剂危害的法律。我赞扬那些回心转意的支持环境保护的共和党人，以及在无耻的攻击下坚持保护环境的民主党人。

25 年过去了，美国人终于作为一个整体站起来对肮脏的空气、有毒的食物和水说“不”，并一致希望把未被污损的土地留给我们的孩子。我无意让特殊利益暗中破坏这项长久的全国利益。

环境不是一种奢侈品，它是我们的家园。它不是一种可以选择的东西，而是我们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和我们的生活。保护环境就是自我保护和保护孩子的未来。维持和改善环境，把一个清洁的地球传给后代，这是每一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或许这是最重要的责任。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环境就是我们的共同基础。为后代保护环境，加深了我们必须共同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未来的社区意识。

对全体美国人来说，责任仅仅是机会的反面，合在一起，就代表了这个伟大国家的公民之市的两面。当机会与责任保持平衡时，当每一面都在家庭、企业、邻里和作为整体的国家中有同等价值时，我们就实现了我们大家寻求的目标：一个有共同目标的社区，一个景象更清晰的美国梦——我们作为美国社区的一部分都希望分享梦。

社区

今年年初，我在华盛顿州视察灾难性洪水给当地造成的损失。在一个小小的名叫伍德兰的社区，我停下来和正在做清理工作的人们聊了聊。我结识了一位 60 多岁的先生，他是加入了美国国籍的挪威移民，已从当地的公用事业公司退休。这位先生的肋骨曾折断过，当时却已操纵着汽锤连续干了 8 个小时，尽其所能地帮助邻居重建家园。在那附近，我还和一对 70 多岁的老夫妇一起呆了一段时间。他们几乎丧失了一切，但仍然保持着他们的幽默感。其中那位丈夫对我说：“要知道，直到今天以前我们这儿用来欢迎一位总统都是不合适的。但现在您来看看，我能为您提供一个室内游泳池呢！”我们都开怀大笑。然后，他又转向我，说道：“您看，尽管这儿如此可怕，大家仍到这儿来帮助我们，自洪灾发生以来，他们天天都来。您不是希望我们总能这样做吗？”

在过去的 3 年半中我所获得的最具普遍意义的经验也许是：每当我们意见分歧时，我们就遭到失败；每当我们像社区那样共同工作时，美国总能取胜。在当今这个时代，党派叫嚣的噪音常常掩盖了那些为取得真正进步而努力的人的默默的艰苦劳作，人们很容易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共同工作以建立共同基础是我们这个民族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保护它免遭意欲分裂我们的势力的侵害，是我们不断要面对的挑战。

这种共同目标的精神在发生如俄克拉荷马水灾之类的悲剧后展现得最为充分：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生、护士、医疗辅助人员和抢救人员英勇地、不知疲倦地工作；从灾难发生的第一天起人们就怀着坚毅与活力开始重建工作；那些受伤或失去所爱的人的人们则不失个人的决心与勇敢；以及美国各地的人们对于需要救助的人给予了富有同情心的捐助。共同工作是美国人最擅长的事情。不管是面对中西部的洪水，还是波斯尼亚受伤的儿童，我们都能奋起应战，并全力投入工作。

150 年前，阿历克斯·德·托克维尔这位 19 世纪法国伟大的美国事务评论家，曾对我们组织社团的迫切愿望感到惊奇，并将这一点称为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也许是最显著的特点。然而，为达到政治或商业上的目的，有许多试图分裂我们的叫嚣。在看到黑人教堂被焚毁、犹太教堂和伊斯兰中心遭亵读，以及涂在布雷格堡非洲裔美国特种部队成员门上的“ ”时，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对形形色色的邪恶力量并不是免疫的。而在这些邪恶力量不受节制的时候，它们已经给全世界许多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破坏。

杰出的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曾对各民族和社区获得成功所需要的要素进行了研究，得出了结论并将它归结为以下 3 者：规则、网络和信任。只有在人们超越将他们区分为社区各集团成员的界限而彼此相互联系时，信任才能建立。普特南把它称为“网络”。在他的著作《独自打保龄》中，普特南揭示了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它们意味着共同利益网络的退化，而自托克维尔及他之前以来，这些网络对我们的成功一直是至关重要的。在 1991 年时，我有同样的感受。我希望帮助重新树立共同目标意识，帮助重建那些公民间的网络、以及任何伟大的民族均赖以走向繁荣的相互信任。这是我之所以谋求总统职位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但我相信，我们的社区意识又开始增长了。不管走到这个国家的哪个地方，我都确实实地看到了美国人结合为团体，共同工作，寻求共同基础，

并找到共同的方法来使这个国家变得更美好。看看我们的社区吧，在任何地方我们都能见到人们为共同目标而共同工作：在改善学校的努力中，在街道重振计划中，在街区治安巡视中，在创建表演艺术中心的运动中，以及在每一天的其他上千种活动中。尤其是在担负更多的社区责任以将我们的孩子与暴力、帮派和毒品中隔离开，使我们的家庭变得更牢固，以及加强我们的基本价值观意识方面，一股有效的社区行动的浪潮正在全美国不断高涨。

从你的口袋取一个 1 美分的硬币出来。它的一面，在林肯的肖像旁，有一个单词：“自由”。在它的另一面，是我们国家的格言，即 E Pluribus Unum——“合众为一”。它并不是“人人为己”。

一枚硬币并不值钱，放在口袋里就能带走，但它却明确地宣告了这一点，即美国既要个人自由，也要社区责任。这两项承诺——保护个人自由和寻求共同基础——是我们国家的基石、我们价值的衡器。

从历史上看，1776 年，开国元勋们在撰写我们的《独立宣言》时强调公民责任，既有现实的原因，也有道德上的理由。当开国元勋们宣布政府是“在人们中间成立的，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时，他们表达了两项根本性的主张。第一，政府应当成为人民的仆人而不是相反——对这项承诺我们常常记得更牢靠。第二，自由的人民为了保持他们的自由，必须共同工作以达成共识——他们必须在私利和公益、自己的福利与整个社区乃至民族的普遍福利之间保持平衡。

简言之，美国不仅要提倡独立，也要提倡相互依靠，这两项都是我们的开国元勋们在《独立宣言》中表示他们将“以我们的生命、财产和神圣的荣誉互相共同保证”的。

从美国历史中可以得出的经验是，美好的生活并不仅仅指个人自由和物质财富，它还需要培养社区关系及关心公共事务。

我是在阿肯色州的霍普和温泉城长大的。它们是那种我们过去称之为紧密结合型社区的地方。这是个很恰当的词，它表明社区生活的纽带是牢固而完整的。你不仅认识你的邻居，你还照顾他们，你的邻居也照顾你。你不仅在每周的工作时间里和邻居一起工作，还在周末和他们一起共同执行社区计划。在这些小镇，以及在全美国其他城镇的邻里间，我们都拥有“有共同目标的社区”。这依然是我们想要的。美国人都愿意成为一个彼此团结而不是彼此分裂的国家的一员，我们都愿意成为一个人人们互相照顾而不是人各自顾的社区的一员。

我们生活在许多社区中，同时我们也对它们负有责任。首先，我们的家庭也许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最小但最重要的社区。随着竞争压力尤其是谋生压力的不断加强，履行我们对它们的责任也变得越来越艰难。其次，我们生活中的邻里和社会也越来越多样化，要使我们的国家继续成为自由和机会之乡，就需要我们所有的人都付出忠诚、苦干和善意。第三，我们生活在由各个国家组成的社区，这是个地球村，我们既有好邻居，也有坏邻居。我们每天都必须和他们打交道。

我们建设牢固社区的能力始自牢固家庭的建设。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孩子最初几年的生活情况良好，有尽职尽责、关心孩子的父母爱他们，鼓励他们，教他们区分好和坏并树立榜样，这就能造成充满希望和成就的一生与充满绝望和失落的一生之间的差别。这还意味着一个核心价值得到保护、准备好迎接 21 世纪的挑战的美国和没有做到这一切的美国的差别。用沃尔

特·惠特曼的话来说，就是“造就好孩子，其余的也将随之而来”。

但如今做到这些并不容易。即使是最警觉的父母、最好的孩子也会受到一大堆难题的困扰：似乎在一味宽容暴力和不恰当性行为的电视和音乐，以及来自同辈的消极的压力。其最极端的表现形式，举例来说，是来自生活条件较差的街区中的不良少年帮派的压力。在某些家庭，贫穷、父母虐待或干脆撒手不管、酗酒、吸毒成痛等等，都危害着孩子的前途。

对大多数家庭来说，仅仅现代生活本身造成的压力，就使父母难以给孩子们以他们所需要的时间、精力和关注。父母们干着全日制的工作，晚上也许还要去上课，因为孩子们不能像我们过去那样就在大街上玩耍，还得来来回回地接送孩子参加他们需要的有组织的活动，支撑一个家实在是一件非常、非常艰难的事。

实际上，现在就大多数家庭而言，在家庭和工作方面都取得成功是越来越难了。可是，任何一个迫使人们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的社会都注定要失败。如果美国人只能在工作方面取得成功，而在家庭方面失败，那我们将陷入困境。如果只能在家庭方面成功，而在工作中失败，我们也将陷入困境。在父母们面临工作上的要求不断增加的境况时，只简单地告诉他们应花更多的时间和他们的孩子在一起是不公平的。我们必须设法使家庭有可能在持家和工作方面都取得成功。

单靠家庭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作为一个社区，我们对此负有责任，政府能提供某些帮助。例如，我签署的第一项法案就是《家庭和医疗休假法》，我为此感到自豪。该法案使父母能在不影响其工作的情况下照顾新生儿或应付医疗方面的紧急情况。我根本无法说清有多少美国人曾拦着我、告诉我这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因该法而受益的人大约有1200万。一个由两党组成的委员会最近发现，十之八九的公司都说这并未损害它们的利润。

我们的免疫计划、“启蒙”投资计划和减少年轻人卷入犯罪的机会的努力也对家庭提供了帮助。《收益优惠法》也是如此。它削减了成百万其收入低于28000美元的劳动家庭的赋税，帮助他们走出贫困。对那些以慷慨的精神给急需帮助的孩子提供一个美好的家的家庭，收养税收优惠可使其获得多达5000美元的回报。它刚刚成为法律。我们都希望，它将会为大量需要此项实惠的孩子带来稳固的家庭生活。

这些及其他的措施表明了国家对家庭在我们这个民主共和国的中心地位的承认。尽管这些措施很重要，但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如果我们确实想要巩固家庭的话，它们也只是开端。比如，我认为《家庭和医疗休假法》应该扩大，允许雇员每年有24小时的无薪休假，用以参加家长——教师会议和对孩子进行定期医疗保健检查。另外，我还支持一项“灵活时间”动议，它允许工人通过加班来换取带薪休假。

我提出的对教育和技能发展进行减税的倡议将大大增加家庭具有更大稳定性的机会，我们应使之成为我国的法律。

尽管事实上在合众国的任何一个州向年幼者出售烟草制品都是非法的，然而势力巨大的烟草业长期以来仍以孩子作为广告和营销用语的目标。我们支持使这种营销不合法的努力。每天都有3000多名年轻人开始吸烟，他们当中有1000多人最终将死于与吸烟有关的疾病。烟草业无权向孩子兜售香烟，也无权直接或间接地鼓励他们吸烟。这样做是不道德的。

不过实际上，政府在巩固家庭方面的作用虽然是重要的，却也是有限的。所有美国人都必须致力于这一目标。它需要父亲和母亲们的不懈努力，需要社区组织的支持，需要有爱心的、负责任的企业的合作，需要各级政府的协助。在“进步年代”，当面临新的挑战时，人们向国家领导人寻求帮助，今天也正像那时一样，在廓清问题、指出道路并动员人们努力去解决问题的方面，人们需要国家的领导。

电视暴力问题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了我们如何才能共同工作以达共同目标。多年来，全美国的父母们一直说电视节目中的暴力和色情内容太多，并大声疾呼政府应保护他们的孩子不受家里不该有的图像和言词的影响。在一项又一项的研究中，表明这类节目具有腐蚀性，使人愚钝和堕落，有关证据也在不断增加。父母们主张他们有权，以能巩固其价值观的方式来抚养孩子，而以满足成人为目的的节目在他们的家里是不受欢迎的侵入者。

反过来，电视广播业者说他们也有权利，并声称政府的控制侵犯了他们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权，而且体现着对私人市场的自由运转不恰当的干预。这是民主制度下典型的竞争性权益间的冲突。

我们达成的解决办法是：电视广播业者自愿进行分级、并在技术上使用一种被称为 V—芯片的小部件，使父母能将他们厌恶的节目滤出。这是一个美国人如何才能共同工作以找到共同基础、解决困难问题的完美例证。政府并未强制采用这一解决方法，但政府促成了它的实现。我们通过法律规定了 V—芯片的安装，并对该行业做工作，使它们支持这一法律，并要它们做最擅长的事——生产并对节目进行分级，然后，把决策权留给各个家庭。我们并未对电视设立新的管理措施，而是鼓励它们自律。我们并未取代父母的作用，而是把具备了新功能的遥控器交给他们，并说，实际上，对一个孩子来说，最好的节目导演就是有责任心的父母。

通过这一协议，私营企业创造和生产任何将被市场购买的产品的权利得到了保护，但由于有了对其节目内容进行分级以使父母们感受到该滤出哪些节目的责任，这种权利又受到了平衡。父母们有权使其孩子看高尚的电视节目，但又负有自己决定什么恰当、什么不恰当的责任。政府只是促成了这样一种机制，使他们的权利得到保护，他们的责任也得到体现。不过这件事并未结束。随着《电信法案》的通过，我们有了 V—片技术，也有了分级的承诺。在以后的岁月中，我们需要确保分级的承诺得到遵守，同样重要的是，确保父母们利用这些协议提供的机会。V—芯片只是第一步，我们还需要更多具有积极意义的节目。最近，在我的催促下，娱乐业同意增加它们生产和播出的教育电视节目，并致力于改变少儿电视节目的内容，减少暴力，更好地支持我们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共同工作为我们带来了有关限制电视暴力的协议，同样也会给我们带来更好的少儿节目。在产业领导人的第二次会议之后不久，联邦通讯委员会（FCC）批准了一项新规定，要求电视网络上每周要有 3 小时的教育节目，这得到了娱乐业领导人的普遍支持。

两个多世纪以前，托马斯·杰弗逊断言，美国民主的基石是“自耕农场主”。尽管杰弗逊自己是个农场主，他并不是在替农业做宣传。他的观点是，民主不会随某些政治精英的力量的兴衰而兴衰，只会随着与社会的运转利害攸关的并负有责任的普通人的力量的兴衰而兴衰。

今天，我们的“自耕农场主”就是美国的家庭。家庭代表的价值观，家庭传授给自己孩子的经验教训，家庭为塑造自己的未来而担负的责任，以及

家庭试图实现的梦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以及我们能成为什么样的国家。但只有美国民主为家庭提供使之繁荣的环境，家庭才能稳固。如果在福利方面陷入困境，家庭就不能稳固。如果谋生和供养孩子的机会不稳，家庭也不能稳固。除非有机会获得教育，否则家庭就不能获得经济安全。如果家庭邻里的街道不安全，或者环境恶劣，或者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事件看来具有威胁的话，家庭也不会稳固。

家庭是构成我们这个国家大社区的基础。巩固家庭的问题与美国利害攸关，美国对此负有责任。反过来说，美国的家庭也与美国的稳固利害攸关，也负有责任。这种巩固的过程、担负责任的过程，始于家庭，扩展到邻里，再发展到社区，最终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美国。

创造更加美好的美国的关键是创建更稳固的社区，在那儿美国的多样性要得到尊重，甚至得到赞美。这对美国是个持久的挑战。大量的移民遭受隐晦的或不那么隐晦的歧视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今天，美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多样化。认识到这一点，人们将会很吃惊：出席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国家有 197 个，而在美国最大的县生活的人就可分成 150 多个不同种族和民族集团！我们怎样才能把美国所有这些多样性都包容下来，同时又保持强有力的国家公民意识呢？首先必须指出的关键一点，就是美国人不是通过种族、宗教或任何其他显著的特性联结在一起的，而是通过共同忠诚《独立宣言》、《宪法》和《权利法案》、通过共同接受公民身分的权利和义务的共同性而联结在一起的。

我在阿肯色的温泉城读中学时上过拉丁语课，有过一位杰出的任课老师，即伊丽莎白·巴克夫人。虽然我很讨厌学习拉丁语的词尾变化，但它在以后帮助我弄懂了美国格言 *E Pluribus Unum* 真实含义中的某些很重要的东西。这个词的拉丁语义并不是“我们是一家”，而是“我们一直努力成为一家”。这正是林肯所说的我们“未尽的工作”。

创建一个实践我们格言的要求的社区是非常艰难的，我们历史上充满着能说明这一点的例证。我们有过阶级的分野。我们打过自相残杀的战争，也打过征服其他人的战争。我们有过宗教和民族冲突。我们曾对每一波移民潮都抱有偏见，尽管我们自己就是移民的后代。而且，显然我们从一开始就要与种族冲突作斗争。

今天我们仍要对付其中某些问题。种族间的紧张关系仍然把我们分隔开来。在宗教表达尤其是在学校的宗教表达方面的不同意见仍然针锋相对。而移民问题又成了众人辩论不休的话题。

儿时我生长在实行种族隔离的阿肯色州。我乘公共汽车上学，车费是 5 美分。我和我的朋友都喜欢坐在汽车的后半部分。公共汽车拥挤时，就会有人向我们指出，坐在公共汽车后半部分的应该是黑人。其他的我就知道了。歧视并非与生俱来的，得有人教唆。

马丁·路德·金曾说过，人们之所以互相仇恨，是因为他们互相害怕。他们之所以互相害怕，是因为他们互相不了解。他们之所以互相不了解，是因为他们互相不能交流。他们之所以互相不能交流，是因为他们彼此隔离。我们的经历中令人悲哀的教训是，有时我们相邻而立，却仍彼此隔离，心与心之间相距千里。

如果想要建立稳固的社区，我们就必须缩短这种距离。我们必须消除仍然撕裂着我们的国家的种族分界。我们不能休息，除非不再有因仇恨而导致

的犯罪，不再有种族暴力；除非我们已超越了那些细微得很、但仍普遍存在的种族分野，这一分野使我们不能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国家成为团结在一起的强大社区。在实现这些以前，我们将无法实现被称为美国的这个承诺。

我们必须诚实地面对自己在这场斗争中所处的位置。在这个国家消灭歧视的工作并未完成。在阿肯色的霍普，我祖父的小店附近的黑人街区是该城唯一没有铺路的地区。电影院是隔离的。我毕业的高中也是隔离的。30年前，很难看到妇女或有色人种担任警官、消防员、医生、律师或大学教授，信不信由你，甚至很难看到他们成为体育运动员。

今天人们变化着的认识并不是偶然的历史趋向。毕竟，最高法院拒绝了我们可以长久隔离但平等的观念，且共和党 and 民主党一样都支持了反歧视的法律，并创建了“肯定性行动”计划以纠正几个世纪以来对少数族裔和妇女的不公正待遇。

“肯定性行动”的意图是给每个人以公平的机会，但它的运转并不总是顺利的和公平的。现在，有些人似乎认为“肯定性行动”的目标已经达到，认为应该结束它。可这些目标还没有达到。在达到目标之前，我们需要做的当然是改善“肯定性行动”而不是终止它。

这正是我们努力在做的：结束滥用法律，禁止配额，使“肯定性行动”受到严格审查，反对给任何不合格的人以任何好处，并特别努力确保每个人获得的不是一个保证，而是一个机会。

倘若每个人都有工作的机会，并尽他或她的能力来提供服务，那我们都将更强大。从少数族裔和妇女在我们军队中创造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些人是在我成为总统以后获得在25万多个新职位上服役的资格的。被任命担任内阁和其他重要行政职务以及联邦法官职务的少数族裔和妇女人数创下了纪录。这当然促进了公共利益。他们的贡献将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我们必须认识到，所有的美国人，不管来自哪一个民族或种族，都分享着同样古老的价值观，勤奋工作，照顾家庭，缴纳赋税，遵守法律。我们必须记住，所有美国人都要面对犯罪、毒品、家庭暴力和少女怀孕问题。而共同解决这些问题与我们大家都利害攸关。正象金博士所说：“我们必须学会像兄弟那样一起生活，否则我们都将像蠢货那样消亡。”

同样的对宽容和平等权利的支持也应当决定我们对移民问题的态度。要记住我们是一个移民国家，一个法制国家，这对我们大家都很重要。合法移民造就了今天的美国——一个生气勃勃的多样化的国家。由于移民为我们的社会贡献精力、思想和实在的勤奋工作，所有人都更加富有了。现在合法进入我们的国家并开始获取公民身分进程的移民，与我们自己那些作为奋斗者的祖先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应记住这一点，并拒绝那些反对移民的主张，它们是一种在薄薄的面具掩盖下进行歧视的借口。

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必须反对非法移民。自1992年以来，我们已将边境的巡逻增加了35%；部署了地下感应器、红外线夜视仪和加密无线电设备；修建了一英里又一英里的栅栏并安装了大量的新照明设备。通过要求国会制订更多的对雇用非法工人的雇主进行民事和刑事制裁的法规，我们在保护美国人的工作方面采取了强有力的行动。1993年以来，我们已在全国范围内解除了3000多名非法工人的工作。另外，从去年1月以来，我们已驱逐了5000多名犯罪的外侨。我已明确表示，反对福利改革法案中不给合法移民福

利待遇的附加条款。合法移民工作、交税并承担其他许多我们彼此互相承担的义务，因此，我们应当改变这些条款。我仍反对给非法移民福利待遇，并认为那些资助移民的家庭成员应在法律上负有抚养的责任。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我反对强迫我们的教师把非法移民的孩子甄别出来并赶出学校。这是一种心地刻薄的、短视的做法。每一个主要执法部门都指出，这只能加剧街头犯罪和帮派问题。最后，我们引人的历史性政治避难改革已使新的避难申请下降了 57%。

如果我们要实现我们的宪法中包含的价值，如果我们要履行美国的承诺，那么我们就必须成为一个民族——白人、黑人、亚洲人、拉美人——不互相隔离的集团，而是邻居和公民同胞，分享基本的美国价值观，并愿靠它们生活。现在，在 21 世纪的边缘，我们将不能作为一个分裂的社区而生存下去。

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的信仰给我一生以力量和安慰。这种信仰属于个人，且在很多方面是保守的。因此，我认为政府在非常个人化的事务中几乎不能起什么作用。

我们的国家是由有强烈信仰的人们创建的。那些来到这块新土地上的人当中，有许多人要寻找一个能自由、不受迫害地表达他们宗教信仰的地方。开国元勋们相信，只有在神灵指引下我们才能成功地对付国家将要面临的挑战。实际上，他们在《独立宣言》中两次提及“神明福佑”和上帝的指引。我们宪法的第一条修正案保护每个人的言论自由，以及不受政府干预地自由表达他或她的宗教信仰。我确信，对政府干预信教自由的权力的严格限制，已使我们成了这个世界上信教最虔诚的民主国家。这就是我对在 1993 年签署并努力执行《恢复宗教自由法》特别感到自豪的原因。该法案是对最高法院限制人们自由表达其宗教信仰的反应。该法案指出政府应极力避免限制人们表达其信仰，避免因人们这样做而对其施加任何惩罚。

美国人坚信不让政府干预私有的、个人的事务的必要性，这也是我“支持选择”的原因之一。我认为我们都应致力于减少堕胎，所以我努力减少少女怀孕、消除跨种族收养的障碍，并为愿收养孩子的家庭提供税收优惠。我仍相信，最终的选择应当留给妇女去做，她在做出决定前会问问她的良知、医生和上帝。

所有伟大的宗教都教育人们要诚实、守信、负责，要宽厚和有同情心。这些价值观正是我们建立稳固的社区所需要的。对信仰和家庭的尊敬，对他人的尊敬，帮助美国人共同工作了两个多世纪。这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战胜逆境的能力都有很大影响。对不同信仰、不同观念的互相尊敬，有助于美国保持其强大。

我们的开国元勋们知道，宗教自由本质上有着两面性。宪法保护信教自由，但禁止建立国家宗教。这是美国独有的谨慎的平衡。这正是第一条修正案中包含着的天才的智慧。但这并未把我们变成一个无宗教的国家。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

当第一条修正案被援引用以阻碍个人的宗教自由表达时，它是被滥用了。在社区建设中宗教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因为它是属于所有美国人的。要让父母们在他们的孩子信教方面感到有信心，这一点很重要。有些家庭之所以感到沮丧，原因就在于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公立学校被禁止以哪怕最个人的方式表达宗教信仰。

这并不常见，但它发生过。这是错误的。而我的立场是：我相信，第一条修正案并不要求学生每当走进校门就该把他们的宗教信仰抛开。正如我们不会要求学生把他们从宗教中学来的价值观留在家中一样，我们也不应要求他们不表达宗教信仰。加强这些价值观是每一所学校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已要求美国教育部向所有学校发出相应的指示。

几十年前，最高法院禁止任何公共权力机构确立官方祈祷文并要学生背诵，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但学生如果要表达其宗教信仰，则完全没有不恰当。只要他们愿意，任何时候学生都可以私下独自祈祷。在家庭作业中，在艺术功课中，在课堂发言时，他们都可以表达他们的宗教信仰，只要这与功课本身相关。他们也可以在高中组织宗教社团。

虽然学校不能倡导官方宗教信仰，但它们应当教授主流价值观。有人认为这不应在公共教育中占有位置，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在我们的大街上发生的暴力事件并不是价值中立的，电视并不是价值中立的。我们司空见惯的是对人的堕落、道德败坏、暴力和人们灵魂沉沦的表现，与我们的年轻人在家中学到的更美好的价值观相比，这些东西在他们心中占有更多的位置。我们的学校必须成为抵抗这种堕落的堡垒，而且我们可以在不违背第一条修正案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点。本届政府之所以要尽全力推动学校的品格教育，由国家对课程的开发提供鼓励，并确定白宫领导这一运动的人员，也正是出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获得这种权力。美国应成为信仰能得到丰富和发展的地方。

今天，当南方的教堂熊熊燃烧之时，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出于仇恨的行为比摧毁祈祷场所更下作。黑人教堂是礼拜上帝的中心，也是全国数以百万计的家庭的共同社区。不过，偏见和迫害从未在消灭信仰方面取得成功。这就是为什么一年前，站在南卡罗来纳州格里利维尔的锡安山 AME 教堂的废墟前，特伦斯·麦凯牧师能转身对他沉浸在悲痛中的女儿说：“他们并没有烧毁教堂。他们烧毁了我们的做礼拜用的建筑物。教堂仍在我们中间。”今年能参加麦凯牧师新“教堂”的献辞仪式，我深感荣耀。

黑人也好，白人也好，我们必须走到一起来，扑灭仇恨之焰，点燃希望和信仰之火。今年夏天，我们看到了穿过南方直到亚特兰大的另一股火焰——奥林匹克火炬的火焰。它和民主本身一样古老，沿着历史能追溯到希腊，也能追溯到做一名美国人的含义所在的源头：信仰自由、自主，信仰公平竞争、机会平等，信仰互相尊重和荣誉。

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邻居乃至我们的国家社区——要依靠价值、希望、信念和信心，而这些是伴随着信仰及它在这个不确定的、迅速变化的世界上所传播的安全感而来的。

如果不对美国在世界社区中的地位进行讨论，那么任何有关社区的讨论都是不完整的。除非我们决心继续成为世界的和平、自由、安全和繁荣的领导力量，否则我们就无法实现 21 世纪的机会，无法担负 21 世纪的责任或加强我们自己的社区。

我正好出生在半个世纪以前，即二战结束、冷战开始的时候。那是个充满着巨大希望的时代。人们在本国重建自己的生活，而我们的国家则担负起了重建饱受战争摧残的欧洲和亚洲的经济的任务——这将过去的敌人变成了亲密的朋友。但到我上学时已是核威胁阴影隐隐显现的时代，一个在课堂上练习“躲避危险”、在家中挖掘防放射性尘埃掩体的时代。我们遇到了新的、

独一无二的挑战：一个扩张主义的、敌对的苏联，它发誓要埋葬我们。而我们则一心致力于国防目标，遏制敌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建立起足以对苏联核攻击进行威慑的力量，在欧洲保卫我们的盟友，在亚洲、波斯湾和其他地方保护我们的利益不受共产主义的侵犯。

现在，由于美国人民和我们盟友们的慷慨牺牲，由于苏维埃制度内部的衰败和那些身处这种制度下的人们的勇气，冷战结束了。自由胜利了，核恐怖的威胁解除了，全世界人民、包括前苏联人民成了赢家。在这样一个无与伦比的充满各种希望和可能性的时代，民主在全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地方占据了统治地位。自由市场的地位不断上升，那些从中获益的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不断上升。

柏林墙的倒塌使世界得到了重新塑造，但这既没有结束世界上的威胁，也没有结束世界上的风险。只要人类继续争夺权力和资源，冲突就将存在。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使这个时代成为有着巨大希望的时代的许多因素——特别是其中的观念、信息、技术和人民在开放社会的迅速流动——也使我们在破坏力量面前更加脆弱。前苏联的解体消除了显著的威胁，但又产生许多其他威胁：日益互相勾结、日益危险的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和贩毒网；流氓国家的扩张与邪恶的种族冲突和宗教冲突；核武器、生物和化学武器等危险武器的扩散以及疾病、人口膨胀和环境恶化等超越国界的威胁。

这些新威胁中有许多和文明本身一样古老。它们是维护秩序与破坏秩序的力量之间的斗争，自由与暴政的斗争，贫穷与压迫的斗争，希望与恐惧的斗争。它们不仅威胁人民和国家，还威胁价值和观念。正如法西斯主义和后来的共产主义攻击那些把我们与别人区分开来、体现着我们向世界做出承诺的清晰、真实的理想那样，今天的威胁力量攻击自由人民有关安全、开放的社会理想。

尽管世界局势持续紧张，威胁已经浮现，两党中仍有某些人要选择逃避而不是介入，要让我们向内转、无视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国家的国际义务。这些逃避主义者发起了对联合国的全面攻击，虽然联合国能替我们分担介入的费用和风险。他们大砍我们的外交事务预算，尽管它占我们总预算的比例不到 2%。他们反对为我们的产品打开市场、减少壁垒的努力，这些努力是通过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及其后续的世界贸易组织或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和亚太经济合作理事会（APEC）来进行的。总而言之，他们花言巧语地鼓吹美国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却又反对付出保持这种领导地位所需的时间、精力和资源。

这些逃避主义者彻头彻尾地错了——和一战后他们的孤立主义前辈一样地错误。如果要迎接这个新时代的挑战，抓住它带来的机会，我们就必须保持介入。我们无法建起这样一堵墙，它高得足以将对我们的安全的威胁挡在外面，或是能将我们与世界经济分隔开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能不与我们的朋友和盟国合作，我们不能单干。全球向民主和自由市场发展的潮流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不可逆转的。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我们的福祉、我们的力量都依赖于保持我们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美国不能通过“逃避”即逃避我们的责任和承诺来领导，也不能通过自顾自来领导。相反地，我们必须领导各个国家组成的社区，和它一起工作。

像在我之前的总统一样，我不顾国内的反对，采取行动保护我们在海外的利益。我知道，这些行动带来的好处不是几天、几星期，而是要几个月或

几年才能显现出来。但想象一下，比如布什政府时期，如果美国不是在沙漠风暴行动中与盟国一起采取干涉行动、制止伊拉克的侵略的话，波斯湾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也可以想象，如果美国不以武力支持海地的民主进程的话，那儿的人们将长久地处于恐怖统治之下，涌向我国海岸的难民潮将难以遏制。人们也想象得到，如果我们不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将部队派到波斯尼亚的话，人们仍将看到那儿的无情屠杀。想想如果我们不是民主党、共和党一起进行艰苦的努力，通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消除贸易壁垒的话，我们将失去多少机会和新工作。想想如果我们在墨西哥陷入困境时不愿提供紧急贷款，我们将面临的非法移民浪潮、丧失的工作机会和不断增加的毒品走私的威胁（顺便说一句，这笔贷款和利息均已提前偿还，这使我们获得了近 5 亿美元的净利润）。

当然，美国不能充当世界警察。但我们能成为世界和平缔造者。我们不能像伍德罗·威尔逊曾相信过的那样单方面地“使之成为一个民主能在其中安全地存在的世界”，但我们能在使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更加安全方面提供帮助。我们对全球政策的选择不能建立在目前的预算战的基础上，也不能建立在一时的政治狂想或恐惧散布者及一批孤立主义者大声叫嚷的煽动的基础上。我们的选择必须植根于信念，必须忠实于我们的价值观，必须无愧于我们的责任。

在这样一个时代，有老的和新的问题、老的和新的威胁、国家之间老的和新的联盟，而我们的目标则始终如一：确保美国继续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维护和平与繁荣的力量。我在就职之时说过，当进入 21 世纪之时，我们需要有新的战略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一战略包括三部分：第一，保持我们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强有力的联盟，以打击对我们安全的主要威胁，如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和恐怖主义，从而使美国人民更加安全。第二，在全球强有力的和平与民主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第三，通过打开海外市场，为国内创造更多的财富。

我们坚持执行了这一战略，并开始收到成效。与 4 年前相比，我们的军事力量更强大了，联盟更紧密了，我们正在挫败对安全的主要威胁。长期以来被认为无法解决的冲突向得到解决的方向靠近了。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多的市场对美国的产品和服务开放了。

今天，美国有世界上训练最佳、装备最佳、准备最充分的战斗力量，而这，比其他任何单一因素都更应被视为我们获得持久安全的关键因素。相对武力而言，我们更愿意依靠外交，但在有必要保卫我们的国家利益时，我们也总是愿意使用武力。正像本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做的那样，我们将通过我们作为榜样的力量来领导，但也准备在必要之时，通过榜样来显示我们的力量。

就职以来，我一直遵守维持我们的防务力量并使之现代化的诺言。我们完成了对我们未来的军事需要的全面评估，并对我们的军队进行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改造。尽管军队的规模缩小了，其能力、待命状态和质量优势却得到了提高。

结果，我们的军事和情报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机动、灵活、准确，更具适应性、更机敏、待命程度更高。而且，它们不仅自身内部的配合与行动更加顺畅，同我们的盟国之间的配合与行动也是如此。现在，我们的军队仅需发出威胁就能遏制住可能的侵略者。正像最近我们所看到的，当我们在

波斯湾动员力量，反击萨达姆·侯赛因再一次在科威特边境集结军队的孤注一掷的企图时，情况正是如此。此后在海地，当独裁者们知道我们的武装力量已经出发时，他们最终下台了。

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作为各个国家社区的领导者，我们将创建、支持和领导国家与制度间的联盟，只要这些联盟既能促进我们的国家利益，又能促进我们的国际伙伴的共同利益。正像我们在波斯湾战争、海地以及现在在波斯尼亚所看到的那样，许多其他与我们有着共同目标的国家也将分担我们的负担——通过北大西洋公约，通过联合国，通过联盟。冷战的结束，为我们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能通过建设一个和平、统一和民主的欧洲，以及在一个更加开放、更加民主的亚洲构建稳定的国家社区，来完善和扩大我们的联盟。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

在欧洲，我们继续履行对北约的责任——这巩固了与老朋友的关系。今年，我们扩大了欧洲盟友在适当时机、在联合行动中施行领导的机会，并使它们在共同防务负担中承担了更大的份额。我感到自豪的是，美国率先将北约的大门向欧洲新民主国家敞开——这首先是通过和平伙伴关系协议、不久又通过扩大北约本身来进行。我相信，北约能为欧洲东部做到、也将会做到它为欧洲西部做过的事：巩固民主以对抗未来的威胁，创造使市场经济繁荣的条件，防止地区内破坏性对手的再次出现。我们希望北约和俄罗斯及其他欧洲统一机构一道努力，创造出整个欧洲历史上一直只是一种梦想的东西：一个真正统一、自由的欧洲。

我们还对几个地区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例如，在俄罗斯实现其向自由市场民主国家的历史性过渡之时，我们一直不懈地努力支持它的改革力量。最近的一次选举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这不仅是鲍里斯·叶利钦总统个人的胜利，而且还是改革和民主的胜利。这次选举表明，就长期而言，俄罗斯最好的希望是继续其争取成为一个稳定、民主和面向市场的国家的努力，在本国获得安全与和平，与邻国和睦共处。我们尽我们所能去帮助它达到这一目标，将使这个世界的安全性得到极大提高。我们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去支持乌克兰、波罗的海地区、高加索地区、中亚和整个中欧的独立、市场改革和民主。

在亚洲，我们的安全战略有4个优先目标：维持我们对该地区的军事承诺；支持亚洲国家间进行更密切的安全合作；在对付新出现的威胁方面提供引导；支持新兴民主国家。我们努力与中国交往，确保它支持核不扩散，同意遵守自由和公平贸易的规则，在地区和全球安全倡议方面予以合作，并对它自己的公民提供基本的人权——简言之，确保复兴中的中国为自己的人民、为这个世界而选择恰当的、作为积极变化的领导者的位置。

我们已经收到了良好的回报：中国在消除北朝鲜核威胁的危害方面与我们进行了合作，它还支持我们与两个朝鲜举行4方和平会谈的倡议。在核技术及材料的出口、禁止核试验方面，我们也得到了中国的合作。此外，在对付共同的威胁如贩毒，以及最近在环境恶化方面，我们也谋求中国的支持。但我们也并不怯于表明我们之间的不同点，并就这些不同点采取行动。当中国在台湾海峡举行威胁性的军事演习时，我向这个地区派出了第七舰队，以表明我们对维持中国与台湾之间的和平关系的承诺。当中国未能信守其严厉打击对美国知识产权产品如光盘盗版的承诺时，我们明确表示除非得到许诺过的合作，否则我们将实施制裁。

对北朝鲜我们采取强硬路线。南、北朝鲜之间的边界是世界上设防最密的边界，平壤维持着总数达 100 万人的常备军。我就职时，北朝鲜的核开发计划已执行了好几年。尽管该计划的某些部分是绝对合法的，但总的看来发展核武器无疑也是它的目标。我决心阻止北朝鲜建立核力量。于是，在盟友南朝鲜和日本的帮助下，经过漫长的谈判，我们达成了一项协议。它不仅冻结了北朝鲜的核计划，还确保其核设施的拆除将在国际监督下进行。但这仅仅只是开始。我们的长期目标是南北朝鲜的和平统一。我希望我们发起的 4 方和平会谈进程使我们更加接近这一目标。

尽管偶有贸易纠纷，我们与太平洋盟国日本的关系继续加深。经过长达一年的评估之后，今年春天，我们与日本签署了历史性的新安全条约，并对我们在冲绳的军事存在进行了重新谈判。我们还谈判达成了 21 个不同的贸易协议，它们包括了从计算机到医疗产品的各种产品。结果，美国的对日出口大增——在协议涉及的部门增长率达 85%。这意味着美国国内数以千计的新工作，以及日本消费者将得到的更低的价格、更大的选择余地。对两国人民来说，我们与日本的伙伴关系与此前多年相比更牢固、更具建设性了。

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牢固的联盟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需要用它们来对付对我们安全的根本威胁——如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的挑战、国际有组织犯罪和贩毒。

我就任总统时，苏联的解体导致了 4 个核国家的出现，即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而过去曾只有一个。继续诸位前任的工作，减少来自俄罗斯的核威胁，并完全消除来自其他 3 个新独立的国家的核威胁，我将此看作我最重大的责任。如今，没有一枚俄罗斯核导弹对准美国的城市，这是数十年来头一次。我们要把俄罗斯和美国的武库从冷战时的水平削减三分之二。不久以后，乌克兰、白俄罗斯或哈萨克斯坦就不会再有一枚核导弹。

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使摧毁核弹头成为可能的因素，即苏联的崩溃，却也增加了偷盗核材料、出售核武器技术的潜在威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及盟国要和俄罗斯以及其他新独立的国家一起努力，来加强对出口的控制和核设施的安全保护，把核材料从不安全的场地挪走，制止核偷盗及走私，并减少人们能获得的用于核武器的铀和钚。同时，我们还致力于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的材料，控制导弹及相关技术的转让，并通过诸如《核不扩散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协议来防止全新一代核武器的开发。

尽管我们已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事实是只须用一块苏打大小的钚就能制造一颗炸弹，而流氓国家是长期存在的威胁。还须 10 年以上的时间此类国家才能具备发射远程导弹攻击美国大陆本土的能力，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合理的全国导弹防御计划。国会中的某些人想要恢复大手大脚地花钱且极端化的“星球大战”计划——建立一套既不必要、又不明智且违反《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昂贵系统，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实际的、灵敏的导弹防卫计划，它应建立在真正的而不是理论上的威胁基础上，而这正是我们将得到的防卫计划。我们已开始每年花费 30 亿美元发展这样的防御系统，直到 2000 年。如果需要的话，这个系统可在 2003 年布署——远在威胁成为现实之前。另外，我们还在对计划进行充实，以防御现有的短程中程导弹对我们的部队和盟友进行攻击的威胁。

核武器需要核裂变材料、先进技术和巨大的资金投入，而化学和生物武器却不需要。这使它们不仅被流氓国家如伊拉克所得到，还被躲在暗处的极

端主义组织如奥姆真理教所获得，该教曾在东京地铁上施放沙林神经毒气。3届美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共同工作了10多年，谈判达成了《化学武器公约》。如今它被搁置在参议院等待批准。我们正努力工作，要通过谈判以法律约束来加强《生物和有毒武器公约》。我们的警惕性不应仅局限于核武器，我们还应在化学和生物武器控制协议方面采取行动，而且要迅速行动。

要保持美国的强大和安全，还需要勇敢地面对互相关连的新威胁：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和毒品。这些破坏性力量摧毁平等的机会，它们眼里是没有国界的。没有人能幸免于它们的危害。日本人民不能幸免，他们遭受的毒气攻击使几千人受伤；拉美或东南亚人民不能幸免，在那儿，贩毒者用进口的武器屠杀成百的无辜者；以色列人民不能幸免，仇恨煽动者炸毁了满载儿童的公共汽车；前苏联人民不能幸免，那儿有组织的犯罪正在损害新生的民主。

美国人民也不能幸免。跨越半个世界，在沙特阿拉伯，19名我们最优秀的青年军人在保卫我们的国家利益时丧生于卑怯的炸弹袭击。就在美国，似乎是土生土长的恐怖分子炸毁了MURRAH联邦大楼，而外国恐怖分子则试图炸毁世界贸易中心。贩毒者毒害我们的孩子，培育街头暴力。

这些破坏力量绝不可能放弃破坏，但我们也绝不会投降。以钢铁般坚强的决心、坚定和意志，我们将击败它们。我要继续大力推动，使我们反恐怖主义的工具中包括可能范围内最强有力的措施。

我们正执行一项包括3个部分的反恐怖主义战略。

第一，我们将使整个世界社会团结起来和我们站在一起。从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和平缔造者首脑会议——在那儿有13个阿拉伯国家第一次谴责了在以色列和整个中东进行的恐怖活动，到我们最近与西方七国中的伙伴以及俄罗斯达成的反恐怖协议，它规定我们将采取具体的共同行动来打击恐怖主义。我们正在共同前进。与以往相比，我们的情报机构和其他国家更多地分享情报，以便在恐怖分子行动之前制止他们、在行动之后抓住他们，并确保将他们交付审判。我们和盟国一起对支持恐怖分子的国家实施了严厉的制裁。在有必要的时候，我们还将单独行动。1995年夏天我签署的一项法律，将有助于阻止伊朗和伊拉克得到它们用以资助国际恐怖主义的资金。

第二，我们的反恐怖主义战略依赖于在国内严格执法、严厉惩处。我们将恐怖主义定为联邦级罪行，扩大了联邦调查局的作用，并规定对此罪可处死刑。我们雇用了更多的执法人员，增加了资源投入，改善了训练。我还提出了一部新的法律，它将有助于防止恐怖分子踏上我们的国土，打击洗钱活动，并对针对海外美国人的暴力犯罪予以惩罚。

第三，我们加强了对飞机和机场的安全防范。从现在起，我们将对更多的行李进行人工检查，对更多的包裹进行扫描检查，并要求对任何飞往或飞离美国的飞机进行飞行前的检查。我已要求戈尔副总统领导在我国机场部署新的高技术检查仪器并对现有的安全措施进行评估的工作。

执法部门要求得到进行电话窃听的授权，以便能在恐怖分子从一部电话移到另一部电话时进行跟踪。在隐蔽的恐怖分子策划犯罪时，这是跟踪他们的唯一办法。我们的法官在对付有组织的犯罪时已获得了这种权力。在与恐怖分子打交道时，给予他们这种权力的需要显然更为迫切。但国会却说不行。

执法部门还要求在用以制造炸弹的爆炸物上附上标记物，即散布在爆炸物中的可用以追踪的化学药品或微型塑料探测芯片。这样，在炸弹爆炸之前，

精密探测仪器就能发现它；爆炸后，警方的科学家也能追踪一枚炸弹至这枚炸弹的爆炸材料的实际出售者。

国会对此也加以拒绝，尽管标记的方法确实有效。在瑞士，过去 10 年里它在 500 多个案例中帮助确定了炸弹及爆炸物的制造者。几年前，在我国对其进行了试验。在马里兰州，它帮助警察找到了一名谋杀者。我们需要这些强硬手段以继续打击本国及海外的恐怖主义。

执法部门、情报部门和军方专业人员所做的工作大多是不能预知的，但我们获得了成果。例如，在纽约，我们防止了对联合国和对霍兰隧道的袭击。我们挫败了在太平洋上空炸毁美国客机的企图。我们审判了那些参与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的人，逮捕了俄克拉荷马城和邮包炸弹案的嫌疑犯。我们在全世界追踪恐怖分子，并将他们带回美国审判。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

正如在二战和冷战中没有任何敌人能迫使我们退出迎接挑战并保卫我们的价值观的战斗一样，在反对今天的敌人即恐怖主义的战斗中我们也不会退缩。我们知道，如果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我们就将取得胜利。

我们还进行全世界范围的合作以加强分享关于打击毒品方面的有关信息，关闭以掩护和洗钱为目的的公司，打击与毒品有关的腐败，并为阻止毒品国际贸易提供军事支持。

某些跨国界的问题对我们的安全构成了不那么急迫、但危险性并不更小的威胁。我们在全世界与疾病作斗争，在世界上对人口压力正吞没地球资源的地区支持其可持续发展，通过食品援助和农业支持来与饥荒作斗争，并以新技术来对付资源的短缺。我们带头保护世界渔业资源，禁止向海洋倾倒放射性物质，终止了危害物种和人类生活或损害大气臭氧层的化学物质的使用。谁要是把饥荒仅看成农业问题，或是把城市拥挤仅看成人口问题，把缺水仅看成环境问题，那他就未能理解人类历史上时有狂暴的潮流。如果被忽略，这类问题最终将成为国家安全问题。

在保卫和扩大民主国家社会，以及在这个仍受到冲突的破坏的世界上成为积极促进和平的力量方面，美国也能发挥特殊的作用。从长期来看，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加强我们自身的安全。当人们自由和平地生活的时候，他们诉诸暴力以解决其问题或蔑视其国民同胞的权力的可能性较小。他们更可能成为良好的贸易伙伴，更可能和我们一起解决共同的问题。对这一点，在我们自己这个半球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里，强大的民主运动导致了在开放市场、对付毒品和非法移民方面前所未有的合作。

民主的到来既不容易、不廉价，也不迅速。正像我们自己历史表明的那样，民主是慢慢建设起来的，并非一蹴而就。历史还告诉我们，正从集权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变的国家是不稳定、易于发生冲突的，尤其是它们未能取得经济进步的时候。

因此，我们对世界上的冲突应有和平解决的承诺，我们对民主建设也应保持稳定且强有力的投入。我们从中得到的报酬将是无价的。由于我们耐心的外交努力、我们承担合理风险的意愿，以及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导人不惧谋杀的子弹与恐怖分子的炸弹的勇气，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在中东实现和平。部分地由于我们的帮助，在北爱尔兰出现了和平的希望。在海地，我们的军事使命完成后，正致力于帮助海地人通过自助过上免于恐惧和贫穷的生活。在波斯尼亚，经过二战以来欧洲最恶劣的暴行之后，美国军队和来自其他许多国家的同事一道阻止了狙击和炮弹的出现。如今，

他们正帮助波斯尼亚人民在和平中重建他们的生活和国家。

在这样一个新时代，我们必须永远牢记衡量人民安全的真正尺度不仅包括他们的人身安全，也包括他们的经济福利。从现在往后的几十年，我相信人们将回顾这一时期，并发现世界贸易体系发生了几代以来意义最深远的变化，这种变化对美国人民的生活有着引人注目的影响。正如我已提到过的，通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通过冷静的谈判如我们与日本在汽车部件问题上所做的努力，对美国产品的壁垒已经减少，我们的出口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仅在前4年就创造了100多万个新工作。我希望，我们继续致力于将我们这一设想变成现实，这就是在亚太这个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实现市场开放。我们还应该继续将自由和公平贸易扩展到各大洲，尤其是扩展到我们的美洲邻居。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工人，最好的产品。如果通过自由贸易给他们从事公平交易的机会，他们就会为美国带来更大的繁荣，同时也帮助世界更快地发展。

世界之所以期待美国的领导，并不仅因为我们的规模和实力，还因为我们所支持的和勇敢反对的东西。我们是自由的灯塔、民主的堡垒，是世界上自由能给人们带来的前景的活生生的例证。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如此。正如社区中的个人既有机会也有责任一样，国家社区中的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寻求和平的世界所提供的机会，那我们就必须承担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责任，而不是对此置之不理。需要联盟，我们就必须去组织；需要谈判，我们就必须去进行；需要投资，我们就必须去投入；需要以武力捍卫我们的利益，我们就必须用兵。

我们必须乐于接受世界对我们的希望和信任，而不是躲避。这不仅是为这个世界，也是为我们自己。

在这个每一天都被技术变得更小的世界上，已经不可能将只影响我们的家庭、只影响我们的邻里和只影响我们的国家的问题从社区的问题中清楚地划分出来了。地球村已不再是一个未来主义的词藻，它已成为实实在在的日常事实。我们的孩子穿的衣服、听的音乐来自全世界，有些孩子甚至还通过互联网与“电子笔友”进行交流。街区的商店里存储的货物可能有马来西亚生产的，也有明尼阿波利斯生产的。如今我们工作的公司的顾客越来越可能既有亚洲或非洲的，也有美国的，它还可能是总部设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公司的子公司。

某些人把这种不断增加的国际互相依赖视为对我们的国家和我们作为美国人的价值观的威胁。但事实几乎是恰恰相反。在世界上影响不断加强的正是美国的价值观——自由、自决和市场经济。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中获益最多的正是美国公司。当世界其他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需求最多的正是美国工人制造的美国产品。

我们不仅在自己的社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与邻居联系在一起，还同样地与世界社区的邻居联系在一起。在我们进入新世纪之时，这种联系只会增加；而随着它的增加，我们也将更富足。在我们的立国原则的指引下，我们不应逃避这种未来，我们还必须共同全心全意地去迎接它——怀着对使我们强大的价值观的信心，怀着对我们抓住未来机会、承担未来责任的能力的自信，去迎接未来。

结语

我要通过回到开始，回到那个来自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市的国内和平队队员玛丽琳·康塞普西翁来结束本书。这是一位年轻妇女，是奔抵我们海岸的一位移民，她得到了机会并且抓住了它，她对自己的未来承担责任，并且已经致力于为她的社区服务。

康塞普西翁女士是美国诺言的象征，国内和平队则是一种隐喻符号，它表明在今天重新兑现那个针对所有美国人的承诺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兑现关于机会的承诺，承担应尽责任的义务以及对于社区集体的职责。

国内和平队，那个给予康塞普西翁女士第一次机会的计划，实际上从它诞生那天起就一直遭到那些自称为稳健派的人士的非难。然而，它却已经为大约 45000 名美国青年人提供了类似的机会。它既体现了使美国得以强大昌盛的价值观，又包含着我所相信的、为了我们的未来美国人必须作出的选择。我们是要一个坚持我们国家的缔造者们所信奉的、我们为之努力奋斗了两个多世纪的、今天国内和平队所依据的那些原则和价值观的国家呢？还是要一个背叛机会承诺、逃避责任义务、社区分裂而不团结的美国呢？

没有什么比去年的预算战更加清楚地说明这种选择是多么不同，没有什么比预算战更清楚地表明今天的危机是什么。预算战根本不是关于我们是否应该平衡预算的争执，我的和国会的预算案都是平衡预算。预算战关乎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是否应该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对我们的下一代承担光荣的责任。它关乎我们是否应该在教育、在环境、在医疗照顾和医疗补助这些要求我们承担义务的方面投资。简单地说，它关乎我们在生活中应该继续坚持还是抛弃我们的基本价值观——义务、责任和社区。

有一首古老的圣歌唱道：“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国家都会碰到决定命运的时刻。”事实上，在我们的历史进程中，有许多这样的时刻。在我们宣布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决定命运的时刻；在我们为捍卫联邦和结束奴隶制而互相开战的内战时期；在新的工业时代使我们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受到怀疑而我们要重申这一基本原则和价值观的时候；在我们到海外为赢得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而战斗和提供援助的时候；在我们在国内战胜大萧条迎接繁荣的时候；在我们于冷战中为遏制共产主义而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的时候。

现在，我真心诚意地相信，美国人作出决定的又一时刻来到了。此刻，在新世纪的边缘，我们必须在两种不同的美国未来前景展望中作出选择。一种前景展望预示着“人人为自己”、“人人靠自己”的美国。这种前景展望口头上强调个人努力和更健康的家庭的重要性，而实际上并不保证个人和家庭获得成功所需要的工具。这种前景展望分裂我们，而不是团结我们。这种前景展望鼓吹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却不支持维护这种地位所必需的政策。这种前景展望把人民的政府描绘成魔鬼一般，并且对这一事实丧失了最简单的理解力，即美国人必须携手同行，不能抛下任何一个人。

这种前景展望将不会给我们一个我所想要的 2000 年的美国——一个让每个有责任感的美国人都有机会实现自己梦想的美国，一个共同成长的美，一个引导世界走向更加和平、更加自由、更加繁荣的美国。

我有一个不同的关于未来美国的前景展望，一个基于那种使美国强大昌盛的原则和价值观的未来展望，一个使我们团结一致而不是分崩离析的展

望。我的美国不是试图扩张政府，而是试图完善它，使之更好地做人民的公仆；我的美国不是试图降低自由市场经济的地位，而是加强它的地位并关注那些不能指望它做的事；我的美国并不许诺一个尽善尽美的未来，而是提供一个进步的途径。

我的前景展望是一个真正进步的未来展望，是从我们开国者的原则不断延续到我们下个世纪的繁荣的展望。这个前景展望的组成部分简单明了。它们包括我已经在此书中阐述过的许多切实可行的、但仍要努力贯彻的建议。例如我们必须今天在今天就投资于我们的人民，使他们在明天能够获得富有创新性的成功，通过像“美国希望奖学金”那样的倡议，使我们的大学之门开得更更大一些。除开别的措施，我们还必须通过《家庭和医疗休假法》，帮助更多的人既做好父母又做好工人。我们还必须实施诸如通过取缔那些威胁着保卫我们的警察的枪支弹药的措施，来保护我们人民的安全。我们必须完成那种能真正使人们摆脱依赖，实现独立，并对我们的孩子有利的、现实的福利改革任务。

除了这些措施以及其他相关步骤外，我们还必须保证不在那些已经取得进步的领域中退下来，诸如努力限制烟草工业对青年人的广告吸引力；完成在我们的街道上投入 10 万警力的任务；加强环境保护；以及通过国内和平队向人民提供机会，使他们为其社区服务并救助自己。

如果我们继续贯彻已经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成就的机会—责任—社区战略，我们就能建设一个领导世界走向更加和平、更加自由和更加繁荣的美国；一个有着惊人的多样性力量而又团结一致的美国；一个让我们所有的，不论其出生在哪里的孩子都有机会梦想成真的美国。

去年，我的妻子希拉里写了一本关于孩子们的书，该书借用一条古老的非洲谚语作标题：“养一个孩子，要花费全村人的心血。”在结束这本书的时候，我想到这条谚语的真实含义是人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建立这样一个村庄。

我们能够建立那样的村庄。我们能够打退分裂主义和犬儒主义的势力，使我们国家的社区恢复生机。我们必需相信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每当我们萎靡不振、疑虑重重的时候，我们应该记住世界上其他的人是怎样看待我们的。美国像一座自由、机会与和平的灯塔屹立于世界，不同国度的奥林匹克运动员一次又一次向我提到这一点，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从中东到南非，从前苏联各共和国到波斯尼亚和北爱尔兰我去年访问爱尔兰的时候，遇到谢默斯·希尼这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他记述了爱尔兰长期斗争的编年史和他自己与犬儒主义、失败情绪斗争的历史。他的某些诗句使我特别感动，我曾有一次对爱尔兰人民的演讲中引用过这些诗句。后来，他好心地将这些诗句抄录给我。这些字幅现在就挂在我在白宮的书房里，我经常欣赏它。有一行诗总是跳到我的眼前——特别是当“希望与历史的乐章”响起的时候。

我深信今天的美国正站在希望和历史之间，并处在这一特定时刻的边缘：此时，希望与历史这两种强大力量合而为一；此时，我们既敞怀迎接新世纪的曙光，又从过去的历史中汲取力量、得到指引。我对这个富于可能性的新时代充满信心，我们将迎来最美好的时代。

谢辞

这本书来自过去几年中的无数次讨论，参与讨论的人包括不同阶级的男士女士。我特别要感谢所有那些在公共生活中与我共同努力，发展和实践了本书中许多思想的人们。我的关于美国准备跨入 21 世纪时所面临的挑战的观点，就是这些思想浓缩提炼的结果。我要感谢每个人，感谢他们花时间和我分享他们关于如何才能使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继续成长和繁荣的思想。

如果没有副总统阿尔·戈尔和我妻子希拉里的支持、学识、经验和智慧，我就不可能写成这本书。我感谢他们二人。

我要特别感谢作家和公共政策顾问威廉·诺思德夫特，是他主要负责起草了这本书。我还要感谢他的助手乔林·墨菲。他们的专业素养、写作技巧和勤勉努力，对本书的整个形成过程大有帮助。

伊莱·西格尔对促使完成这本书提供了帮助，我一如继往地感谢他对我们的长久友谊。

最后，我想感谢时代书屋出版社的全体员工，尤其感谢出版商彼特·奥斯诺斯和编辑主任斯蒂夫·沃瑟曼，感谢他们热情而持久的帮助。

附录 1 ' 96 美国大选：总统候选人辩论词（第一场）

1996 年 10 月 6 日晚 9 时，在美国东北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举行了 1996 年美国大选的第一场总统候选人辩论。在这场持续 90 分钟的辩论中，民主党候选人比尔·克林顿和共和党候选人鲍勃·多尔就广泛的国内和国际问题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辩论会由美国公共广播网《新闻节目》主持人吉姆·莱勒主持。辩论词全文如下：

莱勒：晚上好。我们现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的布什内尔剧场，我是公共广播网《新闻节目》的吉姆·莱勒。欢迎收看 1996 年的第一场总统候选人辩论。辩论双方是民主党候选人比尔·克林顿总统和共和党候选人鲍勃·多尔参议员。

这一活动是由“总统候选人辩论委员会”发起组织的。辩论将持续 90 分钟，并遵循竞选双方共同制订的规则。每人发表各为两分钟的开场致辞和结束致辞。在此期间，要提出一系列问题，对每个问题的讨论都分为 3 个部分：一分半钟的回答，一分钟的反驳，半分钟对反驳的回应。我将凭借双方都看得见的提示灯，促使候选人遵守时间规定。

依照辩论双方制订的规则，候选人之间不能直接相互提问，将由我来提出问题，问题的范围不受限制。今晚辩论的先后次序是通过抛掷硬币决定的。

现在进行开场致辞，由克林顿总统首先致辞。

总统先生，请。

克林顿：谢谢吉姆。谢谢我们的主人，哈特福德的市民们。我首先要再次说明，我极为尊重多尔参议员，极为尊重他从事公共服务的生涯；我将尽力使这次竞选和这场辩论成为观点交锋的场合，而避免相互侮辱。

4 年前，我在失业率居高不下和挫折感不断增加的时候投身于总统选举。我想用以下的计划来改变国家的面貌，即让所有人享有机会，要求所有人承担责任，形成人人都能发挥作用的美国社区。我希望有一个更精干并且更少官僚习气的政府以帮助人们获得充分享受其生活的条件。4 年前，你们接受了我的信念，现在可以看看我们的成绩记录：增加了 1050 万个工作机会，收入在增长，犯罪率在下降，接受福利救济的人在减少，一个强大的美国生活于和平之中。

我们比 4 年前过得更好，让我们保持这种势头。

我们把联邦赤字削减了 60%。现在我们要平衡预算，并且还要保护医疗照顾、医疗补助、教育和环境不受损害。

我们使 1500 万美国人减轻了税收负担。现在让我们为了教育和抚养孩子通过新的减税计划，帮助人们应付不测的疾病事故和购买住房。

我们通过了《家庭和医疗休假法》。现在让我们扩展这一法律，让更多的人既当好父母，又能在工作中取得成功。

我们通过了增加 10 万警察的法案、禁止攻击性武器法案和《布雷迪法案》。现在让我们继续前进，完成把警力投入街道的工作，遏制青少年犯罪团伙。

我们通过了福利改革法案。现在让我们促使 100 万人从依赖福利走向工作自立。

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把教育置于第一优先的位置，使每个 12 岁的孩子都会使用互联网络，每个 18 岁的孩子都能上大学。

我们能够建设起那座通向 21 世纪的桥梁，我期待着就如何具体实现人生这一目标展开讨论。

莱勒：多尔参议员，请。限定两分钟。

多尔：谢谢。谢谢总统先生的善意之辞。谢谢哈特福德市的人们，谢谢辩论委员会，谢谢所有会场外的人们——那些正在收听或收看辩论的人。

能作为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站在这里，我倍感荣幸。我对自己得到共和党提名感到骄傲，并对民主党人和独立派选民一视同仁。对我来讲，有 3 个人对我有特殊意义：我妻子伊丽莎白，我女儿罗宾，她们从未使我失望；来自纽约名叫弗兰克·卡拉法的同胞，一些年以前在意大利的山区中，他与奥利·曼尼南一道把我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从他们那里我懂得了人人都有困难的时候，有时你会需要他人的帮助。而相互帮助正是美国的意义所在。

我还记得是医生和护士们使我获得了新生和未来，特别是芝加哥的汉帕·凯利基医生。自那时以来，我一直在试图回报我的国家，回报我的同胞诸如今晚正在收看我们辩论的人们。

美国是地球上最了不起的国家。而我知道你们中有成百万人仍然生活于焦的不安之中。为了实现人生目标和获得饭桌上的食品，你们必须付出越来越大的努力；你们对自己孩子的生活质量和安全感到担心——特别是教育质量。不过，更重要的是，你们对未来感到忧虑，吃不准你们的孩子们还能不能得到你我这一代人曾经得到过的机会。杰克·肯普和我今晚将分担你们的看法。杰克·肯普是我的竞选伙伴——他的工作卓越超群。

现在，我将尽量坦率直言，而且很早以前我就知道说出去的话是收不回来的。今晚我向你们保证，我将试图触及你们关心的问题，而不是利用这些问题。做到这一点不容易，但是长期以来我一直在反对其他耍滑头的办法。我再次说明，今晚能到这里来我深感荣幸。

莱勒：总统先生，第一个问题。关于联邦政府的作用，你的看法与多尔参议员有很大的不同。你如何看待这种差异？

克林顿：好的，吉姆。我认为联邦政府应该向人们提供手段，并尽力创造条件使我们能充分享受生活。对我而言，这是关键所在。正是这一点使我与多尔参议员产生了某些不同的结论。

举例来说，我们已经把联邦政府压缩到 30 年来的最小规模，我们比我的两位共和党前任减少了更多的规章制度，取消了更多的联邦计划。但是，我同时又在尽力推进如下事情，诸如《家庭和医疗休假法》、《布雷迪法》、攻击性武器禁令，以及把 10 万警察投入街道的计划。对于所有这些计划，多尔参议员都加以反对，而我是支持这些计划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为帮助人们充分享受其生活所必须做出的努力。

我努力帮助各个家庭向孩子们传授价值观念。我支持 V-1 芯片计划，这样家长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可以决定让他们看什么电视节目，我同时还支持把电视节目划分等级的制度，支持电视教育节目。我支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制止烟草公司向青年人推销、进行广告诱惑和出售香烟。我支持大力增加“安全与无毒学校计划”。

这些就是我与多尔参议员的不同之处，而我相信，正是在这些领域美国应该团结一致地帮助每个人和每个家庭充分享受其生活，并使他们的孩子具有良好的价值观和美好的未来。

莱勒：多尔参议员，请。限定一分钟。

多尔：我认为基本的区别在于（对此我已经有一定的亲身感受了）——我认为基本区别是我相信人民，而总统相信政府。让我们回顾一下他曾经想强加给美国人民的健康保险计划：该计划将占用整个经济产出的七分之一，带来 17 种新税、价格控制以及耗资达 1.5 万亿美元的 35 个到 50 个新的官僚机构。别忘了这件事，它就发生在 1993 年。

还有一次增税行动，即不仅是针对富人的，而是波及每一个美国人的。

按照最初的计划，你赚到 2.5 万美元，你就要多交“社会安全税”。我们都目睹了出现 350 亿美元的汽油税，总计增税 2650 亿美元。

我想我是更信赖每一个人的。我的口袋里总是有一张写有宪法“第 10 条修正案”的卡片。只要有可能，我总是希望把权力交还给各州，交还给人民。这就是我与总统的不同之处，等一会儿我们将讨论具体的分歧。他已经提到了一些，但是还有其他分歧。

莱勒：总统先生，请。限半分钟。

克林顿：我相信人民。我们已经做了不少努力，使人们有更大的权力就自己的事情做出决定。但是，我确实认为我们这样做是对的，比如，在母亲和新生儿能够出院以前再给他们 48 小时 终止强行送走措施。我认为通过《卡斯鲍姆-肯尼迪法案》是正确的，该法案主张不能因为你转换了工作或因为你家庭中某人生病就使你失去健康保险。

我们的政府更精干，更少官僚习气了，而且比前两任共和党总统把更多的权力交还给各州。但是，我确实认为我们应该帮助人们在 21 世纪获得成功做出准备。

莱勒：多尔参议员，总统在他的开场致辞中说“我们比 4 年前过得更好”，你同意吗？

多尔：哦，他比他 4 年前过得好。

克林顿：我同意，说得对。

多尔：我也许比 4 年前过得好，但是我不能肯定这一点，我看到的是本世纪最缓慢的增长。他接任总统的时候，增长率是 4.7 或 4.8，现在降到 2.4。

今年的破产案将在历史上头一次突破 100 万。我们的收入停滞不前；事实上，妇女的收入下降了 2.2 个百分点。男性的工资也不是往上走，而是往下降。因此，我们处在收入停滞状态。

我们的外债处在历史的最高峰，对我来说，只要仔细看一看就会产生疑问，你是否过得好一点：我想有些人会感到日子好过一点。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大概比 4 年前日子好过，但是，美国人民怎么样呢？他们工作辛苦，交的税更多。在本届政府治理下，有史以来头一次，你的收入的 40% 要作为税收交出去——比你花在食物、衣服和住房上的总和还多。因此，只是有些人日子好过了。

他们谈论说，家庭收入在增加。这在康涅狄格州就不符合事实。家庭收入正在下降。在某些情况下收入增长，是因为父母双方都在工作。一个人的工作用以维持家庭，另一个人的工作则是为了支持政府的税收。我们决心要削减税收，以使人们有更多的时间与孩子们在一起，甚至还能一起度假。这正是美国所要求的事情。

莱勒：总统先生，请。一分钟。

克林顿：好，让我首先指出一点，今年 2 月，多尔参议员承认美国经济处在 30 年来的最佳状态中。

我们增加了 1050 万个工作机会，工作机会增加的速度比 1920 年以来的任何一届共和党政府时期都要快；10 年来，工资首次得到提高；新增小企业达到创记录的数目；贫困人口下降的幅度是 27 年来最大的；不管哪一类人的生活都在改善，1995 年收入不平等方面改善的幅度也是 27 年来最突出的：在我们的经济计划通过之后，平均每个家庭的收入增加了 1600 美元。

因此，我认为，显而易见我们的生活比 4 年前好过了。现在，我们所需要做的是注意哪些事情需要做得更好，如何帮助人们（正如我们已经做的那样）在从小企业退休后获得退休全，如何支持健康保险，以及如何教育孩子。这就是我想集中讨论的问题。

不过，正如多尔参议员今年承认的那样，我们明显比 4 年前过得更好。

莱勒：多尔参议员？

多尔：我怀疑今年我是否作过那种承认。不过，不管那种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认为我们只能以目前的事实为依据。

我们要问今晚正在观看辩论的人们：你是比 4 年前过得更好吗？不在于我们两人是否过得更好，而在于他们民众是否过得更好。我们要问观众：你获得食物，抚养孩子是不是更艰难了？你的孩子是否得到更好的教育？在整个美国，过去 44 个月中，吸毒现象增加了一倍。犯罪率确实下降了，但是这要归功于鲁迪·朱利亚尼市长，因为犯罪率下降三分之一集中在一个城市：纽约市。

确实是的，只是有些人更好过了。不过，倾听今晚辩论的人们，应该是从我们的经济方案中得到好处的勤奋工作的家庭成员，当鲍勃·多尔成为总统，杰克·肯普成为副总统时，他们才能真正过得更好。

莱勒：总统先生，多尔参议员在过去几天里，接近于指责你故意歪曲他在医疗照顾改革问题上的立场，你是这样做的吗？

克林顿：完全不是。让我们看看多尔先生的实际立场。

首先，请记住自从多尔参议员成为候选人以来，他在这个竞选季节中一直吹嘘自己从一开始就投票反对医疗照顾，是 1965 年仅有的 12 位投反对票的议员之一。当时他说过，他那样做是正确的，他认为医疗照顾计划在那时行不通。他就是这么说的。然后，他与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共同通过一个预算，削减 2700 亿美元的医疗照顾费用，大大超过为弥补医疗照顾信托基金之不足所需要的限度。这会使老年人支付保险以外的更多费用，而保险费本身还会提高，因为医生们会迫使他们这样做。“美国医协”，“护士协会”、“天主教医协”都声称，按照被我否决的多尔-金里奇医疗照顾计划，数百家医院将被迫关门，人们将受到极大的伤害。现在，按照多尔参议员 5500 亿美元的减税计划，甚至他的朋友、他的竞选活动的两位主席之一的参议员达马托也说，不削减医疗照顾开支，以及社会安全开支，是没有办法弥补减税缺口的。这可是他的话。

我的平衡预算计划可以使医疗照顾信托基金延长 10 年，是 10 年。这样我们就有时间来处理涉及“婴儿潮”一代的更长期的问题。而执行他们那个削减 2700 亿美元医疗照顾开支的计划，会出现使医疗照顾中途夭折的风险，这显然是个错误的计划。未来数年我们将持续进行医疗照顾计划改革，但是我们需要由赞同该计划的人来改革它，而不是由那些完全敌视它的人来改革它。

莱勒：多尔参议员，请。

多尔：好的。我必须说明，我要回顾一下 1965 年关于医疗照顾计划的投票。在医疗照顾计划出现以前，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老人照顾计划”，它也提供药品和体检，需要医疗照顾的人已经得到照顾。我认为它是个不错的计划，因此当时不同意用医疗照顾计划来取代老人照顾计划。不过，自医疗照顾计划通过以来，我一直是支持的。事实上，过去我回家时，我母亲会对我说：“鲍勃，我现在除了享受社会安全计划和医疗照顾计划的保险，别无所。别削减它。”

我不可能违背母亲的话。实际上，我与总统有一天曾经谈论过各自的母亲，那是在白宫进行的一次感人至深的谈话。

我关心健康保险问题。我在公立医院，在军队医院中享有最好的健康保险，我深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过，我们必须制止医疗基金的无节制的增长。他的资产评估员——注意是总统的评估员，而不是我的——说，该基金正在走向破产。包括他在内，该基金的增长有 10 年没有受到限制。我们应该任命一个委员会，就像 1983 年我们拯救社会安全计划时所做的那样。我感到骄傲的是我曾在那个委员会工作过，与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老年人权益的保护者克劳德·佩珀一起共过事。如果我们能排除政治干扰，我们就能再次携手。

不要再吓唬老年人了，总统先生。你已经花了 4500 万美元来吓唬人，并且使他们与我产生隔阂。我认为，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停战了。

莱勒：总统先生？

克林顿：好的。首先我要说，我高兴有一个委员会去处理医疗照顾计划，我赞赏多尔参议员在“1983 年社会安全委员会”中所做的工作。然而，如果通过他的减税计划，那么成立委员会是不可能的，因为就是负责他的竞选活动的两位主席之一的达马托参议员也说，他将不得不削减医疗福利开支，削减得比被我否决的那个议案所建议的还要多。我否决那个议案是因为它过分削减了医疗照顾开支，并且实质上把该制度置于破产的境地。我的平衡预算计划则把医疗照顾计划延长 10 年。我们应该这么做。那样的话，我们才能设立一个委员会。而多尔参议员的计划对这个国家有害无益。

莱勒：多尔参议员，谈到你的税收计划，你至今仍然认为全面减税 15% 是个好主意吗？

多尔：哦，是的，主持人你将是受益者，并且……

克林顿：并且我也是受益人？

多尔：是的，你这位前总统也将得到好处。

克林顿：太好了，我正需要它！

多尔：是的，人民需要它，这是问题的实质。这不是为华尔街减税，这是为家庭减税。这是一种“主于道式”的减税。全面减税 15%——让我们以一个年收入 3 万美元的家庭来说明问题，那意味着 1261 美元。对于坐在这个布什纳尔剧场的某些人而言，这点钱不算什么。但是对于今晚电初观众中那些有一双儿女的人们，对于工作着的家庭，那等于 4 或 5 个月的孩子日托费，或许等于一台电脑，或许是房屋抵押贷款的 3 或 4 个月的偿付额度。

这个经济方案是为我们的家庭服务的。而它总计有 6 点。

首先一点是，官要求增加一条平衡预算的宪法修正案，该修正案曾被总统击败了。他袖手旁观，然后又让 6 位民主党人投反对票。我们以一票之差没有通过法案。法案要求到 2002 年必须平衡预算。

它是一个减税计划，减去一半的投资收益税，这样你们可以拿出钱去投

资，从而创造更多的工作和更多的机会。它减轻财产税。它给每个孩子 500 美元的税收优惠。它涉及诉讼改革。既然总统从诉讼律师那里得到了成百上千万美元捐款，那他大概是不喜欢这一条款的。事实上，在我在奇科市刚刚提出诉讼改革，点燃争论之火——在触及根本——之前，我的手提电话就接到一个诉讼律师打来的电话，他说“我们会起诉你”。因此，我的方案还是改革规章制度的方案。

所以，这是一个出色的方案，总统先生。我们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莱勒：总统先生，你请。

克林顿：可以。问题在这里，它听起来相当不错，但是，包括 7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 500 位经济学家，诸如《商业周刊》这样的经济杂志，甚至多尔参议员的朋友、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前参议员沃伦·鲁德曼，都说这个计划不现实。这里肯定有些道理。方案提议的减税 5500 亿美元，必将导致巨大的财政赤字漏洞，从而引发利率上升，经济减速，使人们在支付房屋贷款、购买汽车、偿付信用卡欠款、偿付大学教育贷款和小企业贷款时要花更多的钱。

扩大赤字没有好处。为了弥补过去的赤字，我们已经备尝艰辛。为填补赤字，900 万人的税额被提高，而且，将迫使削减医疗照顾、医疗补助、教育和环境方面的支出，削减幅度比他和金里奇提倡的而被我去年否决的计划还要大。

所以，它只是好听而已。我们的减税计划限于教育、孩子抚养、健康保险和购置住房等方面，在我的平衡预算计划中减税带来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他恰恰做不到这一点——而国会预算局已经批准了我的预算计划，这是一条正确道路。

莱勒：多尔参议员，你请。

多尔：总统想在以后 6 年里增加 20% 的政府开支，我只要求增加 14%，问题就这么简单。

我要求政府使每一美分的支出都得到回报，而不是对美国家庭提这种要求。我们现在谈论的是 6 年中的 6 个百分点。这笔钱可以返还给工作的人们。我们仍然可以提供“机会奖学金”，这样，低收入的父母与别人一样有机会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更好的学校就读。它会行得通。当它行之有效时，总统先生，我知道你会来祝贺我的。

莱勒：总统先生，多尔参议员提到了诉讼律师，那意味着与竞选资助有关。你个人是如何避免受到为你的竞选提供资助和帮助的人的影响的？

克林顿：好的。我尽力阐明我的立场，告诉人民我站在哪一边，让他们决定是否支持我。参议员刚才提到了诉讼律师。他们通过的《产品责任法案》遭到我的否决——我想他谈的就是这件事，我确实想签署这一法案，并且告诉了人们——国会里的人们——到底什么样的法案会得到我的签署。相反，许多诉讼律师希望我根本不要签署任何这类法案，然而我认为我们确实需要做些事情来减少那些无聊的法律诉讼。

我认为，国会议员们应该对法案进行某些修正。让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有一位工作人员，孩子死于一次校车肇事，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司机酒后驾驶，不过也与校车的故障有关。而司机没有钱。

如果得到我的签署，那么按照新的法案，这样的人得不到任何补偿。我认为那样是不对的。所以，我向国会提出 4 至 5 个这样的具体事例，并且说

道，让我确信这样的人会得到补偿，我们将致力于消除无聊的诉讼，我将签署这类法案。

但是，一般说来，我认为总统只应该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我做不少引起争议的事情——我的经济计划、我在贸易问题上的立场、波斯尼亚、海地、带头冒犯全国步枪协会、带头冒犯烟草公司。有时你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你知道从长期来看这样做对国家有利。我就是这样做的，并且作为总统我还将继续这样做。

莱勒：多尔参议员请。

多尔：他是怎样避免立场上的相互矛盾的呢？起码在诉讼律师的问题上，我仍不清楚。当我关注诉讼律师问题时，我发现你短缺几百万美元，你跑到好莱坞募集到 200—400 万美元，然后把劳工组织召集到华盛顿特区，结果有 3500 万美元进帐。因而、如果没有特殊利益集团起作用，那我就百思不得其解了。在 6 月 11 日国会会议以前，我正好就呆在你附近。

我并不反对诉讼律师、你知道我妻子是一位律师。我们俩是华盛顿仅有的能够相互信任的律师，不过我们确实是律师。我喜欢律师，我并不是讨厌诉讼律师，不过在我看来应该终止那些无聊的诉讼了，对公司的惩罚应该有一定的限度。

你使一大批企业家破产，你的 2650 亿美元的增税方案 70% 是由男女小企业主支付的，这个增税方案是美国历史上最庞大的。我曾在某一天说过，而一位民主党人帕特·莫尼汉也说过，这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的。于是我就修正了它——修正了这个世界史上空前庞大的增税计划。总统先生，在我看来这里面有严重的问题。

你作为总统先生，我要向你指出一点，你没有像 1992 年的布什总统那样履行总统职责。

莱勒：总统先生请。

克林顿：我要说，第一，两年前我签署过一个处理民事纠纷的民事侵权案改革法案。这证明对于合理的民事侵权诉讼改革我是支持的。

第二，多尔参议员对于特殊利益集团的资金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批评。但是，有人反对我们试图挽救受烟草公司影响的孩子们的生命的努力，然后在我们努力制止针对孩子们的烟草广告、推销和出售行为时，跑到烟草种植业者那里吹嘘自己是如何抵制联邦政府的，这个人不是我。有人让制造污染的人进入国会大厅，进入议员办公室，让他们重新起草环境法，这个人不是我。那是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和多尔参议员所为，而不是我。

多尔：完全不是事实。

克林顿，因此，我相信我们应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不要着力去揭露对手的动机，而是着重讨论自己对问题的立场。我认为多尔参议员和我确实有差距。

莱勒：多尔参议员，我要提出一个与总统一样的问题：你如何避免受到向你的竞选提供资金和服务的人的影响？

多尔：我认为这是一件难事，对此我们要诚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进行竞选资金制度改革的原因，这就是我努力团结支持佩罗的选民的原因。我们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我们是个改革的政党，共和党。寻找政治归属的佩罗派选民们应该看一看共和党的政治记录。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党，不管它在 1992 年的政纲是什么，它一直坚持不懈的就是进行竞选资金制度改革。

革。

我与民主党的米歇尔参议员一起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猜想随着双方的争论激烈起来，他耍弄了我。6年或者8年以前我们发起这场努力——他任命3个人，我也任命3个人，共同研究改革竞选资金制度问题。我们后来没有做下去，因为遇到了阻力。

总统先生你建议组织一个委员会，纽特·金里奇也是如此。而我是4年或5年前就这么做了，我们还确实设立了一个竞选资金改革委员会。委员会曾把一个改革方案交给了国会，而你把它否决了。整个过程就是如此。

我们从来不是通过政党来解决竞选资金改革问题的，因为民主党想要利用改革来谋取更多的政治好处，共和党也是这么打算，解决问题必须超越党派界限。

不过，我现在要谈谈吸烟问题。我知道总统已经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多自我表扬。而我想回溯到1965年，我在国会的第一次投票就是反对烟草公司的，那时我说过我们应该要求在香烟盒上贴上警告标志。自1965年以来，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记录是前后一致的。1992年我们通过了一条法案，鼓励各州采取措施禁止孩子吸烟。所有50个州都这么做了。不过法案生效延迟了3年半，直到选举年，总统先生在此之前大概没有想到过要禁止吸烟吧。

吸食毒品的情况增多了——在过去44个月中增加了一倍，这怎么解释呢？可卡因的使用量上升了141%，或者说大麻-可卡因的使用量上升了166%。在我看来，你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你知道，我不会这么做，因此我要指出这一点，以免今晚的辩论走上歧途。

莱勒：总统先生？

克林顿：莱勒先生，我希望等一会儿我们能有机会谈谈毒品问题，不过首先回应多尔先生所谈的问题。

我同意说，华盛顿的两党在职官员一直反对进行竞选资金改革。从我到那里的第一分钟起，情况就是那样。

所以，在金里奇议长和多尔参议员接管国会以后，我去新罕布什尔州的时候有个人向我建议——这是一位先生，不幸的是，几天前他刚刚去世——他建议我任命一个委员会。我与他握手表示赞同他的建议，我任命了我这一方的委员，然而委员会从未建立起来。

然后，多尔参议员的坚定支持者麦考因参议员（今天他就坐在那边），与费因戈德参议员一道，支持并发起了一项竞选资金改革方案。我强烈支持这一方案，多尔参议员的党内同僚却在参议院枪毙了该方案。麦考因参议员仍在坚持努力，敦促他们通过《麦考因—费恩戈德法案》。

因此，我认为美国人民，包括佩罗的支持者，理应知道我的立场是一贯的，始终支持改革竞选资金制度，我将继续这样做。我希望在下届国会中我们能实现这一改革，因为我们确实太需要它了。

莱勒，多尔参议员，请用30秒回答。

多尔：好的。就竞选改革而言，当我们有一个两党委员会时我们可以完成这个任务。排除政治干扰，让那些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是能够理解事情本质的人们参与进来，让他们向国会作出推荐。

现在，总统先生，我们不必误导人们。收看我们辩论的人能够理解复杂的事情，有成百上千万这样的美国人。他们知道共和党还没有实现这一改革；知道民主党不会推进这一改革。我们应该同意由某个别的人来完成它，让我

们用投票来决定这一点。

克林顿：我同意。

莱勒：总统先生，刚才参议员提到了毒品问题。他认为，你对几年来美国青少年吸毒增加负有责任。这样说对吗？

克林顿：嗯，吉姆，我认为每个美国人，不论他承担着什么责任，都应该关心已经发生的事情。我就是这样的。

不过，先看看整个情况。就全国而言，过去4年可卡因的使用量减少了30%；偶尔吸食毒品的人下降了13%。使我悲哀的是，青少年吸毒还在增加，其中11%的人用的是大麻。我感到遗憾。让我介绍一下我为此做了些什么。

我任命了一位四星将军负责在南部边境制止毒品流入我国。作为我国反毒机构之王，当他退休时，这位穿制服的士兵得到了最多的奖赏。我们提交了迄今为止最庞大的反毒品预算。我们急剧增加了对边境地区的控制与执法。我们支持一项包括60种死刑的惩罚计划。我支持大力扩展“安全与无毒品学校计划”，以进一步支持“毒品管制”之类的计划得到切实执行，因为我认为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极为重要的。

那么，尽管我在自己全部的公共生涯中一直反对毒品使用合法化，并且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事实上仍然有太多的孩子们不知道使用毒品是错误的，毒品会杀了自己，对此我是否觉得自己负有某种责任呢？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我只是希望我们今后能做得更好。

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应该被政治化，因为我过去的记录是清楚的，而且我想多尔参议员也不支持青年人使用毒品。我认为重要的是继续工作，直到那些不在乎毒品的危害、不知道毒品会伤害他们身体和破坏他们的生活的人们都获得了正确的信息，并改正了其行为为止。

莱勒：参议员请。

多尔：大家再次可以看到，总统先生，你是很有选择性的。你不想让毒品问题政治化，然而你却毫无顾忌地把医疗照顾问题政治化，在外面吓唬老年公民和其他弱势集团——诸如退伍军人和接受“佩尔资助款计划”之类政府援助项目的其他人。我的意思是，你一直在指责我们做了所有这些坏事，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你在毒品问题上的记录，在我看来似乎确实清清楚楚。你担任阿肯色州州长的记录相当明了，那就是滥用毒品的情况增加了一倍。你反对在那个州任命一位反毒总监，因为你觉得这样一来可能干扰你对毒品问题的处理。而在华盛顿这里，你又将联邦反毒总监办公室的预算削减了83%。你极大地削弱了边境封锁，我是指毒品越境问题，这正是我要阻止的。在我的政府领导下，我们将训练国民警卫队制止毒品越境进入我国。

对于毒品从世界各国侵入我国的这种状况，我们负有责任。你曾经拥有这样一位总监，或者明确地说就是作为麦卡弗里将军前任的那位女士，她曾说应该考虑让毒品的使用合法化，我们需要那种领导吗？我用不着评论发生在你的政府中的其他事情，或者你与毒品有关的过去经历。但是，对于我来说，重要的似乎是那些孩子们应该被制止——如果他们已经吸毒——如果他们开始吸毒，他们应该得到制止，决不能继续下去。

莱勒：总统先生请。

克林顿：首先，我再次说明，在阿肯色州我们确有一位反毒总监，而他对州长负责，就像联邦反毒总监对总统负责一样。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第二，参议员多尔，你曾经投票反对通过《反犯罪法案》，该法案包括了将贩毒团伙头目处以死刑的条款；你还投票要求削减在《安全和无毒品学校法》中向 2300 万学生提供的服务。我并不认为那就意味着你对毒品立场软弱，但至少说明我们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还有，容我提醒你，我的家庭深受滥用毒品之害。我知道眼看着你所爱的亲人几乎被毒品送命是什么滋味，参议员，我痛恨毒品。我们需要齐心协力，我们能做到这一点。

莱勒：多尔参议员，关于政府——继续讨论政府的作用——假如你当选总统，你会试图推翻《布雷迪法》和对攻击性武器的禁令吗？

多尔：如果我没有更好的主意我就不会这么做，但是我已经有了更好的解决办法。这是 15 年来我一直致力于完成的一件事。它可以称作“自动核查”或者“即时核查”，目前已在 17 个州得到运用——诸如佛罗里达、科罗拉多、弗吉尼亚以及其他一些州。

对于某些人来说，你买不到枪——你得不到枪——我们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台电子计算机里储存了 2000 万个名字，这些人都不应拥有枪支。我们应该确保枪支不落入罪犯之手，此外还有其他 8 类人员不应拥有枪支。我已经为此工作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操作很简单：你走进商店，把你的身分卡放入机器里，如果机器发出警铃声，那你就买不到任何枪支，买不到手枪，买不到步枪，更买不到机关枪，空手而归。如果我们真想保护美国的孩子、美国的家庭，以及那些不得不像犯人一样呆在家中的人们，那么我们就必须制止枪支在街头的泛滥。本届行政当局声称他们支持即时核查制度，他们为此获得 2 亿美元的拨款，然而实际上只花了 300 万美元来推进这一制度。

在我们的政府中，也就是在我的政府中，我们将加快这一进程。新的办法在技术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它会使那些不应该拥有枪支的人得不到枪，那是最起码可以做到的。我相信这是一个好主意。它得到了两党强有力的支持，或许这是另一件可以使我们摆脱政党政治干扰的事情。关于《布雷迪法》你谈得很多。实际上只有 1 个人依照《布雷迪法》受到起诉，哦，不对，是依照攻击性武器禁令只有 1 个人遭到起诉，只有 7 个人依照《布雷迪法》被起诉。这就是你一直谈论的那些法律的实际成果。

就攻击性武器禁令而言，在 17 种被禁武器中，目前只有 6 种被禁止出售，因为对其他 11 种的禁令遭到了修正，于是这些武器又回到了街头。让我们共同尊力于推进即时核查制度，因为那将带来真正的变革。

莱勒：总统先生请。

克林顿：首先我要说，多尔参议员反复说明了他是否要推翻《布雷迪法》和攻击性武器禁令。我认为他现在的职务使他做不到这一点，我为此感到欣慰。不过我们还是来看看如下事实。

《布雷迪法》已经使至少 6 万名重罪犯、亡命徒和潜在的凶手得不到枪械。而多尔参议员领导了反对通过《布雷迪法》的斗争，他试图阻止法案送到我的办公桌上。他没有成功，我签署了法案，我为此感到高兴。

然后，当我们把攻击性武器禁令法案送到参议院的时候，又引发了多尔参议员的激烈反对，他反对整个《反犯罪法案》，并且由于“全国步枪协会”就像不喜欢《布雷迪法》一样不喜欢对于攻击性武器的禁令，整个《反犯罪法案》都差一点被葬送了。

不过，两年之后，合法的公民没有失去他们的手枪——当然还包括步枪。我们扩展了《布雷迪法》，那些殴打配偶和孩子的人也遭到限制。这个国家比以前安全了。所以，我庆幸自己参与了促使法案通过的斗争。我相信自己是对的，而他是错误的，尽管我完全尊重他个人。

多尔：噢，总统没有正确地说出实际情况。我的意思是，他说的这些都是攻击性武器禁令生效以前的事情，那已经成为历史了。我对全国步枪协会就说过，那已经成为历史了。你们不必再担心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我自己也不再为这一问题发愁。让我们把事情做得更好。

总统先生，你知道，我们应该停止玩弄政治游戏，不要反复纠缠这一点。如果把所有实行即时检查制度的州使多少武器没有落入罪犯之手的数字累加起来，那将大大超过你刚才提到的数字。所以，按照我的观点，如果你们想要得以保护，那就应该投鲍勃·多尔的票。我们会使即时核查制度法案获得通过，会确保枪支不落入罪犯之手。

莱勒：总统先生，多尔参议员有一天说过，你推行的是一种追求新闻镜头效应的外交政策，它损害了美国在全世界的信誉。他这样说对吗？

克林顿：如果他真这样说过，那就不对了。看看我们今天处在什么地位。在冷战后时期和 21 世纪的边缘，美国仍然是个不可或缺的国家。我一直尽力使我们国家保持着维护世界和平与自由、繁荣与安全所需的最强大的力量。

我们完成了下列工作：首先，我们完成了冷战后世界的安排，支持俄国大量削减核武器，使俄国军队撤出波罗的海沿岸的各国，使中东欧的民主国家与北约建立了新型伙伴关系，我还可以加上一点，即与民主的俄罗斯也建立了伙伴关系。

今天晚上没有核武器瞄准美国的孩子们。自核武器问世以来，在我的任期内首次做到了这一点。

我们为和平与自由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刚就职之际，海地处在一位独裁者的统治之下，他向美国的权威挑战。我就职之际，欧洲最残酷的战争正肆虐于波斯尼亚。现在，海地有了一位民主选举的总统，波斯尼亚则出现了和平——那里刚进行了一场选举。我们在北爱尔兰和中东也取得了巨大进展。

我们还抵御了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有组织犯罪等新型的威胁。我们作出了很大努力在世界上扩展美国经济，贸易量的增长是最快的，新签署的贸易协议之多也是空前的。这是我们的汽车生产重居世界首位的原因之一。

莱勒：参议员请。

多尔：噢，我有不同的看法。要重申的一点是，在波斯尼亚问题上我支持过总统，我想那时他曾经告诉我们部队将在一年之内撤出。而现在据我所知，撤军将推迟到明年的某个时候。

不过还是让我们从索马里谈起。在那里，他们把美国人横拖过大街；在那里，一天之内有 18 位美国人被杀，因为他们空无所有——那些别动队员们，他们被围困达 8 个小时之久。他们没有武器，没有坦克。他们曾经要求获得坦克，而这届行政当局却置之不理，理由是我们去那里只是建设性的。这可以称之为维和行动中的怯懦症。我们把部队指挥权拱手交给联合国，总统没有为此做太多的事。

看一看海地，我们在那里已经花掉 30 亿美元，所得到的只是大约两周前

的一个哀告：你们要派遣更多的人来。因为海地总统在他的——在他的私人庄园里发现了针对他的敢死队，所以需要更多的来自美国的保护。

关于波斯尼亚，关于北爱尔兰，也还可以说一说。在波斯尼亚没有停火。我认为在波黑仍然存在大量问题。我们都同意训练和武装穆斯林，这样他们就可以保护自己——在 1992 年竞选时你是赞同这一政策的——但是实际上一直没有这样执行。政策实施的滞后，意味着美国人回不了家。如果我们不能让战士们依照联合国宪章第 57 款赋予的权利保卫自己，美国人就不应该被派往第一线。

莱勒：总统先生，有何评价？

克林顿：首先，对于在索马里发生的事情我承担全部责任。不过美国人民需要记住这个事实，即事件发生时那些士兵是处在一位美国指挥官的领导之下。我相信，在当时情况下，他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同时大家别忘了，由于他们的牺牲，有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得到了拯救。

第二，在海地，政治暴力比以前减少了很多，很多。

第三，在波斯尼亚，没有重新爆发战争，这实际上堪称奇迹。现在至少已经举行了一次选举，和平机制开始发挥作用了。

在北爱尔兰和中东，我们面临的形势比 4 年前好得多。那个旧世界总是问题不断的，但是如果我们的方向正确，并且由美国来领导，那么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更好。

莱勒：多尔参议员，如果当选总统，你将依据什么标准来决定什么时候将美国军队派往有风险的地区？

多尔：噢，你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们有一个不参与政策。然后，从一战到二战，我们又推行一种强制参与政策。现在，我认为我们必须执行有选择参与的政策。我们必须搞清楚什么时候我们的利益而不是联合国的利益受到了牵连。总统谈及的许多问题实际上都交托给了联合国，是他们在做决定。他派往世界各地的部队比历届总统都多，动辄有数十亿、数十亿美元的美元耗费在维持和平行动中。这些都是事实。

对我来说，事情似乎是这样的，你在做决定的时候，是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作为总司令做出决定。这个决定同时意味着我们的男女青年将赴海外，为保卫我们的自由权利和自由生活而履行义务。我将把自己放在这种位置上考虑问题。

然后我将对五角大楼进行自上而下的审查——不是那种自下而上的审查，那只会导致人人都想获得更多资金。我想用自上而下的审查来决定什么是优先项目，在防务上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并由此出发来扩展其他政策。而现在这种自下而上的审查办法，使得各个行政机构为了拨款相互争斗。

你们知道，总统说过他要削减 600 亿美元防务开支。他实际削减了 1120 亿美元，结果导致加利福尼亚和其他一些州的工厂被废弃。我觉得这是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回过头去审查一下这种做法。正如你有一天在得克萨斯时说过的——你明白自己增税增得太多了——确实如此，而总统先生你裁减防务开支也太多了——确实如此，你或许也应该承认这一点。

而我的政策底线是，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起着领导作用，并且还将继续发挥领导作用；但是，我们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发挥作用，只在涉及我们利益的时候采取行动，而不是听联合国的某位大人物吹个口哨就行动。

克林顿：我们的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状态更好、装备更好。我提出的国防预算与6年来共和党人的预算主张差别不大。

我们正在支出大量资金，以使武器系统现代化。我已经建议进行许多新的投入，以促进战士们生活质量，以帮助这些身着军装的男女，帮助其家庭，促进其训练。这是我郑重的承诺。

你们要问，你在什么情况下决定部署军队？那是在与美国人民的利益攸关的时候，在与我们的价值准则利害攸关的时候，在我们能够切实发挥作用的时候。坦率地说，我们还必须考虑我们的男女青年军人要冒多大的风险。

不过我相信有证据表明，我们的军事部署迄今都是成功的，在海地，在波黑，在我们派兵进入科威特以对付萨达姆·侯赛因的侵略威胁的时候，在我派遣舰队驶入台湾海峡的时候，在我们努力终止北朝鲜的核威胁的时候，均是如此。我相信，今天晚上美国能够处于和平之中，部分原因就在于我们对军事资源进行了有序地、深思熟虑地、有效地部署。

莱勒：多尔参议员？

多尔：哦，刚才我忘了提到北朝鲜和古巴。你们看看北朝鲜，在那里，他们拥有足够生产6颗核炸弹的潜力。在那里，我们与自己的盟国南韩产生了隔阂。韩国人在一场战争中损失了约100万人，那就是朝鲜战争，一场“被遗忘的战争”。有53000美国人为此丧生。我们不应做任何事情来讨好北朝鲜。它是一个封闭社会，我们没有办法进行核查，我们不知道目前的办法能否奏效。然而，我们却一直给予他们好处——有人称之为别的什么东西——确实是某种好处。我们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

再来看看距离我们海岸只有90英里的古巴，我们在那里做了些什么呢？我们通过了一条法律，让人们有权采取针对古巴政府的诉讼行动，而总统把它推迟了6个月。总统先生，在我看来事情似乎应该这样，如果真想发出一种信号，就要毫不犹豫地切实传达出去。如果你想对卡斯特罗实施更严厉的制裁，那么越快越好，不要试图让他日子过好。

莱勒：好的。那么，总统先生，你对古巴持什么态度？怎样处理古巴问题？

克林顿：这个，首先在过去4年里，我们一直在向卡斯特罗政权施加愈来愈大的压力，以促使其更加开放并趋向民主。

在1992年我成为总统之前，国会通过了《古巴民主化法》，我坚决地执行了这一法律。我们更严格地实施货物禁运，而同时又增加了接触，即与古巴人的民间接触，包括提供直通电话的服务，这主要是由古巴裔美国人社团支持的。

接着发生了我们的两架飞机被击落的事件，4人在国际空域被害。他们的行为完全超越了法律界限，于是我签署了《赫尔姆斯·伯顿法》。

多尔参议员说得对，我确实给了6个月的观察期，此后法律才会生效，诉讼状才会被法庭接受（尽管事实上这些法律诉讼已经生效，并已经具有了法律效应），因为我想改变古巴。美国需要得到其他国家的帮助。现在世界上没有人同意我们对古巴的政策。不过，这一法律可以当作一种讨价还价的杠杆，来促使别的国家帮助我们一道推进古巴的民主。

到今晚为止，除了古巴，拉丁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每个国家都

实行了民主。如果我们保持坚定的立场和强大的力量，我们还将改变古巴。

多尔：嗯，我正要指出这一点。我们必须坚定和强有力，我希望将来这会成为事实。它会出现于明年1月份，或许出现于今年剩下的那些日子里。我们过去实际上不够坚定，不够强有力。假如你看一看仍然生活于古巴的不幸的人们，你会发现，那里成了毒品走私贩子的乐园；而对于菲德尔·卡斯特罗，我们缺乏一项坚定的政策。按照我的观点，现行政策失败了。因此，国会通过了一条相关法律，总统签署了它，并且表现得像是为该法律做过很多事情一样；然而就像福利改革那样，总统的实际态度是：好的，我将签署它，不过我会在下一年改变它。

在选举年有许多改头换面的事情，这里面就包括总统一改常态大谈毒品资金和其他许多事情，大谈这一次反吸烟运动，这些都发生在1996年。我认为，观看辩论的人们应该回头去看他过去的记录。他曾反对通过平衡预算修正案；他曾带给你们历史上幅度最大的一次增税；他曾试图接管你们的健康保险制度；他曾反对改革规章制度，这些规章使每个家庭每年付出6000至7000美元。

这是关系到你们家庭的很严肃的事情，是关系你们的生计的事情。就在我们的话题来说，这涉及对古巴采取更强硬的政策的问题。

克林顿：刚才那段说辞中，有好几个偏离主题的不实之词。容我指出一点，多尔参议员本人曾经投票支持增加9000亿美元的税收。他的竞选伙伴杰克·肯普曾说过，鲍勃·多尔“遇税必征”。每个人，包括对民主党和本届政府几乎从无好感的《华尔街日报》都知道，1982年他建议的增税，按照扣除通货膨胀后的美元计算，其提高幅度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

所以，我们至少应该把所有事实都摆出来，这样才会知道下一步该谈些什么。

莱勒：多尔参议员，你曾几次提到保健改革。你认为应该对保健制度做些什么？

多尔：让我先回答有关1982年减税的问题。大家知道，当时我们着力弥补税收漏洞，着重追查大公司的税收问题。我知道，总统先生，你大概是不喜欢这种做法的。不过，我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个公正的、更一致的制度。我们将会得到一个更公正、更一致的制度，我们的经济方案行得通。

关于健康保险——是的，我们最后通过了《卡斯鲍姆法案》。而在1993年总统是反对这一法案的。当时他想强加给我们一个庞大的制度，那将耗费经济产出的七分之一，导致价格管制，并产生出所有那些依附于国家的组织，总成本会高达1.5万亿美元，而且不管人们怎么想都会被迫接受统一管制的保健。实际上大多数人是想看自己的医生的。当鲍勃·多尔成为总统时，人们将可以选择自己的医生，我们是不会胁迫任何人的。

我们因此通过了《卡斯鲍姆-肯尼迪法案》，它涉及2000到2500万人。我们为此努力了4年5年，甚至6年。总统把它搁置起来。甚至在它接近最后通过时，肯尼迪参议员又把它搁置了100天，原因只是他对其中的一个条款不满意。

法案确实顾及到了连续性问题，如果你变动工作，你会继续享受保健。因此，法案里包括不少我们应该有的好东西，它比试图由联邦政府彻底地、全面地接管健康保险的做法强多了。不过，当时的民主党国会自然不想接受。直到我们有了共和党国会，才最终行动起来。我为那些使法案获得通过的共

和党同事们感到骄傲。对于今晚观看我们辩论的许多人来说，这个法案很有意义。

克林顿：噢，听起来相当好，实际上极其错误。多尔参议员你很清楚，我们在 1994 年——不，是 1993 年，甚至没有提出自己的健康保险法案，相反，是试图与共和党参议员一道联合起草一个法案。

他们回答说“不”，因为他们的一位政治顾问建议说，他们要把我所做的一切都贴上大政府的标签，并且确保在 1994 年中期选举之前在健康保险问题上做不成任何事情，这样他们就可以借题发挥了。

是的，或许我们过去胃口太大了。不过，现在我们推进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改革。

我签署的《卡斯鲍姆-肯尼迪法案》将使 2500 万人可能在其变换工作时，或者在某位家人生病而需要请假的情况下，继续享受健康保险。我签署的一条法案禁止强制出院，过去保险公司在发出通知 24 小时之后可以强迫人们离开医院。我否决了多尔参议员的医疗照顾计划，那个计划本来会使许多老人只能接受有限制的照顾，并且还要掏更多的腰包，最后还会导致医疗照顾体系夭折。

莱勒：参议员？

多尔：好的。《卡斯鲍姆法案》中的许多条款是这样的——那是我的条款，比如给长期享受医疗照顾计划的老病号削减费用，确保今晚看着我们的自我雇佣人员可以减少交纳保险金，不是少交 30%，而是高达 80%。现在，你们还有机会进一步少交费用，目前只是一个开始。

我想，我们正在审查自己的减税方案，我们的经济计划，或许能找到一种办法使那些没有得到健康保险的人也能获得保障。因为，在这个国家有很多人没有保险，特别是孩子们，他们应该得到保护。

可以采取的另一种办法是扩大“医疗补助”计划的适用范围。总之，在美国，每个人都将有健康保险，每个人都将不缺乏食品。

莱勒：参议员，请快点结束你的讲话。

多尔：“食品”是我说的最后一个词。

莱勒：总统先生，再来谈一会儿外交。你对自己处理最近一次伊拉克危机的方式和结果满意吗？

克林顿：哦，我相信我们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了适当的反应。

根据联合国的一条决议，萨达姆·侯赛因不能威胁邻国，不能威胁或镇压他们的公民。不幸的是，许多人从来不像美国力图做的那样去关心库尔德人，多年来我们一直用从土耳其出发的空中行动来保护他们。

最近发生的事是一位库尔德领导人邀请萨达姆派兵北上。然而，我们认为，由于整个国际社会已经告诫他不要这么做，因此一旦他违反了这一告诫，我们就必须有所动作。我们并不觉得我可以承担这种义务——我本人肯定不想承担——即派遣美国军队把他从他已到达的地方赶走，然而那却是唯一的办法。于是，从战略上看，恰当的办法就是削弱他威胁邻国的能力。我们通过扩展人们通常所称的“禁飞区”来实现这一点，即把我们盟国所控制的空域范围从科威特边境扩大到巴格达市的郊区。

这样做对吗？我相信是对的。完全有效吗？是否已迫使他北部撤退了呢？是的，他已经后撤了一点点，我希望他能继续这么做。

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人是有寸进尺的。即使所有的盟国一开始都不支持，

我们也必须有所作为。我认为，现在大多数盟国知道我们采取的行动是恰如其份的。

莱勒：多尔参议员，请。

多尔：好的。总统自己任命的中央情报局长说，现在萨达姆比过去更强大有力。我不明白的是，当麻烦出现在伊拉克北部的时候却在南部扩展禁飞区。布什的政府的做法是，让库尔德人来到国务院进行谈判，力图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而现在我们全部的收获是什么？是成千上万的难民。我们甚至用船把其中一些人送到了关岛，我估计有 3000 人之多。事情还牵涉到土耳其，这是个实实在在的问题，而萨达姆可能比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我们发射了什么，44 枚火箭吧？每一枚价值 102 万美元，击中的只是几座雷达，两、三天后就修好了。我们是否打痛了他们？没有。我们有没有获得盟国的支持？是的，英国支持我们，然而他们对我们的忠诚是一贯的，我对此表示赞赏。自然，科威特也表示支持，尽管他们发现有 5000 军人蜂涌而来，而他们对事态并不理解。实际上我们需要他们的理解和许可。

基本的情况是，我们在那里是孤立的。按理应在联合国决议下采取行动。在海湾地区，我们的做法没有得到盟国的支持。

克林顿：在今晚前面的辩论中，多尔参议员曾再三次批评我与联合国一道工作，而现在他却指责我没有配合联合国的工作。

多尔：不，我说的不是联合国。

克林顿：有时候美国不得不单独行动，或者至少带头采取行动。有时候我们不能让别的国家来否决我们的外交政策。我不能把士兵派到伊拉克北部地区去，那样就错了。我能做到的是削弱萨达姆·侯赛因的能力，使其不能再威胁科威特以及其他邻国。我就是这么做的。我迄今仍然相信这样做是对的。

莱勒：多尔参议员，关于你指责总统的“追求镜头效应的外交政策”……

多尔：那不是我的。

莱勒：不，不，我是指你指责总统，说他有一个追求镜头效应的外交政策。那么，上周的中东问题首脑会议就属于这一类吗？

多尔：哦，那次会议是有一些好镜头，不过，是不是属于这一类外交政策？我不知道。我不想随便下结论。当我认为他在波黑问题上是正确的，我就支持总统；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关贸总协定”问题上，我也曾支持他，因此，我并不是总是与他针锋相对的。有时是其他人与我们俩有不同看法。

中东的局面非常困难。但是，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看来，事情好像应该是这样的。你在把某些人请到美国来之前，对事情发展的最后结果已经有所考虑。现在呢？只是把人凑在一起，坐下来谈判，就以为事情或许会好起来。也许这种形式本身就是目的吧。据我所知，今天有关谈判重新开始了。

不过，我要再次指出，这几乎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外交政策。它是就事论事的，是的，它属于这种类型，我们早晨起床读报，发现国家遇到了麻烦，于是我们就开个会来处理此事。在我看来，人们期望看到的美国外交战略不是这样的。我认为我们已经失掉了不少信誉，这样说不是出于党派偏见，而是确实有感而发的。我们在全世界都在丧失信誉。我们的盟友知道了——他们已无法确定我们下一步做什么、现在会做出什么反应、以及未来又会是什么反应。

如果刚才总统进行过什么暗示的话，我要澄清没有人建议派兵前往伊拉克。不过，我确实认为萨达姆·侯赛因比以前更强有力；我确实相信把4位领导人中的3位（其中一人拒绝邀请）请到华盛顿来，并没有使我们在中东得到太多的收益。

克林顿：我们有一项非常一贯的中东政策。那就是支持和平进程，支持以色列的安全要求，支持那些准备为和平承担风险的人。那里的环境非常困难，情绪很强烈。极端分子遍布中东各地，他们想扼杀和平进程。拉宾总理献出了生命，因为他试图带来和平，引起他自己国家里某些人极大的仇恨。

我本来想举办一个大型的、组织良好的首脑会议，但是那里的人们正在相互残杀——动作还很快。那些无辜的阿拉伯孩子们，那些无辜的以色列民众，人们正面临死亡。在以色列政府更迭之后，信任感大量破灭。我觉得如果能够把冲突各方召集到一起来，对他们说停止暴力，开始对话，致力于谈判，那就是一种成就。

好了，我们的国务卿今天正在中东，他们已经开始谈判，各方面的领导人都向我保证，在他们解决相互间的分歧之前决不松劲，并使和平进程再向前迈进。

莱勒：参议员请。

多尔：哦，我感到失望的是，总统没有要求立即无条件地停止暴力。我的意思是事情似乎应该这样，这些领导人来到美国之际暴力行为就已经得到制止了。过去发生的杀戮和悲剧是不幸的，那是一个难题成堆的地方，对此毫无疑问。无论是总统或是其对手都不应该把这里的问题政治化，我就不会利用它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我希望他们举行对话，并达成某种协议，而相互杀戮将得到制止。

莱勒：总统先生，你在芝加哥发表接受提名演说时说，本次大选事关这种选择：“是建造通向未来的桥梁或是搭起联系过去的桥梁，是相信我们最好的日子还在前面等待召唤或是认为美好的时光已经离我们而去了，是想要一个万众一心。共同工作的国家或是一个人人为自己的国家”。你这样说，是不是认为多尔参议员过时了，如果他当选总统，将导致美国落后呢？

克林顿：噢，我这么说是因为多尔参议员在圣迭戈市发表的出色讲演中提到，他想要建起联系过去的桥梁。我想我能够理解他的意思。跟我一样，他对当今发生的某些事情感到不满。不同的是，我相信美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因为我们坚持不懈地扩展知识的领域，既保持了自由，又增进了繁荣，现实的疆界总是在移向未来。

那就是为什么我就任总统之后，决心超越这种在华盛顿由来已久的陈旧过时的夸夸其谈，以把国家再次推向进步。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使国家新增了1050万个工作机会，新开张企业的数量达到创记录水平，收入在增长，犯罪率在下降，吃福利饭的人数在减少。那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走在正确道路上的根据。

我要强调的是，我想在这条道路上坚持走下去。那就是为什么我的预算计划将继续加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那就是为什么我要求为教育和抚养孩子减税，使人们确实负担得起。那就是为什么我想要克服政党间的对立，与各个社区一道工作，降低犯罪率，直到我们的街道重获安全。

这些是我承担的义务。我是非常倾向于未来的。我认为这次选举应该为迈向未来加油。我认为美国最辉煌的日子还在前头，不过需要我们构造出通

往正确方向的桥梁。

莱勒：多尔参议员请。

多尔：这个嘛，总统有时使我回忆起我的兄弟肯尼，他已不在人世了。而他是一个非常喜欢言谈的人，他常常告诉我一些我知道是相当不准确的事情，于是我们有了一种默契。他的话只有六成是可信的。那么，就你的情况而言，也许只有两成是可信的。什么 1100 万新工作和一切的一切——我的意思是，总统不应该把各州州长们所做的一切归功于自己；不应该在谈论犯罪率下降的时候不提纽约市，因为大部分犯罪率下降都要归功于那个城市；并且不应该回避承担发生坏事的责任，不论是滥用毒品或是美国的其他一些事情。

所以，在我看来似乎可以像我们过去称呼肯尼那样称他为“伟大的夸张其辞者”，因为总统就是喜欢夸张，使事情听起来好一点。这也使他自我感觉好一点。

谈及桥梁，我也想要一座通向未来的桥梁，不过我更想得到通向真实的桥梁。我们必须告诉人们真相。我们要让今晚观看和收听辩论的人，尽力发现真实情况。而真实情况是，美国面临着一大堆问题。我们需要一个有力的经济计划，需要减税，需要给每抚养一个孩子提供 500 美元税收减免，我们要尽快做到这一切。

莱勒：总统先生请。

克林顿：我从不认为美国发生的一切好事都要归功于自己。但是，在与美国人民共同努力，以帮助他们获得为充分享受其生活所需要的条件的那些领域，我认为自己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

对于今晚多尔参议员问到的毒品问题，我个人也要承担责任。

不过情况是这样的，我认为我的主张使我们拥有更好的未来。多尔参议员曾经投票反对给学生贷款，反对“良好启蒙计划”，反对保留教育部。如果他当选总统，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总统的内阁班子里将无人负责教育和儿童事务。我个人以为，对于美国的未来那是一条错误的途径，我们应该选择另一条道路。

莱勒：多尔参议员，你仍然倾向于撤销教育部吗？

多尔：是的，从一开始我就持反对态度，我投票反对过它。它是卡特当选总统之后给“全国教育协会”的一种回报，该协会派出大量代表出席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其 99.5% 的资金都给了民主党和总统。而许多教师把自己的孩子不是送到普通公立学校，而是私立学校或者是较好的公立学校。

所以我们想推进这种做法，它可以称为“机会奖学金计划”。有些人会说，哦，你是个共和党人，不可能顾及那些穷人。其实我的一生都致力于为人民服务。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为食品券计划、工作自立计划以及学校午餐计划尽过力，与乔治·麦戈文、赫伯特·汉弗莱以及其他参议员共同合作过，这些都是我的民主党朋友。

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极端，我关心人民的疾苦。我自己有一个小基金会，已经为残疾人募捐到 1000 万美元。我并不想宣传此事——做起来就是了，以前从来没有提过此事——我尽力做一些自己认为对人们有所帮助的事情。

好了，在我看来我们似乎应该把交给教育部的经费节省下来，投入“机会奖学金计划”。我们可以告诉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那位小兰德·莎士比亚——转告你的父母，你将可以上学了，因为我们将帮助你克服州里设置的

障碍，你可以上你所选择的学校了。

我并不认为总统或副总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私立学校或者较好的公立学校是件错事，我为此鼓掌，赞成这一做法。但是，为什么不让每个人都有这种选择呢？为什么不让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的美人也有这种机会呢？我为此感到愤怒。择校自由对于许多人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机会。

克林顿：首先我要申明，我完全支持学生有更多的选择。我们一直在扩展公立学校的可选择性。在我的平衡预算法案中，包括了对 3000 个新学校的资助款。这些新校一般由教师和家长共同建立，有时则是由企业家建立的。它们被称作“宪章学校”（Charterschool），没有繁文褥节，没有官僚味，只有在有效运作和教授学生时才能存在下去。已经出现的这类学校，情况都不错。

多尔参议员的计划是从受到有限的联邦资金帮助的全体孩子那里把资金拿走，去帮助人数少得多的一部分人，我反对这样做。如果我们执行私人承担教育费用的计划，那也只能在地方一级或者州一级。然而，多尔参议员一直反对联邦对教育进行帮助。他投票反对给学生贷款，反对我的改进后的学生贷款计划，反对《国民服务法案》，反对“良好启蒙计划”。他还反对我们努力推进的“安全与无毒品学校计划”。他投票反对所有这些计划，他对此完全没有信任感。

那就是问题所在。90%的孩子都在公立学校就读，我们需要提高他们的水平，并且用我在竞选中列举的那些计划来促使他们进步。

多尔：我不得不纠正总统的说法。不知现在是什么时间，或许已经很晚了。不过我还是要纠正一下——我所反对的这些事情，都可能是某些庞大计划的一部分，其中有许多名堂，有许多是我们不应该接受而大概要说“不”的。我支持了所有的教育议案，支持“良好开端计划”。我的看法只是对它也要加以审查。因此，我不想让外面的人认为，我们只是一味地投票说“不，不，不”。让我们使低收入的家长们与美国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一样，有权利把孩子送进更好的学校。我们要提供帮助，使学校面向教师，面向家长，摆脱“全国教育协会”的控制。

莱勒：总统先生，自愿择校方案有问题吗？

克林顿：我支持自愿择校。我倡导了扩展公立学校外的其他选择，前面说过，我们将就新创立的 3000 所新学校向各州提供资助。然而，如果我们推行私人承担教育费用计划，那就应该主要由州和地方政府决定到哪里筹集款项以及如何开支。我只是觉得这种做法不对，即把资金从那些帮助孩子们掌握基本技能的项目中抽走——90%的孩子都在公立学校，把资金从资助了学校午餐计划的那些项目中抽走，那些项目还有助于提高学校的教育水平。我们的学校正在得到改进，随着社区发挥正确的领导作用和在校区一级建立起伙伴关系，这些学校还会进一步改观。

我一直致力于改革。参议员，我可以告诉你，几年以前，当我在家乡州支持一条对教师进行考核的法律时，我曾严厉斥责过教师协会。对于把教师们提出来大做文章，像你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那样攻击他们，我对这种做法就是不以为然。我认为，我们应该促使他们提高，并使孩子们获得进步。

容我说明，遭到我否决的你们所通过的那个预算本来会使 5 万个孩子不能参加“良好启蒙计划”，会葬送国内和平队计划，会砍掉学生贷款和奖学金。是的，它本来会是这样，那是事实。那就是我否决它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教育方面，我们需要做得更多而不是更少。

多尔：好的。关于国内和平队计划，我必须指出，如果对你来说那就是一种成功的话，那么我不必太费劲就可以揭示出问题。该计划为每个志愿者支付 2.7 万美元。每年有 400 万青年人参加志愿行动，人数一直很多，而你只挑出其中 2 万人，不管需不需要都为他们的志愿行动付报酬。我喜欢年轻人，尊敬教师，我是从公立学校毕业的，而你却在过去某段时间里就读于私立学校。我喜欢我们的教师，不过，你不会支持自愿择校，你不可能支持自愿择校，因为这里又牵涉到特殊利益集团的资助。当你拿到 995% 的钱，人们不知道对另外 0.5% 会发生什么。我们正在关注此事。肯定是有人得到了这笔钱。而这些钱都到了民主党人那里，也就是自由派权势集团中的一部分人手里——这是一种你们大家都做不出来的自由派行为。

你支持学生统一穿校服和对青年人实行宵禁，并且反对逃学。而这些，并不是改革，总统先生。为什么克利夫兰市的兰德·莎士比亚或者密尔沃基市的皮勒·冈萨雷斯不能使他们的孩子得到机会，上一个更好的学校呢？有些学校不安全，有些学校甚至更不安全。你提供的选择没有意义。应该给人们真正的选择机会，是你自己拥有的那种机会，是许多其他美国人拥有的那种机会。要想制止犯罪和少女怀孕现象，那就要从教育着手做起。

克林顿：多尔参议员，首先，我要澄清一下自己的经历。在我很小的时候，读过两年天主教教会学校，但是我成长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公立学校度过的。长期以来，我一直在努力改进这些学校，我们 90% 的孩子正在那里学习。

使我不解的是，除了学校，你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支持地方一级承担更多责任，而恰恰在教育方面联邦没有大多的钱。我们应该在这上面开支，以帮助那些占总数 90% 的孩子。如果克利夫兰市的地方学区或其他地方想推行自由选择私立学校的计划，就像密尔沃基市那样，那就这样做好了。我要说的是，该计划的后果如何并不清楚。而我还是希望联邦参与其事，以便让所有孩子都能享受更好的教育机会。那就是为什么我否决你们通过的预算，它削减了 300 亿教育经费。它错了，……

莱勒：总统先生，时间？

克林顿：……而对于未来而言，我的计划更好。

莱勒：多尔参议员，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你说过如下的话，现在我复述一遍：“在克林顿政府内有这样一批精英，他们从未成熟，从未做过实实在在的事情，从未作出过牺牲，从未经历过苦难，从未学会足够的知识，让他们行使大权把你们赚的钱投入到那些目的不明、只是使他们自我满足的计划之中，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有失体面的。”

那么在你心目中，这到底指哪些人和哪些事？

多尔：我心目中确有许多这种人，在白宫，在他们过去从来没有呆过、从来没有经验的其他政府部门。他们来华盛顿的时候没有任何从政经验。当然他们是非常自由派的，否则就不会进入这届政府。他们都认为自己懂得对于美国人民来说什么是最好的。

而我对许多事情有切身的感受：对于教育问题我就有自己的看法——我想在教育问题上帮助青年人，使他们能够享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士兵权利法案》我所得到的教育机会。由于当时政府帮助提供了教育机会，成百万的青年男女在随后的奋斗中改变了这个国家的面貌，那么现在的青年人为

什么得不到帮助，这个，这个原因就是总统没有提供支持，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问题不是从学校那里拿走什么，而是提供新的资金。我们将裁减教育部的规模，除此之外其他任何人都不会有损失。

本届政府确实是非常自由派的。正是这届政府给予你们巨大的税收减免（疑为口误，据上下文应为“税收增长”——译注）；正是这届政府试图接管健康保险并强加一个政府管制体系；正是这届政府反对改革政府管制条例，这些条例使许多男女小企业主破了产；正是这届政府反对通过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否决了一个平衡预算计划，并且两次否决福利改革法案。这类问题可以不断地列举下去，那就是我心目中所指的事情。我希望在我的政府任职的人们了解美国，我的政府将拥有这种人才。在内阁中有 10 位百万富翁和 14 位律师的情况将不复存在。人们看到的将是富有经验的人，了解美国的人，创造生活并懂得生活艰辛的人。

克林顿：当参议员多尔就所有精英人物，就本届政府的年轻杰出人物发表评论时，一位在活动拖车房里长大、现在为我工作的小伙子盯着我说：“总统先生，我懂得你是怎样成长起来的。他在谈论谁呢？”

众所周知，这种对自由派的指责，是他们的党在遇到激烈竞争时经常拿出来使用的东西。这个可以说是他们的某种老古董了。他们觉得这是一张由他们播放的唱片，人人爱听。不过这一次猎犬将失去目标。

美国人民应该会作出自己的判断。下面是我们的记录。我们连续 4 年削减了财政赤字，从内战前到现在这是头一次——我的意思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到现在的头一次，或许也是内战前到现在的头一次。我们创造了 1050 万个新工作机会。新创立的小企业数目达到创记录的水平，并且使每一家小企业都能获得税收减免。犯罪率在稳步下降。在福利改革法案通过以前，已经有 200 万人不再靠福利生活。在抚养孩子方面提供的支持增加了 50%。犯罪法案包括 60 种死刑惩罚，新增加 10 万警力，禁止出售攻击性武器。

美国人民能够作出自己的判断，这是一种自由派的记录或者是一种对美国有利的记录——自由派也好，保守派也好——你可以贴上任何标签。

多尔：好的，我认为它是相当自由派的，我将给它贴上这种标签。我的意思是，总统先生，你回顾一下你所倡导的全部计划就好了——感谢上帝，幸亏我们有一个共和党国会。你就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出一个经济刺激计划。似乎是说我们有一小块战利品，要把它分配给全美国——那是 160 亿美元。甚至你本党的人一些人也不理睬它。我记得曾就此与你通过电话，我觉得你自己对这一计划也不是兴趣十足的。我不会——我从不复述对总统已经讲过的话。不过，不管怎样，我们为纳税人节约了 160 亿美元。

接着，来了其他一些项目，来了健康保险制度改革，来了税收增长。许多这类事情在 1994 年被终止，因为国会改变了。我认为我们做了一件好事。

莱勒：总统先生，如果你不是自由派，那么情形容一下你的政治哲学。

克林顿，我相信政治的宗旨是使人们获得为充分享受生活所必需的条件，加强机会与责任的价值，建立社区意识以使我们共同工作。我摒弃歧见。我相信我们能够既保护环境又使经济获得增长。我相信可以通过一个更小的、更少官僚味的政府来完成这些事情，不过，我们不管怎么样都要做这些事。

下面的话多尔参议员听起来可能不舒服，然而事实是我对政府的精简远远大于共和党前任总统，并且我确实制止了他们——我承认这一点——我肯

定要制止他们的预算。他们的预算把给环境保护署的拨款削减了三分之一，而我们有 1000 万孩子生活在距离有毒废弃物不到 4 英里的范围内。它取消了这一原则，即污染制造者应该为倾倒有毒废弃物付费，除非是刚刚开始倾倒。他们的预算削减了 300 亿美元对教育的资助。它甚至减少了为奖学金和大学生贷款提供的资金。他们的预算还削减了 2700 亿美元的医疗照顾开支。最后，该预算还撤销了国家对贫穷儿童、对有残疾儿童的家庭、对看护室中的老人、对贫穷的孕妇所提供的健康保险保证。对这个国家来说，这是错误的，称之为保守主义也不会使它变得正确起来。对于美国来说这个错误的决定，如果不制止它，那么将有损于我们的未来。

多尔：哦，总统可以用他喜欢的任何方式给自己定位，不过，我认为必须看一看过去的记录，回到他的过去，诸如担任乔治·麦戈文的得克萨斯州竞选主任——乔治·麦戈文是我的朋友，因此我并不想贬低他——不过，他确实是一位自由派，一位自以为是的自由派。

我刚读完一本书——我想书名叫做——叫做《民主党的遗产》什么的，作者是罗纳德·卡多什或者是别的什么名字。该书全面论述了自由派对本届政府的影响，无论是有组织的劳工，或者是好莱坞的精英，或者是大众传媒中的某些精英，或者是工会，或者是别的什么势力。所以，我认为你们应该读一读这本书。而基本的情况是：我认为美国人民——尽管总统已经列举了所有那些法案和所有那些事情——他们仍然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变化，他们仍然忧心忡忡。

当你提高税收的时候有人抱怨吗？有没有人走到街头询问人们将如何支付这笔额外的钱呢？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提出一个经济计划。我们要让政府为支出每一分钱精打细算，而不是让民众省吃俭用。这就是我们带给今晚的观众的信息，而不是反复他说你这样投票、那样投票。在我们走向下个世纪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好的美国。

克林顿，实现一个更美好的美国，其途径是平衡预算，同时保护医疗照顾计划、医疗补助、教育和环境；其途径是提出目标有限的税收减免——请允许我谈一谈教育税收减免——也就是人们可以在任何年份为交纳大学学费而享受 1 万美元税收减免，包括任何种类的大学学费；给予各个家庭一种税额减免，为典型的社区学院每交纳一元钱，就可以从应纳税收入中减去一元钱，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社区学院向每个人开放；接着，让人们为个人退休金帐户储蓄，出于教育、购买住房和支付医疗费用目的而提前支出存款可以不受受到税收惩罚。这是通往 21 世纪的正确道路：平衡预算，削减税收，不要吹嘘那个 5500 亿美元的税收计划。

莱勒：多尔参议员，刚才我们一直在谈论你们两人的不同点，涉及政策、问题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那么，在更加个人化的领域，还有没有与本次选举相关的有意义的差异呢？

多尔：我要首先谈一谈总统关于另一次减税的承诺。我是指在我旅行竞选时，曾告诉人们，所有得到他上次承诺的税收减免的人都可以在 1996 年大选中投票支持他。结果，没有什么人举手。所以，问题在于你们能够接受我的对手那种过时的竞选承诺吗？

人们想要对经济进行改革。过去一段时间，他们在实现自己的目标方面非常艰难。你们的情况是一位家长为政府工作，剩下一位家长才是为家庭工作。这是一项重要的事业，它事关经济的重新启动，事关美国人的工作和机

会，正如我前面说过的，它事关政府能否为其支出的每一分钱精打细算，而不是让可怜的纳税人这么做。

在他们征集你们的税款时，没有人跑来问问人们，你们从哪儿才能找到额外的钱款？我觉得政府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这里有个性差异吗？

莱勒：有关系。

多尔：好的。我的血压不太高，体重和胆固醇也不太高，不过我不想把健康问题当成本次竞选的一个话题。我觉得他比我个子高一点，不过我认为还有更重要的个人差异。我的意思并不是——这并不想涉及个人问题。

就我所关心的事情而言，这是一次有关各种政治问题的竞选。它涉及我对美国未来的见解和他的自由主义的看法，无关个人问题。我认为他的自由主义观点是一种过时的东

西，我知道他想与此脱清干系。总统先生，我也不想被看作是一位自由派，不过，由于你的经历记载，你摆脱不了自由派的标签。这就是你在阿肯色州的记录，阿肯色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增税，犯罪率最大幅度的增长，使用毒品情况最大范围的增加。

莱勒：总统先生，请。

克林顿：哦，就我过去的记录而言，当我还是州长的时候，我们的税收负担是全国各州中最低的——倒数第二低的；在我竞选总统的时候，就业增长率则是各州中最高的；还有其他许多广为承认的进步。

不过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做些什么？我认为限定目标的减税计划对未来更加有利，目标界定在教育和孩子抚养上，并与其他教育计划一道发挥作用：到 2000 年，使所有的教室都与互网络联网；确保出现“阅读志愿人员”大军，与家长和老师一起对人们进行教育，这样就使我们 8 岁的孩子都能学会阅读；还要投资于环境，清除掉三分之二最严重的有毒废弃物堆积场。这些计划比那个 5500 亿美元的税收方案要好。

同胞们，请记住，甚至担任多尔参议员竞选活动两主席之一的达马托参议员也说过，为了这一方案他不得不削减“医疗照顾计划”。每一位仔细审视的人，500 位经济学家，7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都说这个方案对经济有害。它将造成财政上的大漏洞，提高 900 万人的税收，要求对开支进行削减的幅度比被我否决的那个计划还要大。我的计划更好，它将使我们在不断增长的经济和更加健康的家庭伴随之下走向未来。

多尔：哦，我确实感到鼓舞的是得知你与阿尔·达马托的友谊得到了恢复，我知道他也会赞赏这一点。总统先生，在你任职的头两年里，你的预算里根本没有减税的内容。直到我们有一个共和党国会之前，你甚至没有想过——没有提起过减税。

回到个人差异问题。我不想——这个，如果吉姆，如果你要更具体一点。不过，我认为总统在今晚可以澄清一件事情，那就是赦免权问题。我知道总统你在公共广播网莱勒主持的电视节目中谈到过这一点。正如我事先告诉过你的那样，我一直不提“白水案”，现在也不讨论“白水案”。不过现在我要讨论总统拥有的提出赦免的权力，并且在剩下的日子里完全有可能施之于其他人的权力。

莱勒：总统先生请接着讲。

克林顿：好的。这里首先要谈一下他关于达马托参议员的那一番评论。

在过去两年里，他设法使我花更多的时间去与达马托参议员打交道，所以我比以前更熟悉了他的评论涵义。

我已经谈论过这个赦免问题，让我再说一遍。这个问题是他们炒热的，实际情况是——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这方面的讨论。

我告诉你这一点：我不会给予任何人特殊待遇，我将严格依法办事。据我所知，过去的每一位总统都是这么做的。不过，不管别的总统怎么做，我自己是认真对待此事的，这就是我的立场。

多尔：但是，在我看来好像总统根本不应该发表这方面的评论，特别是涉及你与其有商业往来的人的时候。我是指你或许发出了一个信号。我不能肯定是这样的，我不想质询任何人。不过，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当有人问起赦免问题，你应该说，暂时无可奉告。

我认为他犯了个错误。我觉得当总统犯了错误时，他总是倒打一耙，说我犯了错误。但是，显然他的立场一直没有改变。如果有其他具体领域——不过，正如总统清楚，我没有超出范围提及任何别的事情。我们以前讨论过此事。要再次说明的是，我了解达马托参议员，我想他举行过一次或者两次关于“白水案”的听证会，记不确切了。不过，他不是代表我出任主席的，他只是我的一位朋友，正如肯尼迪参议员是你的朋友一样……

克林顿：不错。

多尔：记得有一天我在国会大厅里说道，先生们，现在让我们向你们的记忆征税。肯尼迪马上跳起来说，为什么我们过去没有想到这一点呢。你知道吗？这就是你的一位自由派朋友。

莱勒：总统先生，请限定 30 秒钟。

克林顿：无可置评。

多尔：那个话题有什么要紧的呢？

莱勒：多尔参议员，如果你能列举出关于克林顿总统的政策上或是个人方面的一件事，并且希望选民记住此事，那会是什么事呢？诸如了解此人、理解此事、欣赏此事这类事情。

多尔：如果我要说什么，那就是曲解。我甚至不认为存在着这种竞争——它涉及我们对美国前景的展望。

我个人恰巧是喜欢克林顿总统的。整个晚上我都称呼他“总统先生”。我说过，在 1992 年他却并没有向布什总统表示过这种礼貌。而我是尊重总统职位的。我曾经在好几位总统任下工作过。他们都有其力量优势，也都有其弱点。所以，我宁愿只谈自己的力量优势而不评价他们。我认为自己是有力量优势的。我认为，鲍勃·多尔最突出的优点就是鲍勃·多尔言行一致。这涉及到创造信任还是制造恐惧的问题。

我要说，总统先生，我认为你在这次竞选中所做的一切就是制造恐惧感。你把成百万、成百万美元投入攻击性竞选广告，吓唬老年公民。我知道这种恐惧已经出现了，因为上周有人对我说：“参议员，别削减我的医疗照顾计划。”实际上我是在努力拯救你们的医疗照顾计划，正像我与两党委员会一道挽救社会安全计划那样。我有亲戚享受医疗照顾。我曾经替祖父母签收福利支票，懂得照顾人们，那正是我在美国参议院的职责所在。

我将承诺兑现我的经济方案。如果我不能同时做到既减税又平衡预算，那么今晚我就不会眼盯着在起居室或别的什么地方的你们，并说这是对美国有利的。

不管现在是否同意其观点，凡是为鲍勃·多尔工作过的人都将告诉你们，他肯定是言出必行的。这正是本次竞选应该关注的问题。

克林顿：我希望美国人民了解，我一直为了他们而非常努力地工作，并致力于国家的进步，而我们确实比4年前过得好。不过最重要的是我针对21世纪的计划是个更好的计划。限定目标的减税；对教育改革承担真正的义务；承担使福利改革有效运作的深层义务，通过鼓励私营部门发挥作用，使人们从依赖福利走向工作自立。既然要求人们工作，那么现在我们就需要为人们创造工作机会。另一个承诺是继续逐步推进健康保险制度改革，下一步就是帮助人们在转换工作期间也能获得健康保险，不至于因为暂时没有工作就失去这一保险。还有一个承诺是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保护环境。

这就是我希望他们了解的关于我的一些事情，这就是我每天起床后为了美国人民、为使他们的孩子梦想成真而做的事情。我相信已经取得的成绩表明，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最重要的还是我相信自己关于未来的观点是正确的。像多尔参议员表示喜欢我一样——我喜欢多尔参议员。你们大概可以说，我们两人相互友好，只是看待世界的方法不同，那么同胞们，请选择你们认为谁是正确的。

多尔：哦，我要说的是参议院的第一个有关无家可归者的法案是《多尔—伯德法案》，还是《伯德—多尔法案》中的一部分——我记不清当时是谁具体负责这一部分了。我记得曾与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里比科夫共同发起“收容所计划”。现在全国已经有2500个收容所了。

我在国会时曾说过，终身为国尽职——在6月11日我离开了国会，因为我想让美国人民知道我是愿意舍弃某些东西的。克林顿总统在1990年竞选担任了州长，并说他将完成其任期，实际上没有做到。他成了总统，所以我猜想是因为有了更好的交易他才放弃州长职务的。

而我想让美国人民了解，我确实愿意舍弃一些东西。我不是为了得到越来越多的权力，于是像掷骰子一样，赌一把。我将未来的事业投入竞选总统之路，是因为我真的认为美国的未来有赖于我的这条道路。

我们也能给你们提供所有那些统计数字。但是，如果你失去了工作，那些数字就一钱不值。你无事可干，就不可能享有医疗照顾；或者你目前在怀中就抱着一位残疾孩子，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

实际上，美国最美好的日子还在前面有待于我们去实现。我多次目睹艰难岁月，我知道事情能变得更好。我将领导美国进入更光辉的未来。

莱勒：总统先生，多尔参议员认为此次选举的要点是考察候选人是否言行一致，你对此有什么说法？

克林顿：让我们回顾事实。我在上次竞选总统的时候说过，要在4年内减少一半的财政赤字，现在已经减少了60%。我说过，我们的经济计划会带来800万份新工作，而现在已经出现1050万个新工作机会。我们的汽车制造业重登榜首，新开张的小企业数目达到创纪录水平。我说过，要通过《反犯罪法案》，向街道上投放10万警力，禁止出售攻击性武器，该采用死刑来对付的问题就采用死刑，包括判处毒品集团头目死刑，这一切都已经做到了。

我说过，我们要改变福利制度的运作方式。而就在有关法案通过之前，我们通过与州和地方政府合作，已经使将近200万人由依赖福利走向了工作自立。我说过，我们要用更强硬的态度对待逃避抚养孩子义务的人，现在这方面的情况好转了50%。我说过，我将努力减轻中产阶级美国人的税收负

担，那时的赤字比我想的还要大，现在我认为他们的状况改善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改善了，我们已经使利率下降，赤字减少了。

共和党人一直在谈论此事，但是任何人都是在其一生中头一次看到，正是本届政府的计划使得赤字连续4年下降。

我们还给1500万工作着的美国人减了税。我有一个计划在那里被搁置两年了——它本来应该早已获得通过了，但是共和党人却不惜让政府关门，以把他们的预算和计划强加给我，我不能接受。不过，我终将实现剩下的减税计划。

所以，我认为当你们看到了那些结果，你们就会知道，假如你们给我机会去架设通向21世纪的桥梁，那么我关于未来的计划是有着非常好的获得实现的机会的。

莱勒：参议员，请。

多尔：这个，他又来那一套了。我的意思是很多事情在他上任之前已经着手做了，而他却夸大说都是他做的。他实际上没有做那么多的事。让我们逐年看看有关情况。他就任时经济增长率是很高的。尽管有人不喜欢，但是在1990年达成了预算协议，对政府的支出成本施加了非常严格的控制。协议使国会受到了很多压力。储蓄与放款协会危机已经结束，他们开始出售财产，所有的钱正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库。而且他额外砍掉600亿美元防务开支，使一大批人失去饭碗。

他谈到政府变小了，实际上政府人员更多了，除了与防务有关的人员，只有他们离开了。现在的政府比肯尼迪总统在世的时候还要庞大，尽管他不承认这一点。另外，共和党国会还帮他削减掉530亿美元。所以，该是谁的功劳，就要归功于谁。

密歇根州长恩格勒把税收减少了21倍，并创造了大量新工作职位。汤普森州长和罗兰州长也都有同样的成就。总统先生，还有许多人是同样有功劳的。当我成为美国总统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州长协会，我们将直接地与州长们共同工作，无论他们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将把权力交还给人民，交还给各个州。

克林顿：我认为许多人功不可没，我也一直试图使他们得到应有的荣誉。但是我相信自己的计划比多尔参议员那受到错误诱导的、5500亿美元的计划要好，我还要说一遍，那个计划会使我们的赤字捅出一个大漏洞。

我们的计划将平衡预算并使经济获得增长，它将保护环境并投资于教育。我们有了面向未来的正确的途径，看一看过去的成绩就知道了。参议员，现在不是美国的午夜黑暗时期。我们比4年前更好过了。

莱勒：行了，这就是最后的问题，最后的答辩。下面开始进行结束致辞。

多尔：这就辩论完了？

莱勒：总统先生，你先讲，限定两分钟。

克林顿：好的。首先，吉姆，我要谢谢你。谢谢多尔参议员。谢谢你们大家，各位女士和先生们，今晚收听我们辩论的所有人，你们给了我们这一次露面的机会。一开始我就想说，你们给了我机会在过去4年里承担总统职务，对此我深表感激。过去做梦也没有想过我的一生中还会有这种机会，我一直竭尽全力来忠诚地完成你们的嘱托。

我感到骄傲的是，美国比4年前更强大、更繁荣并且更安全了。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们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今天晚上我已经尽我所能来阐明自己的

计划，这是一个通向下个世纪更美好的未来的计划。

我希望在说再见之际给你们这个印象，我作为总统所做的一切基本上都是按照人民的要求行事的，我看到了他们的生活受到这个国家中已经发生的或者未发生事件的影响。在我刚当选的时候，托莱多市的汽车工人处在失业状态，现在他们又有了很棒的工作，因为我们的汽车工业重执世界的牛耳了。我碰到的所有过去依赖福利的人现在又工作起来并自己负担抚养孩子的费用。我想如果以适当的方式进行福利改革，其他一些人也可以为国家、为他们自己做些事情。

我想起了一位男士，有一次他抓住我的肩头，眼里噙着泪水对我说，他的女儿正因患癌症濒临死亡，他感谢我给了他机会陪伴女儿一些时候而又不会因此失去工作，这是因为有了《家庭和医疗休假法》。

我想起了与我一起成长、一起度过校园时光的所有人，我与他们保持着联系，他们使我时刻不忘我们在华盛顿的所做所为是怎样地影响着美国人的生活。

同胞们，我们可以建起联系 21 世纪的桥梁，它将足够宏大、足够坚固，可以让我们所有人都得以通行。我希望你们帮助我将它建造起来。

莱勒：多尔参议员，请发表你的结束致辞。

多尔：谢谢，吉姆。谢谢，总统先生。谢谢每一位观众和听众。

我着重对美国的青年人讲几句话，因为他们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将在 21 世纪里度过。他们是面临挑战的一批人。有人在那里作了一些预测，而现实是不会如此这般的。你们不会得到机会，未来出现的将是更巨大的赤字、更多的毒品、更严重的犯罪以及对美国人民更缺乏信任感。这就是你们、你们的父母和祖父母面临的问题。这一点很重要。这就是他们的未来。

我要对那些人说——我知道今天尝试吸食毒品的年轻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滥用毒品的趋势在抬头。假如你们关心美国的未来，关心自己的前途，那就绝对不要这么做了。

我年纪比你们大，在我过去的生活中也经历过焦虑不安的日子。我学会了吃饭、走路、穿衣。我站在这里就是一个证明，它表明在美国存在无限的可能性。我们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据我所知，没有任何地方像我们这里一样，能力社区和邻里街坊的那么多人做那么多有益的事情。

这是重要的事业——这次选举是重要的。我请求你们的支持，你们的帮助。如果你们真想参与进来，那就请按键接通我的家庭电子信箱：www.dolecamp96.org。

谢谢大家。上帝保佑美国。

附录 2 ‘96 美国大选：副总统候选人辩论词

1996 年 10 月 9 日晚 9 时，在美国南部佛罗里达州圣彼得斯堡市举行了木次美国大选的唯一一次副总统候选人辩论。在长达 90 分钟的辩论中，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杰克·肯普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阿尔·戈尔就一系列的国内外问题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这次辩论会仍由美国公共广播网《新闻节目》主持人吉姆·莱勒主持。辩论词全文如下：

莱勒：晚上好。我们现在是在佛罗里达州圣彼得斯堡市的贝弗兰特中心马哈菲剧场。我是公共广播网《新闻节目》的吉姆·莱勒。欢迎收看副总统候选人辩论，辩论双方是民主党候选人副总统阿尔·戈尔和共和党候选人杰克·肯普。这一活动是由“总统候选人辩论委员会”发起组织的。辩论的规则和程式几乎与上礼拜天晚上在哈特福德市举行的总统辩论一样，它是由竞选双方制定和同意的。整个辩论持续 90 分钟，候选人不得直接互相提问。我会向你们提问，内容下限。每个问题的讨论还是分为 3 个部分：有一分半钟回答问题，一分钟反驳，半分钟回应。在提示灯的帮助下，我会提醒候选人遵守规定的时间。活动的程序是由抛掷硬币来决定的。辩论双方还有 3 分钟时间作结束致辞，但没有开场致辞。好了，我们现在提第一个问题。

莱勒：肯普先生，多尔参议员的一些支持者对于上礼拜天晚上他在哈特福德市没有就他和克林顿总统之间在人品和道德方面的分歧作一个阐明而感到失望。对此你有何看法？

肯普：哇！才一分半钟？一分半钟还不够我清嗓子呢。吉姆，我和鲍勃·多尔没有把阿尔·戈尔和比尔·克林顿看作是敌人，而只把他们看作是对手。我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国家，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民都在观看我们的民主如何以文明、互相尊重、体面和诚实的形式运作。

鲍勃·多尔是那些为美国参议院服务的人中的一员，他的公共生活就是他的公共记录。他曾在战场上浴血奋战过，他曾与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共事过。在我看来，对任何人进行个人攻击都有损多尔的身分。还是亚伯拉罕·林肯说得好，他说，“为党服务的最好办法首先是为国家服务”。1996 年，我想不出有一种比选举鲍勃·多尔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更好办法来为这个国家服务的了。

这些问题完全能为美国人民理解和想到。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们有人类历史上最自由的言论和最广泛的权利，这是《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规定的。我和鲍勃尊重这些权利。我们会谈到这些问题，但我们将会以一种高贵的尊重别人的方式来谈论，最后让美国人民来决定谁将是把这个国家带入 21 世纪的领袖。

莱勒：副总统先生，请。

戈尔：谢谢你，莱勒先生。我想感谢圣彼得斯堡热情好客的主人。我和全家很高兴来到这里。

我还想感谢杰克·肯普，为他刚才所作的回答。我认为今天晚上我们有机会对我们的未来进行积极的讨论。杰克，我先与你作一笔交易：如果你不使用任何橄榄球的故事，我也不讲我那些消除氟氯酞化合物的热闹、幽默的故事。

肯普：好，我同意。我根本不想说它。

戈尔：我今晚想要说的是比尔·克林顿对美国未来所作的积极计划。我

们有一个计划，即平衡预算，与此同时又保护医疗照顾、医疗补助、教育和环境，创造几百万个就业机会，包括在美国的内城创造 100 万个新的就业机会。有机会来谈这个问题，我感到很兴奋，我尤为感到兴奋的是有机会继续工作，完成这个计划，如果你们——美国人民给我和比尔·克林顿再干 4 年的权利的话。

莱勒：肯普先生，请。

肯普：我与比尔·克林顿——克林顿总统和戈尔副总统——真的只有两个分歧，即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上的分歧。我们的对外政策自相矛盾、混乱不堪。它正在向错误的对象发出强有力的信号。多年来我们认识到，软弱就是一种挑逗。国内经济本来可以干得更好，但没有。这届总统认为我们尽力了。我和鲍勃·多尔认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美国人民有潜力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由华盛顿的美国政府来控制他们的生活。

莱勒：副总统先生，你认为总的说来，你们双方——你和克林顿总统一方，肯普先生和多尔参议员另一方——在政治哲学上的分歧是什么？

戈尔：分歧是明摆着的。我们的积极计划是建立在以下 3 项原则上的：我们要为所有的美国人提供机会；反过来我们坚持每个人都要承担起责任；我们还要加强社区和人们供养家庭和个人的能力，我们共同努力创造一个美好的明天。

我们如何执行计划呢？这就是：旨在对中等收入家庭减税的平衡预算计划。我们已经为美国最贫穷的 1500 万户工人家庭减税。我们未来计划的特色在于：一个叫作“希望奖学金”的学费税收优惠，对社区学院、初级学院和一般学院给予每个学生 1500 美元的税收优惠，对于那些想继续深造的学生给予 1 万美元的税额减免，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美国任何一个家庭，它所支付的大学学费不用上税。此外，对于首次购买住房的人减税，对于储蓄和支付健康费用的人实行税收鼓励和暂停收税——实际上就是完全免除出售住宅所获得利润的资本收益税。所有这一切都在保护医疗照顾、医疗补助、教育和环境的平衡预算计划之内。

肯普：吉姆，现在的经济是税收太重，管制太多。人与人之间动辄诉讼，官司太多。我们的教育达不到美国家庭和美国人民希望孩子达到的水准，福利制度是犹太—基督教原则的耻辱；正是华盛顿的福利制度阻止人们摆脱贫穷。

我们与这届政府在国内政策上的最大分歧在于，他们认为我们处于最好的状态，我们已尽力而为，2·5% 的经济增长对美国来说已足够了。坦率地说，这对美国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能让钟摆滞留在 20 世纪上走。

很清楚，我们需要在工作、储蓄和投资方面全面降低税率。我知道我的朋友阿尔将建议“滴流经济学”。那么，阿尔，如果实行“滴流经济学”，去问一问范·伍兹——在哈莱姆拥有一家餐馆的年轻企业家，它是否真正在“滴流”。他说，如果我们削减资本收益税，他还会再雇用 60 个人。

莱勒：副总统先生、请。

戈尔：我刚才谈过我们对美国未来所作的积极计划。你原来的问题与此正好相反。

多尔参议员和肯普先生提出 5500 亿美元的冒险的税收方案，这实际上是对 900 万最贫穷的工人家庭进行增税，这将会在财政赤字上捅漏子，并且对医疗照顾、医疗补助、教育和环境方面的预算进行大幅度地削减，还会使我

们的经济偏离轨道，利率、抵押率和汽车价格上升。我们以前抵制过那项计划，我们还将再一次抵制它。我们希望有一个能提供增长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积极计划。

莱勒：肯普先生，还是回到哲学问题上。你认为你们竞选双方之间有没有基本的哲学分歧，抑或如你们所谈论的那样只是具体问题上的分歧？

肯普：噢，这有一个极好的例子。我和鲍勃·多尔要对每一个美国人在工作、储蓄、投资和承担风险方面进行全面减税。

所有的财富和所有的增长都是由承担风险的企业家创造的。美国的资本税率太高。对家庭来说太高，对工作的男女尤其高。美国中等收入的一般家庭很可能要把他们收入的 25% 到 26% 交给联邦政府。这比花在书本、食物、衣服和能源上的还要高。这是不行的。

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洛杉矶度过的，我们家是工人家庭。那时候一般工人家庭只要一个人挣钱就足够了。而现在必须是两个人，一个人养家、一个人交税。如果一个女人要去工作、或一个男人要去工作，这应当是他们的选择，而不是华盛顿特区的权势集团的选择。比尔·克林顿总统和阿尔·戈尔建议，他们要给我们减税，条件是我们照他们让我们做的事去做。这不是美国。这是社会操纵。

税收法应当反映我们犹太—基督教意义上的价值观，即：在财产、投资和储蓄方面的工作、诚实和正直应当得到奖赏。鲍勃·多尔和杰克·肯普不仅要全面减税，而且要降低资本收益税（一会儿，我将很高兴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时间不够了），而且还要取消有着 83 年历史的《税法》，并用更令人满意的、更公正的和更简洁的法律来取代这部有 750 万字的法律。这将会使这个国家奔腾向前，进入 21 世纪。

戈尔：这个冒险的税收方案将会在财政赤字上捅漏子。你们可以不相信我的话，但最近《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商业周刊》的一个随机抽样调查表明，几百个经济学家中 83% 的人都说，这个方案将会在财政赤字上捅漏子。

还有一点我想听听肯普先生的说法：就在他成为多尔参议员的搭档之前，他说，那个方案，或者说那个方案的一部分将会对美国的 900 万最贫穷的工人家庭增税，这是极不公正的。这也就是说，那是错误的，是不该发生的。我赞同这种说法。它现在仍然是这个方案的一部分。我们认为税收不应该增加到那些家庭头上去。我们有一个对中等收入的家庭减税的计划：在削减赤字，保护医疗照顾、医疗补助、教育和环境的平衡预算方案之内对中等收入的家庭减税。

莱勒：肯普先生，请。

肯普：20 世纪我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全面减税，财政收入都上升，经济都增长。我很奇怪，戈尔副总统和总统在他的经历中居然会不明白，人们可以从一个更大的馅饼上得到更多的收益。很明显，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就会减轻社会福利的负担，使更多的资本有机会在我们的内城投资，阿尔，我们不应该只对资本收益税作拙劣的修补，我们应该在美国的内城免除资本收益税，以使资本投入到在美国建立民主资本主义和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工作中去。

莱勒：副总统先生，联邦政府的“肯定性行动”计划还会继续下去吗？

戈尔：是的。克林顿总统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修补它。而不是结束它。”

多样性是美国一种伟大的力量。环顾世界其他地方，哪里的人都不如我们对不同的民族、种族、宗教和文化团体中促进必要的和谐给予更多的关注。我们应该和大多数美国人为我们的国家在这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而感到自豪，但我们也应当认识到我们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现在，我们努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这个国家的内城，通过对雇用目前失业的人的雇主实行税收优惠来创造 100 万个新的就业机会。我们正在寻求有力的法律强制措施来禁止歧视。

好了，我要祝贺肯普先生，因为多年来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共和党内孤独的声音。可悲的是，我要提到一个事实，自从他成为多尔参议员的搭档后，他宣称他要改变观点，以后他采纳了多尔参议员结束全部“肯定性行动”的主张。这对我们的国家是不利的。

我和比尔·克林顿相信，美国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如果我们促进全体人民之间的多样性和和谐，我们还会看到更加光明的前景。

莱勒：肯普先生，请。

肯普：吉姆，我对“肯定性行动”的看法自从我在 1970 年结束职业橄榄球生涯，到国会山工作后一直都很明确。有人认为我是早几年前退役的，实际上我是 1970 年退役的。

我一生致力于机会的平等，而不是报酬的平等，这才是我们的民主制度所应当提供的。“肯定性行动”应该按需要来肯定，不是肯定报酬的平等，也不是肯定结果的平等。配额制违反美国人的理想。我们应该促进多样性，我们应该像多尔谈论的那样做，建立一项新的民权计划，基础是：在我们的内城，从华盛顿特区到洛杉矶市瓦茨区的尼克森花园，扩大年轻母亲得到信贷、资本、工作机会和教育选择的途径，这些母亲原本不能为她们孩子提供她们想让他们受到的、以便最终成为老板和企业家那类人的教育。人们需要拥有财产，这正是亚伯拉罕·林肯所相信的——当人们拥有财产时，他们就与“美国梦”密切相关。这就是美国的“肯定性行动”。

莱勒：副总统先生，请。

戈尔：我对亚伯拉罕·林肯满怀敬意，不过我认为他不会采取鲍勃·多尔的结束“肯定性行动”的立场。加州的选票上对此有特别的措施，它还体现在多尔参议员提出的适用于全国的立法中。肯普先生原来不赞成推翻“肯定性行动”的运动，曾发表演讲反对它，写信反对它，专程到加州反对它，而现在却支持了它。

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小事。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未来面对的最重要的挑战之一。我希望肯普先生会劝说多尔参议员采纳他的立场，而不是相反。

莱勒：肯普先生，你的立场是什么？

肯普：红灯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停下？戈尔，你认为那是你的问题，而不是我的问题？肯普：确实如此，我认为我已超过规定的时间了。莱勒：肯普先生，目前我们美国的种族问题严重吗？肯普：是的，当然很严重。我们国家仍然必须推进种族融合政策。这对美国人来说是很重要的——白人和黑人，犹太人和基督徒，移民和本国人——坐下来谈一谈，听一听，然后开始理解不同人的不同观点。

如多年前凯纳委员会报告所指出的，我国正在分裂，但他们说的是白人和黑人的分裂。吉姆，我认为我国正在分裂，但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分裂没有这么严重，尽管种族问题仍然很多。我们的分裂表现在经济上，我们实际上

有两种经济。我们总体的经济，我们的国民经济，我们的主流经济是民主的，是建立在激励机制上的，阿尔，这就是资本主义，是对工作、储蓄、投资、生产和家庭以及我们叫作“美国梦”的真正通向进步阶梯的那些东西的激励，其实这是有普遍意义的。但不幸的是，在我们美国城市——我很高兴刚才听到副总统先生谈论了一下——他们放弃了内城。那里存在着一种社会主义经济，那儿没有私人住房，大多数都是公共住房，人们被告知到哪所学校去上学，人们还被告知有食品券可以买什么东西。这种福利制度更像是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民主企业制度的福利制度。这种局面必须改变，它将在鲍勃·多尔和杰克·肯普的领导下改变。戈尔：请记住我刚才说的话，明明情况不是这样，他却告诉你是这样了。我一定会谈到美国种族之间的问题。好消息是我们取得了进步。最近4年里，我们目睹了新创造的1050万个就业机会，我们还看到失业率急剧下降。我们看到非洲裔美国人的失业率25年来第一次下降到两位数以下，并连续保持了25个月。我们建立了特惠区和企业区，其中105个分布在全美国的各个社区里。

我给你们讲一个底特律市的乔·安妮·克劳德的故事。她靠福利生活了8年，直到她们那儿建立了特惠区。她刚刚在特惠区创办的一家新企业找到一份工作。我们要对全国几百万人这样做。

肯普：尽管对此我满怀敬意，吉姆，虽然全国有9个特惠区，但对美国的内城的税额减免只是一个拙劣的修补。不管你们信不信，洛杉矶骚乱后，甚至没有建立一个特惠区。把洛杉矶的瓦茨、南中央区和东部弃置不顾，这在美国是极不公正的。

黑人商业杂志的厄尔·格雷夫写道：“对黑人发展的唯一最大障碍就是缺乏得到资本、信贷和所有权的途径。”必须改变这种情况。我们要在美国存在着失业和福利的每个城市划一道绿线。我们要对参加工作的福利母亲免除资本收益税和所得税。这就是答案。根据实际需要而不是根据皮肤来给予低收入的人所有权和企业家资格。

莱勒：副总统先生，如果连任，我们能期望克林顿—戈尔政府在第二任期执行什么样的内城政策？

戈尔：在我回答这个具体问题之前。我先说一点：我们确实在洛杉矶南中央区建立了一个特惠区。它是美国，也是其他任何国家，靠财政所建立的最大的社区形式，此刻，它正在洛杉矶南中央区创造就业机会。5年前，在洛杉矶骚乱后，国会通过了建立一个企业区的法律，但被上一届政府所否决。

现在回答你的问题。

我们有一个具体的计划：通过给雇用脱离福利的人的雇主以税收优惠，在内城创造1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通过了福利改革法。众所周知，我们允诺要结束福利，我们正在执行这项新的法律。我们在最近4年里使190万人脱离了食品券，找到了好工作。我们的新计划是在内城再创造100万的就业机会。

这还不是全部。我们同时在执行一项把10万警察投入到城市的计划。现在，我们已有2万人在那里了：我们提前完成了我们的6年计划。事实上，在圣彼得斯堡市，在这里就有8个警察，今天晚上你们离开会场后会碰见警察，圣彼得斯堡市因为我们正在执行的城市计划而变得更加安全了。我们要集中精力创造上百万个就业机会。我们对未来很乐观。

肯普：我们已过了4年，但没有一个企业区。虽然有几个特惠区，但你

不得不按比尔·克林顿和阿尔·戈尔的要求去做。如果你雇用某个失业者，你会得到 5000 美元的税收信贷，但你先得有一个现成的企业。再说一遍答案：“要在由于缺乏抵押资金、信贷和资本而被划上红线的美国任何地方划上绿线。”仅仅说“那些地方有资格免收资本收益税”等于零。这就是埃利诺·赫尔姆斯·诺顿在哥伦比亚特区要做的事，这届政府却对特区说“见鬼去吧，见鬼去吧。我们不想改变这样的法律：在哥伦比亚特区降低税率，允许福利母亲参加工作，对其第一年收入不征收任何税”。这应当在美国的每一个城区进行。这将会使资本回流。阿尔，没有资本，你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你可能提供税收优惠，但它不会起作用。

戈尔：噢，我们在全美国建立了 105 个特惠区和企业区，尽管我对上届政府满怀敬意，但我还要说，当我们到白宫的时候根本没有特惠区。

我们已按既定的方式在执行。这将会产生巨大的变化。

你们知道，我提到的底特律特惠区不仅仅为乔·安妮·克劳德创造就业机会，而且为其他成千上万的人创造就业机会。安妮现在为摆脱福利生活而感到骄傲，我们也为她骄傲。类似的建议在其他特惠区正在进行。

莱勒：肯普先生，你最近谈到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你说“全部的资本都掌握在白人手中”，你的意思是什么？

肯普：在我们看来，国内最大的问题，或者说国内经济最大的问题，是这部《税法》，它有 83 年的历史，是冷战和热战、通胀和萧条的遗物，它长达 750 万字，对资本和工作的男男女女课税太重。很明显，这个死结得一举解决。鲍勃·多尔和杰克·肯普第一步先完成全面减税，紧接着就取消这部《税法》。而比尔·克林顿和我的朋友阿尔·戈尔则要维持现状。我们要取消这部长达 750 万字的美国《税法》，一劳永逸地让它变成一次所得税，而不是二次、三次、四次地征收所得税，假如你死掉，还要没收你的财产。这是无法接受的。

我们必须有一部不保护权势集团的、面向 21 世纪的《税法》。这部《税法》是这样的：减少和免除资本收益税，把高到极点的税率降到一个合理的程度。我认为和平时期税率不应当太高，我和鲍勃认为它不应当高过 25%。分阶段改进，资本会流过来，注入经济。我们要使人们有办法得到资本，小企业主、妇女、非洲裔美国人、亚洲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将能够开办他们的事业。

兰开斯特的丹娜·克里斯特说，国会通过税法的那一天，她将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开斯特开办一家新的工厂，雇用 50 到 60 个工人。

莱勒：谢谢你。

肯普：戈尔将它称之为“滴流”，我则叫它“尼亚加拉大瀑布”。

戈尔：“尼亚加拉大瀑布”这种说法的问题在于多尔参议员和肯普先生要把美国经济放入一个桶中，然后把它顺着瀑布漂下。

这个 5500 亿美元的冒险的税收方案实际上是对 900 万最贫穷的工人家庭增税。肯普先生有一次曾经反对它并称之为不公正，而现在它是他支持的方案的一部分。不只这样，这个方案还会在赤字上捅漏子。它会抬高利率。这将意味着更高的抵押金（尤其是那些可变的抵押率）和支付更高的汽车价格。它还会导致大幅度地裁减医疗照顾、医疗补助、环境和教育方面的预算。这真是极其冒险的。

至于那些尖刻的话语，我本人不太在意。当他说多尔“见税必增”时，

他的话比这还尖刻。

多尔大约写了《税法》中的 450 款，你在完全消除它时最好与他核实。他可能会承认的。

肯普：吉姆，5500 亿美元的减税，这是阿尔不愿提的。该方案必须在未来 6 年里美国经济的商品和服务产值达到 50 万亿这个背景下来考虑。对于 50 万亿的经济减税 5500 亿不过是九牛一毛，只占 1·5%，它要捅漏子的对象不过是这届政府试图对《税法》作拙劣的修补并固守不该固守的东西的方案。它要摧毁官僚制度，但它要扩大经济增长。这对美国来说是很重要的。

莱勒：副总统先生，肯普先生两次谈到的观点是，我们需要抛弃现在的《税法》并代之以全新的税制，他是不是这样说的？你同意他的观点吗？

戈尔：我们已经通过《纳税人权利法案》。我们现在已争取到新的条款，使电话发送成为可能。我们正在争取全面的税制改革。最重要的是，此刻，我们提出一个对中等收入减税的方案，其中包括好几项具体条款。我们已经对全国年收入在 2·5 万美元或以下的 1500 万户中等收入的工人家庭实行减税，平均免税 1000 美元。最近两年，我们向国会提交了对中等收入家庭减税的议案，但将不会被接受——未被鲍勃·多尔和纽特·金里奇接受，因为他们说，如果不对医疗照顾、医疗补助、教育和环境进行大幅度削减，他们就不通过该项议案。

我们决心在未来的 4 年里继续推进比尔·克林顿总统提出的减税议案。这儿重提一次：1500 美元的学费税收减免，1 万美元的税额减免，这样每个家庭就不用对所付的学费交税，免除出售住宅的资本收益税；对于首次购买住宅和支付健康照顾费用的人停止收税；给每个孩子 500 美元的税收优惠。肯普：你们在克林顿政府下要得到税收优惠，条件是：你们必须按戈尔和克林顿的要求去做，这不是美国。

当约翰·F·肯尼迪减税时，经济增长了，失业下降了，预算平衡了，收入上升了。确实，肯尼迪的财政部长和副财政部长签署了多尔的减税法案，削减了资本收益税，平衡了预算，提供了每人 500 美元的税收优惠。很明显，如果我们这个方案能提高经济，增加收入，那么，医疗照顾也将得到拯救。它将会拿到一个委员会上去讨论、研究，比尔·克林顿和鲍勃·多尔都认识到它必须由同一个人来研究。我要说，它确实经过研究，1983 和 1984 年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因此得到拯救的。

瞧，我们精简了政府——减少了政府预算的增长，但我们还得促进经济增长。鲍勃·多尔和杰克·肯普认为，我们的目标是使美国经济在下一个 15 年翻一番。而按他们的政策，要使美国经济翻一番要花 30 年到 40 年。这是无法接受的。

戈尔：他们的全国竞选筹划指导委员会的主席、参议员达马托说，鲍勃·多尔要削减医疗照顾的费用以此来兑现这项建议，但他要等到大选后才这样做。

多尔参议员以前就动员过削减医疗照顾，为使它成为法律甚至不惜使政府关门。这项建议如果成为法律，它将会使依赖医疗照顾的一般夫妇多付 268 美元的费用。他竭力加倍减除，反过来让人们得到的越来越少。

我们有一项保护医疗照顾和减税的平衡预算方案。

莱勒：肯普先生，不迅速改变福利计划（包括社会保障和医疗照顾），真的可能平衡预算吗？

肯普：好的，在我回答这个问题前，我先说一句，在医疗照顾问题上，发动一场恐吓这个州、我的家乡纽约州和加州的美国老年公民的竞选运动是可耻的。

戈尔：一州又一州，是不是这样？

肯普：是的，现在还有马里兰州。

花钱来误导美国人，这简直是蛊惑人心。只有在白宫的克林顿和阿尔·戈尔看来，对每一个老年公民的人均预算从 1996 年的 4800 美元增到 2001 年的 7200 美元会被认为是削减。

难道这个国家竟会有人认为鲍勃·多尔，这个几乎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他的祖国，这个在参议院服务多年，这个帮助拯救了社会保障，这个在 1945 年为救一个负伤的发报员从意大利北部的里瓦山脉的狐狸洞里爬出来的人，可能把我们的国家推向前进，而把什么人留在后面不管吗？

我们当然能平衡预算。我们当然能抑制福利预算方面的开支增长。但吉姆，很清楚的是，你不能不促进经济增长就能平衡预算。现在的增长率只有 2.5%。我们要使增长率翻一番，我们应当使美国的经济规模翻一番。这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更多的财富，有更多的收入和更多的资本，特别是对我们国家的穷人和那些落在后面的人来说是如此。

戈尔：莱勒先生，我们的平衡预算将把“医疗照顾信托基金”延长 10 年。一张委任状是好的，但如果我们采纳了这个 5500 亿美元的冒险的税收方案，委任状就不会起任何作用。人们已在用“吓人”这个词了。

两天前，我和劳顿·奇利斯州长（他就在这儿）一道去萨克拉门托的“老年人联谊中心”。我与一个名叫多萝茵·沃内勒的老太太聊天，她说：“我们可能不像华盛顿的那些人那样精于计算，但我们会做加法和减法。”这就是她加减的数目：鲍勃·多尔的方案可能要对接受医疗照顾的一般夫妇增加额外的 268 美元，他的方案还要加倍减少收入，他的方案将会使人在一生中损失额外的 1700 美元，降低家庭护理标准和家庭对老年人护理照顾的保障。

比尔·克林顿不让这种情况出现。我们将永远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肯普：吉姆，医疗照顾对全国的老年公民来说太重要了，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玩眼下正在玩的政治游戏。今晚我们在这儿的时候，它正在损失 80 亿美元。

按总统自己的医疗照顾托管委员会（3 个委员在他的内阁中任职），到 1998 年它将损失 230 亿美元。必须做些事情。鲍勃·多尔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但很清楚，除非把我们的经济增长率至少翻一番，否则，就不能拯救不该听任其垮掉的医疗照顾、社会福利保障和任何其他美国人民的社会—福利网中的项目。

莱勒：副总统先生，肯普先生指责你蛊惑民心。

戈尔：噢，正如我前面说到，他对鲍勃·多尔用的词比这还尖刻。他说，鲍勃·多尔对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增税。就在两年前他还说，鲍勃·多尔 1982 年的增税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增税。

但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医疗照顾自从它在 1965 年创立，已经作了 23 次的调整。鲍勃·多尔恰好在今年还偶然地吹嘘，最初他是投票反对创立医疗照顾的 12 人中的一个。我认为他现在不是——那时他不信任它。他去年提出的方案必然对医疗照顾是破坏性的。

对此，我也不想提它。美国医院联合会说，它已经关闭了 700 家医院。

天主教健康联合会、AAPP 和其他许多组织密切关注着医疗照顾，还说，多尔—金里奇的医疗照顾方案将会导致大幅度地削减，可能建立一种双轨制，最终结束我们现有的这种医疗照顾制度。

我们的计划是将医疗照顾延长 10 年。我们在平衡预算的框架之内依然保护医疗照顾。

肯普：同胞们，他们没有计划。他们根本没有计划。总统自己提议，在未来 5 年或 6 年间，抑制医疗照顾支出的增长，只应当维持在 6% 的水平上。根据共和党的方案，不考虑数目，它将以 7% 强的速度增长。

但这是题外话了。必须考虑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如何扩大经济的规模，创造国家财富，使之比目前的 6 万亿或 7 万亿美元至少翻一番，达到 12 万亿或 14 万亿。我们在 15 年后将有额外的 6 万亿给美国人民，另外 1 万亿美元的收入用来拯救医疗照顾和社会保障。但根据现在的一部《税法》和《管理法》，政府允许人们不断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打官司。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可能实现上述目标。必须改变这种局面，它将在鲍勃·多尔和杰克·肯普的领导下改变。

戈尔：我认为肯普先生在说克林顿总统要求把医疗照顾减少到 6% 及其他话的时候，他无意中犯了一个错误。我想你提到的是《金融杂志》那次面谈，《金融杂志》的出版商两天前刚刚给肯普先生发了一封信，请他不要再引用《金融杂志》上不准确的说法。那不是总统说的话，那不是总统的观点。让我来阐明他的观点吧。

我们要拯救医疗照顾，我们要阻止对医疗照顾损害的企图，我们要在平衡预算范围之内这样做。

莱勒：肯普先生，如果有区别的话，多尔—肯普政府如何改变我们国家现在在堕胎问题上的法律状况？

肯普：我会回答这个问题。但为了现场登录，我想把我从《金融杂志》社得到的这封信给朋友们传看一下，信中暗示，比尔·克林顿总统想要用并确实有依靠降低老年公民的津贴的办法来减少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

撇开这个问题不谈。我们认识到，美国没有一致。坦率他说，美国在自称为“维护选择派”与“维护生命派”之间分裂了。我敢肯定，对妇女来说，这是一个很情绪化的问题。对我们其他人来说肯定也是这样，像收养了 3 个孙子的我和我妻子。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晚上，我们都感谢上帝，感谢他给年轻的妇女以选择权，让她有机会选择生命。我们的国家不应当被这个讨论撕裂。讨论必须在文明和互相尊重的气氛中进行，我和鲍勃认为它可以是这样的。但我们应当认识到，每个生命都是宝贵的，对于未出生的生命，我们应当给予我们力所能及的保护。

但考虑到在我们这个国家，每 3 个婴儿出生，同时就有一个流产，比这更糟糕和更丑恶的也许是，我知道，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悲剧——不论是“维护选择派”还是“维护生命派”——我们有这样的总统，他否决了国会禁止在孩子出世前几分钟可恶地剥夺孩子生命的立法。

莱勒，副总统先生，请。

戈尔：克林顿总统说得很清楚，他可以签署一项不支持堕胎的法律，条件是有这些例外：当孩子的母亲有严重的健康问题，譬如不能再生孩子，大夫建议她这么做时，要保护母亲的健康。

这里真正重要的是：妇女究竟有没有选择权？肯普先生和多尔参议员的

竞选政纲上发誓要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来取消妇女的选择权，不论情况如何，政府都要插手，命令妇女按政府说的去做。

肯普先生在 47 次投票中有 47 次赞成这样一个完全限制妇女选择权的修正案，而不论情况如何，甚至涉及到强奸和乱伦。我们将永远不会允许取消妇女的选择权的。

肯普：没有共识，一项宪法修正案是不会通过的。我们必须用说服而不是威胁。鲍勃·多尔和杰克·肯普试图提醒美国人，我们的孩子是多么宝贵的财富，以及我们为何要保护无辜的生命，包括那些尚未出生的生命。想想看，这届政府不和国会中的议员商量就否决了必须禁止那种行为的机会，而国会议员非常想有机会禁止那种可憎的行为，这对美国人民来说是无法接受的。鲍勃·多尔赞成禁止在妇女妊娠的第 9 个月故意堕胎。

莱勒：副总统先生，波斯尼亚的战争真的结束了吗？抑或在美国和北约部队撤离后它还会爆发？

戈尔：波斯尼亚的战斗已经停止了。克林顿总统使我国牵头与我们的盟国一道，把交战各方请到俄亥俄州的代顿，达成了一项旨在结束波斯尼亚战争的和平协议，显示了巨大的勇气、远见、智慧和领导魄力。

我们希望局势会保持下去。选举刚刚进行。波斯尼亚朝着通往和平和解的路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们应当为我们的士兵而感到骄傲，他们在把和平带到波斯尼亚的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这不是比尔·克林顿显示这种领导魄力的唯一例子。我们几乎未发一枪就恢复了海地的民主，我们在北爱尔兰和中东看到了和解的姿态。《圣经》上说：“永远有战争和战争的谣传。”前一天晚上，总统说，世界上永远有麻烦，当世界向美利坚合众国寻求帮助时，美利坚合众国会提供远见。作为总统，比尔·克林顿已经提供了那种领导。由于比尔·克林顿的对外政策，我们今天更加安全、更加强大了。

肯普：鲍勃·多尔支持在波斯尼亚部署军队，但这届政府的对外政策的问题是缺乏对外政策。所谓的对外政策是含混的、自相矛盾的。在我们与盟国协商前就跑到伊拉克去轰炸是草率的，想想看，总统居然没有与佐治亚州的萨姆·纳恩或科林·鲍威尔这两位在海湾战争中帮助联盟团结的有功之臣磋商。问题还不只是草率，这是一种软弱的信号，而不是力量的信号。

更糟糕的是，他们宣布了胜利。他们在每一次行动中都宣布赢得了胜利。我们这 4 年的军事行动比我可以想起来的任何 4 年都要多。我现在 61 岁了。无法想象，模棱两可也能叫作外交政策。

我要说一句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的话，这句话也是我终生信奉不渝的：“软弱就是一种挑逗”。我们发出的信息应该是明白无误的，这就是在鲍勃·多尔担任美利坚合众国的总司令时我们对世界发出的信息。

戈尔：我们轰炸萨达姆·侯赛因前，我们当然与盟国磋商过。但有时当事关我们的利益时，美国必须采取单边行动。今晚，施瓦茨科普夫将军也在观众席上。他领导前总统布什组织的联盟，以美国为首把萨达姆·侯赛因赶出科威特，对于这种方式我们十分引以为自豪。萨达姆·侯赛因曾 3 次试图发出挑衅，但都饱受重拳，每次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都作出了快速的、明确的回答，使萨达姆·侯赛因如芒刺在背。

莱勒：肯普先生，多尔参议员批评总统对海地的做法，说他做错了。他做错了什么事？

肯普：噢，鲍勃·多尔曾建议成立一个“事实调查委员会”。前总统卡特和科林·鲍威尔将军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在我们看来，海地不能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很清楚，就应该这样做，但我们的信息不充足。由于我们没有首先给加勒比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在美国进行自由贸易的机会，因而导致了问题的产生。它带来了许多经济问题，导致了经济混乱，然后我们反过来帮助他们摆脱困境，正如我们在墨西哥所做的。我们首先导致了问题的产生，然后再花 200 亿至 500 亿美元来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海地的状况充其量只是模棱两可罢了。我们祈祷海地的民主到来，但迄今为止，海地传来的信息还是十分模糊的，尽管这届政府已宣称赢得了胜利。

戈尔：噢，我没有听说做错了什么事。事实是我们在海地恢复了民主。当我说“恢复”时，其实这是海地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民主。而且它是在一枪未发的情况下取得的。

当克林顿总统调遣布莱格堡的部队时，我就在椭圆形办公室。这是一个很紧张的时刻。飞机在空中盘旋，调停人在和独裁者谈判。当独裁者从他在海外的间谍那里得知所有的飞机正在起飞，他说：“咱们离开这里吧。”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的。这是最熟练运用外交和军事合力的一个例子，人们可以在美国历史记载中找到类似的例子。

我为我们的总统如此行事而感到骄傲，迄今为止，结果真是棒极了。我期望并祷告这种情况将保持下去。

肯普：我们在波斯尼亚、海地、墨西哥和中东，将不会取得成功的结果。最严重的情况之一——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这届政府采取了巨大的努力迫使墨西哥的比索贬值。墨西哥的经济几乎下降了 40% 至 50%，然后我们插手，帮助他们摆脱困境。我们引发了问题，然后不得不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我们应当给人们提供与我们进行自由贸易的机会，并保证每个人都认识这条“黄金定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此来形成一个建立在贸易和传播民主基础上的外交政策。先礼后兵，早餐前不要轰炸。

莱勒：副总统先生，墨西哥是我们引发了问题，然后不得不插手并帮助他们摆脱困境的吗？

戈尔：不，不是这样的。当肯普先生开始谈论“黄金定律”时，我以为他会再谈一谈“金本位”的呢。“金本位”过去是所谓的供应学派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现在它可能是他赞成鲍勃·多尔的别的什么东西，因为鲍勃·多尔投票使我们脱离了“金本位”——在我看来这是明智的。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说，如果我们那样做，它会使我们陷入萧条和危机之中，还会造成上百万人失业。

我还是开门见山的好。事情不像肯普说的那样。当墨西哥的比索发生危机时，比尔·克林顿总统再一次显示出大胆和创造性的领导才能。我急不可待地要加一句：在那个时刻，参议员鲍勃·多尔给予了关键性的两党的支持。他赞同总统，支持总统，他说那是明智之举。他在参议院未得到多数票，纽特·金里奇议长在众议院也未得到多数票，这样才没有留下他们支持总统的记录。

所以，总统，正如以前的总统通常会做的那样，孤军奋战，他做了正确的事。大家知道，那时候人们说那是一个大冒险。最终结果我们赚了 5 亿美元。所有的贷款都已偿清。我们用 5 亿美元来进一步减少赤字，现在赤字已下降了 60%，它还要向着平衡预算的目标继续下降。这事是有益处的。

肯普：真令人难以置信，我们造成了友邦国家如墨西哥的生活水平的下降，失业率上升，我们把美国纳税人的美元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钱送到墨西哥，然后我们赚了钱。在那个意义上，要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有利可图性”作新的解释。痛苦、折磨、失业、破产、失去了原来的生活水平，墨西哥人不得不穿越加州、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和得克萨斯州的边界。如果那就是我们对第三世界和拉丁美洲的外交政策，我比以前更有理由相信，我们得选一个懂贸易、懂诚实赚钱、懂私人企业、懂民主资本主义的总统，而不是任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克林顿政府来造成社会主义。

戈尔：我不理解指责我们引发了墨西哥货币危机的依据是什么。他们制订自己的货币政策。多年前，我们常常听到美国政治中的这个词“一事当前，先骂美国的一伙人”。我从来就不喜欢那个词。但今天用到这里，倒很合适的。

不该指责美国制订墨西哥的政策。我们帮助处于困境中的邻居。他们生存了下来，他们更强大了，他们复兴了，并还了我们的钱。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红利。

莱勒：肯普先生，多尔参议员前天晚上批评克林顿总统削弱国防开支因而减少了加州的就业机会。他是不是把国防开支同时看成是就业机会的项目？

肯普：吉姆，我认为，鲍勃·多尔没有提出我国的国防是就业机会或社会—经济项目。但显而易见的是，这届政府的国防预算只占我国国民经济的1%，这个比率比珍珠港前还要低。这很危险，也很有煽动性。这种混乱的信息，美国外交政策的模糊，我认为（多尔也这么认为），不仅给美国在全球而且尤其是在国内带来了问题。加州一夜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变化，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混乱。

那时，总统肯定会跑到加州并宣布：“好吧，我们可能要生产 B1 或 B2 轰炸机。”这不是政策制订的方式。国防政策应建立在国防需要、安全需要、美国的战略需要的基础上。这样的政策只有在鲍勃·多尔担任总统时才能制订。

戈尔：噢，首先我要说，最近两年来，克林顿总统提出的国防预算和国会多数党提出的国防预算实际上并无很大差别。它们非常非常相似。我们的经济方案则有天壤之别。我早就谈到，那个 5500 亿美元的冒险的税收方案，据说“康科德联盟”，包括皮特·彼特森、沃伦·鲁德曼这样的共和党人都认为，它是对我国未来合理的国防预算能力的一个威胁。他们说，这个税收方案不仅会对 900 万贫穷的美国家庭增税，而且几乎必然会大砍医疗照顾和国防上的预算。

我们有一个保护国防预算，也保护医疗照顾、医疗补助、教育和环境预算，并对中等收入之家减税的平衡预算方案。

肯普：吉姆，不得不让阿尔再听一遍：本世纪每次我国经济方面的就业、储蓄、投资和风险资本全面降低税率，收入就上升了，而不是下降了。好了，如果说法的目的在于增加收入，我们就应当考虑考虑降低税率，正如约翰·F·尼迪所做的。税率不可降到零，它不可能降得太低，否则就不可能有足够的收入了。克林顿总统在休斯敦道歉时说：“嗨，我增加了你们的税收，它们是太高了。”布什总统也为增税而道歉。鲍勃·多尔了解，税率必须全面下降，那时，我们就能达到最重要的阶段：取消这部《税法》，代之以 21

世纪的新《税法》。

莱勒：副总统先生，一些民主党人指责说，如果肯普先生和多尔参议员当选，生态环境就处于危险之中。你有这样的恐惧吗？

戈尔：我当然有。

我先说一句，在提到 60 年代减税时，我想提醒你们注意，肯普先生过去曾指出来——鲍勃·多尔那时在国会，他是那些投票反对约翰·肯尼迪减税的人中的一个。

从多尔参议员和纽特·金里奇议长迫使政府关门，企图让克林顿总统接受，以便通过的那种法律来看，环境面临着可怕的威胁。

他们邀请了美国最大的污染源的游说者到国会，对《清洁饮水法》和《清洁空气法》进行了文字修改。克林顿总统阻止了他们的行动。

我们在环境上有一个积极的日程，因为我们深信，这是关系到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未来的事。清洁的空气、清洁的饮用水和清除那些离孩子们的生活区只差一英里的堆放有毒废弃物的地方，这很重要。

我们计划在下一个 4 年中，清除美国三分之二的堆放有毒废弃物的地方。我们在过去 3 年里清除的地方比前两届政府在 12 年里清除的还多。总统刚刚拨出一块地作为“犹他国家纪念地”。他正在保护佛罗里达州这儿的大沼泽。鲍勃·多尔反对那项计划。比尔·克林顿总统将保护我们的环境，防止我们看到的上一届国会和共和党政纲中对它所作的那种攻击。

肯普：鲍勃·多尔也将保护环境。阿尔，确实如此。富兰克林·D·罗斯福 1932 年说过，“我们必须恐惧的唯一东西就是恐惧本身”。吉姆，他们所提供的唯一东西就是恐惧，恐惧环境，恐惧纽特·金里奇，恐惧共和党人，恐惧鲍勃·多尔，可能考虑还要恐惧降低税率。恐惧的东西何止这些？

是的，我们考虑到，我国必须生活在与环境的平衡中。我们每一个有孩子和孙子的人都考虑到，我们应该如何达到一个平衡。这不是工作与环境的对立，两者都很重要。

现在的经济是我国历史上管得最多、打官司最滥的经济。我们召集男女企业家，请他们坐下来表达他们如何使这些法律生效的想法，有人则把男女企业家称为“污染者”，这真令人不能容忍。这正是这届政府反资本主义特性的典型例证。

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因为我们信仰个人的民主资本主义。

戈尔：清理环境可以创造许多就业机会。全世界的人都想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他们爱他们的孩子，他们要让孩子们能喝上清洁的水，呼吸到清洁的空气。他们不想让孩子们生活在堆放有毒废弃物的附近。

当美国率先保护环境时，为了孩子，我们做得对。我们也创造了新的商业机会，新的就业机会，新的美国繁荣的资源。我们要按常识的方式来做。

莱勒：肯普先生，你以前已经提到过，你在礼拜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届联邦政府参与制订了“恐怖的规章管制”，你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肯普：噢，正是我所说的。那种规章——拿走或降低某个农场主或牧场主或房主的潮湿的土壤、或为濒危动物准备的地产的价值的规章，拿走或降低了价值而不给主人补偿，这就是一种“恐怖统治”。现在正在发生这种事情。

不久前，俄勒冈州一个农场主宣布他 25% 的土地为潮湿的土壤。因为有融雪流下来，所以这块地可以认为是潮湿的土壤，他完全是自愿这样做的。

两年内，他发现秃鹰开始到这里来栖居。陆军下属的工兵团、野生动物和渔业署，所有联邦机构都来到他的土地上宣布这是联邦的潮湿的土壤，并告知他不能在此驾驶。他们移了路，他不能修篱笆，他们还不愿付给他损失的钱。我要说他们不愿为土地损失的价值付钱或者作出补偿。

我们一个自由社会，怎么能够把人民变成美国政府的敌人或者对手呢？劳工部的职业安全与卫生审查委员会、环境保护署，就是这样干的。我们应当认识到，为了我们的孩子、孙子，美国应当以这样一种方式生活，即与自由企业制度建立联盟。我们能这样做，但需要华盛顿有新的领导。

戈尔：噢，认识环境的重要性是要付出代价的。肯普先生投票反对《清洁饮水法》，反对延长总统《特别基金法》。

我们采取了新的措施：保护环境，减掉不必要的繁文褥节。我们减掉1·6万页的章程。我们在环境保护署实行了一个叫作“XL计划”的计划，我们在此与企业讨价还价。当他们说“我们将超过标准”时，我们说“给环境保护署一个衡量进步、然后把规章统统扔掉的办法”。就是用这种常识的办法才能既清理了环境又省掉了不必要的红头文件。

对此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事，尽管有些人想走得更远。有些人甚至建议——他引用的这个法案就有这个内容——污染者如果同意不再向江河里倾倒有毒废弃物，他们应当得到报酬。污染者报酬条款是错的。我们应该同它斗争，我们将永远不允许它实现。

肯普：1970年当我从布法罗去国会时，由于污染的缘故，人们几乎可以步行穿过伊里湖。实际上在共和党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时代就开始清除污染。由于我们许多人在国会投票支持在湖的两岸建立二级、三级处理厂，今天，我们大湖水的水变得更加清澈了。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进步，我们还必须取得更多进步。

联邦政府把国家变成支配的东西，意味着我们不能在环境与企业的和谐的状态中工作，这是一个错误。对美国的企业和它们创造的就业机会，我们应当用激励机制，而不是挥舞大棒。

莱勒：副总统先生，美国政府，如目前的克林顿政府，是不是在推行一种“恐怖统治”或通过一种“恐怖统治”来推行政策？

戈尔：不，当然不是。我们采取一种崭新的办法来减掉不必要的繁文褥节，不必要的官僚机构。

前天报上登了一件事，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暂时搁置批准家庭怀孕测试。这是在上届政府的治理下发生的。我们说过要改变那条规则，现在它正在改变；此刻，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正在考虑这事，它将会改变。其他的例子还有成千上万。

我们认为有一种新方法。我举一个职业安全与卫生审查委员会的例子。我们使该机构的工作方式焕然一新。有些人想取消它，我们认为保障工作场所的就业安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所说的是：瞧一瞧这些结果，并对此开始加以评估。我们发现监察员的报酬以他们发出多少罚单为基础。我们要彻底改变那种情况。如果雇主的墙上没有贴一张通知雇员权利的告示，他们过去常常进去递给他一张罚单。现在，以此为例，他们采取了新方法，如果他们进去，看见那儿没有告示，他们就走出去，从车尾的行李箱中取出一张告示给雇主。

我们在所有的职能部门都采取同样的方法。我们取得了许多进步，我们

通过常识来保障而不是通过愚蠢的举动来保护工人的权利。

肯普：噢，我们必须使经济繁荣才能有钱来提供这种技术。所有排放物的 10%——所有排放的二氧化碳的 10%，空气中氧化物的排放由那 10% 的汽车引起的。现在有一种技术，可利用红外线来确认哪些汽车造成了我们大气中的空气污染。现在还不能使用这种技术，因为那样做，我们要带走美国的每一个司机，1·1 亿辆汽车，并课以 17 美元、20 美元或 25 美元的罚款。瞧，我们应当追究的是那些污染源，而不是驾车上班或上学的男男女女，还应当保证他们有机会像别人一样的生活，不用受到华盛顿权势集团的管制。

我们可以采用技术。这就是答案。但要得到技术，我们必须使经济增长。现在经济增长得还不够快。它会在鲍勃·多尔和杰克·肯普的领导下快速增长。

戈尔：目前经济增长得很强劲。我们在最近 4 年创造了 1050 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上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 4·7%。平均增长率也在上升，比前两届共和党政府中的任何一届都要高。

鲍勃·多尔在今年 2 月份时说，这是 30 年来美国经济最强劲的时候。保守的商业杂志《巴伦周刊》也说，目前的经济形势是 30 年来最好的。

我们有良好的、稳定的增长。我们不要用 5500 亿美元的有风险的税收方案来冒险。

莱勒：肯普先生，你说经济的增长方式不如它本来应该的那样，你的衡量标准是什么？

肯普：噢，恰如我以前所说，仅仅几年前，一个人工作就能养家糊口，而现在要两人工作才行。女人或男人要去工作，这本来应当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而今天的美国，一家里的男女主人必须去工作，一个付税款，另一个养家。这不是美国。父母没有足够的时间与孩子在一起。人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享受天伦之乐。人们没有钱储蓄，家庭是美国赋税最重的组织。

我在洛杉矶度过了我的青少年时代，那时，一个中等收入之家只向联邦政府缴纳收入的 4% 到 5%。今天，差不多要缴纳 30%，至少也是 27% 或 28%。这真是无法接受的。今天，阿尔·戈尔继续宣传，我们不能对美国人民和为美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必要的资本形式进行全面减税，这恰好与美国历史上其他时间，与罗纳德·里根和约翰·F·肯尼迪的经验完全矛盾。

另一件事也非常非常重要。把我们的税收方案称为“冒险方案”使我想起这样一个事实，这届政府主张给你们减税，条件是你们必须按他们的要求做。他们要减资本收益税，但只为那些有住宅的人。创造全部就业机会 91% 的美国的企业主怎么办？我爸爸是一个卡车司机，他买了卡车，开办了公司。我们需要使更多的卡车司机变成卡车的主人，如果没有办法得到资本以及更多的卡车和就业机会，他们就不可能这样做。

戈尔：我们在最近 4 年里创造了更多的新的企业——在最近 3 年的每一年里创造的就业机会比美国历史上的任何一年都要多。我们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是 30 年来最低的。《商业周刊》说，这些是你们想要得到的结果：低通货膨胀、低利率、就业机会多、高增长，这一切都是在平衡预算的框架之内完成的。我们连续 4 年降低了财政赤字。在前两届政府使它上升了几乎 300% 后，我们使它下降了 60%。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更多的那种增长。我们认为我们仍可以干得更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保护重要项目的平衡预算框架内减少中等收入之家的所

得税。

肯普：4年太晚了。你们4年前就告诉我们了，而现在我们仍然没有得到。我们怎么能相信一个政府突然会在4年后或者说它过去4年的最后一年里对我们说，他们要履行他们4年前作出的诺言呢？

我国的经济增长不够快。“富人”倒好过了，吉姆，但“穷人”不好过。有许多家庭不能在一起生活，还有一些就业机会没有被创造出来。在我们的内城，失业率高达16%至25%。在现代经济的条件下，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社会上这种情况都令人无法接受。莱勒：副总统先生，有关履行诺言的事，多尔参议员前天晚上向克林顿总统提出了相同的问题。对此你的回答是什么？对针对你和总统的指责你有什么话要说？

戈尔：哦，比尔·克林顿允诺要创造800万个就业机会，现在创造了1050万个就业机会；他允诺要把财政赤字减少一半，现在他把它减少了60%；众所周知，他允诺要结束福利，他现在已通过并签署了《福利改革法案》。他已经使190万人脱离了食品券，找到了好工作。我们已拟好计划，要在以后的4年里再使100万人脱离食品券。

他允诺要执行死刑，他通过了一项《反犯罪法案》，其中新的死刑规定有60款之多。

他允诺要通过一个计划，在街上投入10万新的警察。这是一个遭到多尔参议员反对的法律，现在，2万人已经街上执勤。在佛罗里达这里，他们中的2000人已得到津贴。我们走在了日程的前面。我们在以后的4年里再把另外的8万部署在街上。其中，4.5万人现在已得到津贴。这就是诺言和履行诺言的记录。他允诺给中等收入之家减税，我们已对1500万个家庭实行了减税，我们对所有中等收入之家的减税方案已经在国会搁置两年了。在以后的4年里，我们会通过它。

肯普：噢，把这种经济说成是30年来最好的经济只是动摇了我们的想象力。过去4年里我们只有大约2.5%的增长率。我的朋友阿尔·戈尔说，现在的经济比里根年代还好。根本没有。不管他是否这样认为，对这个事实均无影响，即美国人民无论从道德上、社会上还是经济上都无法接受把经济停留在20世纪的水平上。我们在冒险。我们有些家庭受到了伤害，有些人失业了，有些人没有财产，我们的政府不是在内城拆除公共住宅，不是提供给他们别的东西，而是更多的公共住宅。他们对内城问题的解决是社会主义，请原谅我用这个词，但这是实情。这不是为人民。政府告诉他们住在哪儿，到哪儿去上学。我们需要能选择学校，我们需要使公共住宅私有化，我们需要将它们卖给居民，我们需要兴建内城的企业区。我们还需要降低劳力、资本和其他生产因素的税率。这将会在鲍勃·多尔领导下发生。

戈尔：我们拆除了过时的、无法住人的房子，并代之以新的能住人的单元房。我们有给私人的发票，这样个人就可以选择自己住的地方。我们正在向那些想买房的人出售这些单元房。多年前，当肯普先生鼓吹它时，他有个好主意。他谈论它，我们实践它。在美国人民的帮助下，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打算做得更多。

莱勒：肯普先生，这些天，有些人在谈论，美国人的灵魂出了严重的问题，人们变得太吝啬、太自私、太冷漠。最近有个例子，棒球运动员随地吐痰。如何处理这件事，你考虑过没有？

肯普：在21世纪到来之际，文明、责任、种族和解、治愈我国的创伤必

须成为我们国家最大的也是唯一最重要的目标。如果我们不能在洛杉矶东部或哈莱姆东区或加州帕洛阿尔托的东部实行民主的资本主义，我们怎么能以美国式的民主的名义，对东欧人说，民主的资本主义在那里将发生作用？如果民主、私人企业、限权政府、法治和文明在我们家里的后院或在南布朗克斯都不能起作用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对南非及曼德拉新政府说，这些东西会在他们那儿起作用？美国人怎么能够把这么多人留下就进入 21 世纪？几个星期前，《今日美国报》做了一个调查，他们说，美国的富人——有钱人，干得很好，但没有钱的人——穷人被抛在了后面。

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零和效应”游戏。就像我们在少男少女时玩“音乐游戏”一样，当音乐一停，大孩子就把小孩子从最后那把椅子上推下来。乡亲们，这不是美国。我们需要更多的椅子，我们需要更大的餐桌，我们需要更大的宴会，我们需要创造更多的财富。我们要为任何一个男人、女人或儿童的生活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更多的途径得到信贷，资本、教育选择和机会，使他们成为上帝让他们成为的人，而不是华盛顿特区让他们成为的人。

戈尔：莱勒先生，我认为，纵观杰克·肯普的一生，他一直是反对你问题中提到的那种粗野和不文明行为的最强有力的、最急需的人。我认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共和党里有一个声音在说，“我们应该是一个国家，我们应该跨越所有种族的、民族的和文化的樊篱”。我认为这才是要发出的最重要的信息。

当不文明的行为确实发生时，我们应当义正辞严地反对它。你问起罗伯特·阿洛玛的事，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我认为他应该受到严厉的纪律处分，应当立即停赛。我不明白为什么还不采取行动。但同样应该谈到的是，我们社会各种组织中许许多多的问题。

我要补充一点：肯普先生在使我们摆脱那种态度方面显示了领导才能。

肯普：噢，谢谢你，戈尔，真心诚意地谢谢。

我想力图证明一点：除非每个人都认识到人人都站在追寻“美国梦”的同一起跑线上——如果你出生在美国，你要当女中音也好，木匠师傅也好，学校教师也好（像我女儿一样），或者职业橄榄球的四分卫也好，没有什么东西挡你的道，否则文明就不会回到这个国家。扫除那些障碍正是鲍勃·多尔要做的：把我们的国家推向前，不让一个人留下。

莱勒：副总统先生，有人认为，解决文明问题和美国人的灵魂问题，其实不是别的，而是一个经济问题。你同意这种论调吗？

戈尔：我认为经济是这个问题中最重要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内城的减税、雇用 100 万摆脱福利制度的人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关注经济政策的原因，这项政策已创造了 1050 万个新的就业机会，并在保护重要项目的平衡预算的框架内还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我们尤其关注贫苦地区，因为我们不能留下任何一个人。我们的特惠区和企业区以及减税，将鼓励更多的小企业的形成，小企业管理局规定了它向个人贷款的新办法，过去每个人贷款的途径是不相同的。这些是该计划的组成部分。

该计划的另一部分是“社区发展的财政制度”。有一项法律规定：内城社区的储蓄应当留在社区，虽然不是全部，但有一定的百分比应当留在那儿，防止钱从社区拿走，投到世界其他地方的流动资金中去。当他们在社区投资时，他们会发现偿还率很可观，有更多的小企业开办起来，社区也得到了改

善。这就是今日正在美国发生的事。还不够快，但比以前要快，而且我们相信我们能够用我们的计划加速它。

肯普：真的不能把强大的社区和强劲的经济区分开，如果没有强大的社区和强健的家庭，大家就不能有强劲的经济。“经济学”在希腊语里是从“家庭”或“家庭的法律和习俗”这个词来的。一个没有职责的家庭——即两个挣钱的人都离家上班，他们不能花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或者送孩子们去他们挑选的学校，确切地说，只能是联邦官僚机构选择的学校——就不可能是一个强健的、具有抚养、爱、尊严、正义这些与挣钱的人和稳固的工作息息相关的品质的家庭。如果男人或女人要去工作，那应该是他们的选择，而不是为了付税款。

因此，我们两者都需要。我们需要强大的社区——我们需要强大的学校。我们需要学校能培养出来自老师和家长的纪律和自尊。鲍勃·多尔想要增强公共教育，增强师资力量，而不是联邦机构——教育部。

戈尔：多尔参议员说过，他想要废除教育部。他投票反对建立一个“良好启蒙”计划。他强烈反对《家庭和医疗休假法案》，这是克林顿当总统后签署的第一个法案。现在多尔参议员暗示，他如果有机会，如果他当选为总统，他就要取消《家庭和医疗休假法案》。

我们主张用更多的教育机会和办法来加强家庭，而不是通过限制他们获得教育机会来加强家庭。

莱勒：肯普先生，说到这个问题，你怎么看？你认为《家庭和医疗休假法案》应该取消吗？

肯普：我不会投票赞成它，应该把它放在适当的位置。这届政府对每个问题的回答是另一种管制，另一种税收。很清楚，我们美国需要——我惊奇地想到，如果企业不赚钱，如果不提供许多就业机会，如果不是这种增进种子、氧气、资本的形成的政策，即允许公司不仅保留利润而且用它来进行投资，那么人们就会有一个强有力的《家庭和医疗休假法案》了。我前面谈过，宾夕法尼亚州的丹娜·克里斯特在兰开斯特开了一家小制造厂或批发中心，她说如果联邦政府削减资本收益税，她还要开办一个新厂。她希望政府削减资本收益税。对阿尔·戈尔和比尔·克林顿来说，这是某种程度的“滴流经济学”。把这事告诉丹娜·克里斯特，告诉范·伍兹，告诉我在南中央区遇见的男人和女人。告诉任何一个了解民主资本主义如何运作的人。

我要再说一遍：多尔—肯普政府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们要废除现存的分配财富的这部《税法》，并创造一部崭新的赞成家庭，赞成增长，不再二次、三次、四次地对从工作、储蓄、投资和企业的风险投资所得中征税的21世纪的《税法》。

戈尔：我记得，这个问题就是关于在家里有事或有人生病时，能不能请假。现在，这个法案已经有效运作起来了。过去如果你的孩子得了重病或受了重伤，你必须在医院陪孩子，即使在这些情况下，有些雇主还说，“你请假时间不能太长”。

我本人就知道有些人因为选择了陪孩子就被老板开除了。别跟我说这事没有发生过。全美国都发生了这种事。

但自从比尔·克林顿签署了他所签署的第一个法案，美国家庭就可以多次协调工作需要与家庭责任的关系。

现在我们想把它扩大到家长教师会上以及预约看大夫的事上。不该取消

这部法案，应当延长它。对此有经验的 75% 的企业都说，他们喜欢它，它很起作用。

肯普：噢，比尔·克林顿之前就是这样，比尔·克林顿之后它仍然是这样。

参议员戈尔、也就是副总统戈尔的一个好朋友，参议员聪格斯认为，他怕他的政党要落入爱雇员恨雇主的陷阱。你不能在工人和管理者之间打入楔子。

企业是在提供家庭请假。他们将继续这样做。他们应当这样做。他们必须赚钱。对企业、资本、劳动力和家庭的征税太高——我们要在新的多尔—肯普政府领导下减少管制负担和税收负担。

莱勒：先生们，刚才才是最后一个问题。现在是总结性发言，每人 3 分钟。

肯普先生，你先请。

肯普：谢谢你，吉姆。我还要感谢圣彼得斯堡人的热情好客，我也要谢谢我的朋友阿尔·戈尔生动的辩论。

我认为这是当今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经历了詹妮·柯克帕特里克说的“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世纪”。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体制下，战胜了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以及共产主义，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消失了或者说露出了本相，种族隔离制的罪恶结束了。确实，下一个世纪，下一个千年面临的问题只有一个，即我们能否把美国建成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民主国家？私人企业的民主实验、限权政府、法治、尊重家庭和传统的犹太教—基督教的价值观能否起作用，并因此成为我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福音？

对这届政府我满怀敬意，但他们的外交政策迷失了方向。正如我在上面提到的，软弱就是一种挑逗。显然，我们的经济也未达到这个伟大的国家进入迄今为止世界最兴旺的经济所应达到的标准。

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了。我们周围的文化好像在衰弱，家庭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人们在家里也未感到安全，母亲送孩子去上学也会感到不安全。我们的学校没有在进行教育，这不是老师的问题，他们超负荷工作，我女儿会告诉大家，他们得到的报酬极低。我们了解这些，教育需要加强。

我们需要改革教育、改革福利、改革诉讼和规章。我们必然要改革这部《税法》，它是本世纪可怕的战争、衰退和通货膨胀的产物，要改革它。我们需要懂得人民潜力的人来领导，我们需要为世界其他地方做好表率，因为他们的眼睛注视着他们；我们要在美国人邻里、社区和家庭中起好带头作用。这样，没有一个人，如鲍勃·多尔在圣迭戈市接受提名的演说中所说的，被抛在后面。

鲍勃·多尔，如我前面说的，是一个有勇气的人，一个讲原则的人，一个在 1945 年为救护受伤的兄弟从里瓦山脉的狐狸洞里爬出来的人。《圣经》上说：“没有一种爱比献出生命更伟大的了。”鲍勃·多尔正是这样。他走过阴暗的低谷；作为我们国家的总司令，他会以邱吉尔的勇气，林肯的原则，以及不屈不挠的乐观主义精神来领导这个国家。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总司令和下一届美国总统，鲍勃·多尔。

莱勒：副总统先生，请。

戈尔：多谢你，莱勒先生。我还要感谢圣彼得斯堡的人民和杰克·肯普。我对杰克·肯普和鲍勃·多尔十分尊重，他们是好人。

但我不同意他们的政纲，今晚上我力图说清楚这点。我这样做的一个理

由是，再过 27 天，美利坚合众国面临着一次抉择，要在对这个国家的未来的两种方案之间进行抉择。我们的方案是在保护医疗照顾、医疗补助，保护教育，保护环境、空气、饮用水、大沼泽、通格斯、加州的莫哈维沙漠、犹他州的红岩区（所有这一切已经得到克林顿总统的保护）的同时，创造上百万个就业机会，减少财政赤字，平衡预算。

我们还有扩大教育途径的方案。

今晚的听众席上有一家人，麦克尼尔家，他们就生活在圣彼得斯堡，父母均是教师。他们并不富有，但有强烈的价值观，他们重视教育。他们的大儿子是圣彼得斯堡初级学院的一年级学生，小儿子罗德里克是唐·麦克尼尔所教的那所中学的二年级学生。

罗德里克担心，等他上大学的时候，他付不起所需要的学费。我们的方案提供给他 1500 美元的税收减免，这实际上等于在那所初级学院免费上学，还提供了 1 万美元的税额减免。这样，没有一家，几乎没有一家，要支付他们缴纳学费的税。这项方案还对出售住宅的人免税，等于是对 50 万美元的赢利免税，它也对首次购买住宅的人免税。这一切都是在平衡预算的框架内进行的。

由于这样的政策收到了效果，过去 4 年里我们看见了进步。我今晚描述的那项冒险的方案已被许多不偏不倚的观察家认为是于事无补的方案。它是极大的冒险。

对比之下，我们的方案已收到成效并且会取得更多成效。我们要建设一座通向 21 世纪的桥梁，我们要使这座桥梁既坚固又宽敞，以便让所有的家庭都通过，我们要使它通向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因为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附录3 ‘96 美国大选：总统候选人辩论词（第二场）

1996年10月16日晚9时，在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迭戈市，举行了1996年美国大选的第二场总统候选人辩论。这次辩论采用了美国传统的“市镇会议”方式，由113名圣迭戈地区的公民充当台上观众并向克林顿和多尔提问。这次辩论仍由吉姆·莱勒主持。全文如下：

莱勒：晚上好。我们正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圣迭戈大学的希利剧场。我是公共广播网《新闻节目》的吉姆·莱勒。欢迎收看第二场总统候选人辩论，辩论双方是共和党候选人鲍勃·多尔参议员和民主党候选人比尔·克林顿总统。这一活动是由“总统候选人辩论委员会”发起组织的。我们今晚将采用市镇会议的方式。几分钟之后，来自大圣迭戈区的公民们将提出问题。他们是在上星期由盖洛普组织挑选的，大致代表了在政治观点、年龄、性别和其他方面各不相同的选民。其中每个人都说他或她尚未对这场总统角逐做出决定。他们被要求今晚带着问题来到这里。辩论委员会和两党的竞选人员中没有谁知道这是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我们大家都将同时首次听到这些问题。3小时以前，我和这个团体的成员见了面，我们只谈了今晚的活动如何进行。他们分坐在5个区域。每次每区只能提一个问题，下一个新问题将由另一区提出。我将随机指定各区的提问者。对两位候选人的提问将交替进行。

我的职责是保证活动公平进行，并使各个问题尽可能清晰和有所变化。

由竞选双方制订的规则与在哈特福德和圣彼得斯堡进行辩论的规则基本一致。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时间是一分半钟，反驳时间是一分钟，对反驳的回应时间是半分钟。不允许候选人互相直接提问。每人发表各为两分钟的开场致辞和结束致辞。今晚谁先开始是通过抛掷硬币来决定的。

现在我们就从多尔参议员开始，请发表开场致辞。

多尔：非常感谢，吉姆。我非常感谢你，吉姆。让我先告诉你们最新的竞赛消息。勇敢队，一分。红衣主教队，零分。竞赛还在进行之中。

我要对你、并对今晚这儿所有的人表示感谢。我还要特别对我的妻子伊丽莎白和女儿罗宾表示感谢，感谢她们的爱和支持，并对全美国收听、收看辩论的人们表示感谢。

20天之内，你们就将帮助决定由谁来领导美国进入下一个世纪。这是个令人生畏的责任。你们必须问问自己，对候选人有足够的了解吗？你们应尽可能多地了解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

有时候观点会被歪曲。有人花数百万美元来进行负面宣传以歪曲我的观点。但我希望今晚你们会更好地了解鲍勃·多尔是什么人，他想做些什么。

我认为，首先我应当知道，你们心里想着的问题是否是我所理解你们的问题。如果我想到了这些问题，我是否能理解它们。对此我要说的也许只是，我来自一个大家庭。我有许多亲戚，他们都是善良、勤劳、普通的中产阶层美国人。他们居住在全国各地，并不都是共和党人。也许除我之外都不是。

可不管怎么说，我知道我们的问题所在。这些问题，或者是因为一人要负责交税，一人要负责养活全家，因而父母两人都要工作；或者单身父、母亲仅能勉强支付紧迫的账单；或者为你们的孩子能否上最好的学校受教育担心；或者为孩子没有安全的游戏场地，没有无毒品、无犯罪的学校而担心。这些正是这次选举要解决的。今晚我们结束辩论后，你们将有望更好地理解

这一点，收听、收看辩论的观众也将有望更好地理解这一点。

谢谢。（掌声）

莱勒：总统先生请。两分钟。

克林顿：我也想鼓掌喝彩了。谢谢，吉姆。感谢圣迭戈人民给我们这次机会，在能做出决定的人民面前讨论我们都要面对的决定。

我愿再说一遍，我将尽力使这场辩论成为一场对观念和问题的辩论，而不是互相攻击。真正重要的是，当我们处于新世纪、一个有着异常多可能性的时代的边缘时，你们的未来将会怎样，我们的国家将会怎样。

我信奉一种简单的哲学，过去4年里我一直遵循的就是这种哲学：只要是能为所有人创造机会，能加强我们大家的责任，能帮助我们建设一个人人参与、人人都能发挥作用的社区的事，就去做。

与4年前相比，我们的境况显然更好了。我们新增加了1050万个工作，财政赤字也大为减少。10年来收入第一次增长，犯罪率下降，福利名单上的人也在减少。我们在街上多部署了10万名警察。6万名重罪犯、逃犯和偷袭者没能得到手枪。然而，这些进步仅仅是开始。今晚我们真正应予以关注的是为使美国人民充分利用那未来，我们还得做些什么。

我以为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能为建设稳固的家庭做些什么。稳固的家庭需要强大的经济。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我们将继续我们的工作，在保护医疗照顾、医疗补助、教育和环境的同时平衡预算。我们应当进行针对养育孩子、孩子的教育、针对第一次购买住宅和支付医疗保健费用的减税。我们应当保护我们的孩子不受毒品、枪支、帮派和烟草的危害。我们应当使100万人从领福利者的行列转入工作行列。我们应当创造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制度，使每个18岁的孩子都能上大学，并使所有更年少的孩子都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如果我们做了这些工作，我们就能架起那通往21世纪的桥梁。这正是今晚我想讨论的。

谢谢。

莱勒：现在请这个区域的人提第一个问题。由多尔参议员回答。是的，是你，女士。

麦克菲：你好，多尔参议员。

多尔：你好。

麦克菲：我叫香农·麦克菲。作为一名从事早期教育的人，我确实认为孩子们所说的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仍然非常理想主义，他们所说的一切都发自内心。

我为你念一段引自佩吉·加文所编的《如果我是总统》一书中的话。一个六年级的学生写道：“如果我是总统，我会想想亚伯拉罕·林肯和乔治·华盛顿，想想他们为使我国成为伟大的国家所做的一切。我们应当把白人、黑人以及所有有各种文化背景的人们都团结起来。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也应该团结。我们应当走到一起来，想出最好的办法来解决我们国家的经济问题。

我相信，如果我们大家能走到一起来，停止自相争斗，我们的生活将好得多。”

这些是我们传授的观念和道德——这些日子里我们正努力把教给孩子们。然而，我们的政府似乎并不遵循这些观念和道德。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似乎都不遵循这些。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如果你是总统，你将怎样开始推行我们教给孩子们

的观念和道德？

多尔：首先我要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很赞赏你所引用的那位年轻人的话。许多美国人无疑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每天他们似乎都能看到丑闻发生。现在他们能在白宫发现道德问题。他们发现，白宫中有人收集了 900 份联邦调查局的私人档案。没有谁知道是谁雇用了这个人。

因此，人们心中产生了大量愤世嫉俗的情绪。

不管我做什么，我一直都努力使大家走到一起来。约两个月前，在圣迭戈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说时我曾说过，如果你认为共和党是你应该加入的一方的话，出路是明摆着的。如果你心胸狭窄，一意偏执，或者不喜欢美国的某些人，你能走的路也是明摆着的。我站在这儿，决不妥协。因为这是林肯的党。

我认为我们都确实负有责任，尤其是官员。我不再是官员了。今年 6 月 11 日我离开了公共政治生活。但这种责任非常重要。年轻人指望着我们，他们指望我们提供领导。他们在看我们所做、所说、所许诺的和最后做到的是什麼。我觉得这给我提供了某种机会。如果我是美国总统，我将信守诺言。我所说的将成为我要履行的义务。

莱勒：总统先生请。

克林顿：香农，我竞选总统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不仅孩子，许多成年人也有你所说的那种感觉。如果你还记得的话，4 年前不但有不断上升的失业，还有不断增长的大量的愤世嫉俗情绪。我以前从未作为选举产生的官员而在华盛顿工作过。对我来说，大多数争论似乎都是党派性的，共和党，民主党，左翼，右翼，自由派，保守派。这就是为什么今晚我说我要支持机会、责任和社区。而过去 4 年里我们确实取得了一些进步。

在国家处于分裂状态的每一刻，如在俄克拉荷马和在那些教堂被焚烧时，我都尽我所能地将大家团结起来；并提醒人们正因为我们具有多样性，我们才更强大。我们必须学会互相尊重。你提到了华盛顿和林肯。他们都是历史性时期的总统。现在也是个历史性时期。超越党派争论，关注人民及其未来，这很重要。如果我们这样做，而不是因为预算问题上的党派斗争而关掉政府，我们就将成为一个更美好的国家。这也正是我们如今能取得进步的原因。

莱勒：参议员请。

多尔：我再说一遍，将大家团结起来，显然是我们都要肩负的责任。我知道你这样做了。这儿的每一个人都这样做了。有时一个人做了许多没人知道的事。我有一个小小的、为残疾人而设的基金会，叫多尔基金会。我们已筹措了 1000 万美元。我们没有去张扬。我们努力帮助那些身有残疾的人，使他们重新回到生活的主流当中去。因此对我来说，公众信任也是实实在在的。如果成为美国总统，你就拥有了某种公众信任，你得像乔治·华盛顿和亚伯拉罕·林肯那样保持这种公众的信任。今晚总统应该说，他不会宽宥某些人，这些人曾与他共同经商，以后还可能牵累他。

莱勒：好。下一个问题由这一区域提出。中间那位先生。请。

伯克利：我是罗伯特·伯克利大夫，加利福尼亚州福尔布鲁克的心脏病医生。

我希望你对解决我国医疗保健制度问题的计划进行详细具体地解释。

克林顿：好的。首先，让我谈谈我们已经做了的工作。过去 4 年里我们

努力促进竞争以抑制健康保险成本的增长，同时又不损害健康保险质量。你也知道，医疗照顾和医疗补助是由政府支付的，这很重要。

其次，通过医疗补助项目，我们已使 100 万名孩子新加入了享有保险者的行列中。《卡斯鲍姆—肯尼迪法案》规定，如果你改换了工作，或者家中有人生病，都可以使用医疗保险。通过批准这一法案，我们保护了 2500 万人。我们刚规定如果有谁刚生孩子，那么保险公司就不能把她从医院里赶出来。我们已经做了这些，这是个良好的开端。

在以后 4 年里，我想集中精力解决以下问题。第一，通过医疗补助计划再使 100 万名孩子得到医疗保险。

第二，像我们现在所做的那样，继续通过各州进行努力，再使 220 万人加入保险体系。

第三，使失业期在 6 个月之内的人获得保险。这将能保护 300 万个家庭、70 万个孩子。

第四，切实保护医疗照顾和医疗补助项目的完整性，不做任何为降低费用而使成百家医院关闭的事。如果那项削减医疗照顾 2700 亿美元的法案没有被否决而成为法律的话，这种情况就会发生。

多尔：首先我要说，你又来这一套了，总统先生。又在那儿谈论什么医疗照顾的削减。我老是听到你在说这个。我看到你有一次出现在电视上，说“是媒介使我这么做的”。你在为你那并非削减的削减、支出不断增长的削减辩解。支出的增长至少达到 7%，一直如此。你曾公开说过，目前其增速比通货膨胀率高 3 倍。我们应当把它减至通货膨胀率的两倍，那才符合我们现在的情况。所以，别再谈什么削减医疗照顾。在我的经济计划中，我们将把它增加 39%。别忘了他试图怎样来对付健康保险问题。增加了 17 种新税，花了 1.5 万亿美元，增设了 50 个新官僚机构。是不是令人难以置信？你本来有可能成不了医生，因为他要推行配额。你已经是心脏病医生，这不会影响你了。但 10 年后如果有谁想成为心脏病医生，他就得弄清是不是得遵守一个极端的医疗计划中的某些规定了，它是这届政府替所有美国人制定的。我们能做些像《卡斯鲍姆法案》这样的工作。我倡议修改了许多条款，考虑到了已经存在的各种情况，为你们提供了便利。我们还能做些别的事。我们还需要使大约 2000 万成人和大量的孩子得到医疗保险。

克林顿：我无法在 30 秒内把这些都说清。我只想指出，美国医院协会说我所否决的那个预算案本来可能导致 700 家医院关门。这不是我说的。就人均而言，这个预算案确实能把医疗费用的增速减到通货膨胀率以下。但重要的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做什么？是要让更多的孩子享有保险，提供更多的预防性保健。我的平衡预算案包括了为女士提供乳房 X 光照片，顾及到了享受医疗照顾的妇女，并对某个成员患有老年性痴呆病的成百万家庭提供“减轻痛苦的保健”。这些费用的支付都由一个平衡预算案来负责。这能使我们取得进展。

莱勒：下一个问题由多尔参议员回答，由这位提出。

米利根：多尔参议员、我叫贾森·米利根，是现役军人，也是小企业所有者。我的问题是：在消除军队和平民之间的薪金待遇的巨大差别方面，你采取什么立场？

多尔：贾森，我自己也曾是一名军人，我非常赞赏你提出的问题。要知道，如今有 17000 名穿美国军服的男女军人领取食品券。这不应该在美国发

生。有的男女军人的住房低于标准。这也不应该在美国发生。现在是考虑薪金待遇差别的时候了。

军人的薪金今年确实上升了 3%，但如果我们要求年轻人在全世界保护、捍卫我们的话，这是不够的。何况这届政府进行的海外军事部署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它向外派出部队达 50 次之多，每一次都需要冒险。要知道，某一个人会因此而冒险，这个人也许是你的儿子，也许是别的什么人。当然，我认为每一位军人都是伟大的美国人。

还记得越南吗？还记得过去人们常常宁愿躲到街道另一边去、也不愿与在越南呆过的人打交道的时候吗？现在这都过去了，它应该过去。那场被遗忘的战争即朝鲜战争，也应如此。但我想我能非常坦白地回答你，贾森。为你正在做的工作，我要向你表示感谢。美国应该向你表示感谢。

克林顿，我能问你个问题吗？你在哪儿服役？

米利根：我在美国海军服役，先生。

克林顿：你拥有的小企业是哪一种？

米利根：我有一家 AMWAY 公司。

克林顿：干得好。既然多尔参议员提到这一点，我想谈一下。我刚刚签署了一个法案，我们已使它在国会得到通过。它尽可能增加了对军人薪金的提高额度，并确保今年军人薪金的增长高于通货膨胀率。

我还向国会提出了一整套庞大的生活质量改善计划，他们已经接受。这很重要。我花了许多时间与世界及美国各基地的军人和军人家属交谈。通过交谈，我确信我们不仅需要提高他们的工资，也需要对孩子的照顾、住房以及其他方面更多地投资，以对其家庭提供支持，尤其是在军队规模缩减、海外部署时间延长的情况下。因此，我们要做得更好，我们也将做得更好。但我认为这是所有美国人都应分担的义务，不论他属于哪个党派。

多尔：我对总统所说的没有什么异议，除了不满意他等了 4 年才做这些事之外。我认为这是应该第一天就做的事。他应在第一天做。在多尔—肯普政府中，我们将在第一天做这件事。这很重要。我们现在只有 10 个师了，过去我们一般有 18 个师。我们曾有 25 个空军战斗飞行联队，现已减至 13 个。我们曾有 536 艘战舰，现已减至 336 艘。我的意思是，我们的问题首先是把国防支出削减得太多。

1992 年总统对你们说他将削减国防支出 670 亿美元，可他削减了 1120 亿美元。因此，现在我们已处于危险的边缘。我们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使那些军人去牺牲。

莱勒：下一个问题由克林顿总统回答。这儿前排那位女士请。

凯莉：克林顿总统，我叫塞西莉·凯莉。

昨天，雅西尔·阿拉法特在巴勒斯坦说，他认为在中东取得成功的关键是美国承担责任。作为总统，你是否会将美国部队派到以色列或西岸地区去维持和平？

克林顿：请让我用两秒钟来回答一下刚才谈及的一件事，因为我是军队总司令。我建议此后几年在国防方面支出 1.6 万亿美元，在这方面，我的预算案与共和党的预算案规定的数额相差还不到 1%。

现在我们来谈中东问题。你也知道，我在大力推动中东和平。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协议是在白宫签署的，另一个协议——与约旦达成的和平条约，我到约旦去推动过它——也将实现。但我认为美国可以做任何我们

能合理做到的事。

我可以这样说：我不相信雅西尔·阿拉法特希望我们派部队去西岸。从没有人要求我们派部队去西岸。我见到了拉宾总理和雅西尔·阿拉法特签署的关于西岸的协议。他们要签署的不同的地图有 26 幅，关于谁应在西岸做什么的规定有好几千条。我相信，如果各方愿意走到一起来，以真诚的态度达成协议，那么即使我们不能在中东强制实现和平，他们自己也能实现它。

美国的职责是将和平的风险减至最小，这也是我的立场。如果他们要求我们成为某种监督力量的一部分——像 1978 年以后我们在西奈监督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和平那样的话，坦率地说，我得考虑考虑。我得看看他们要做什么，但我并不相信他们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我认为阿拉法特先生要我们做的，是确保各方信守已达成的协议，这就是为什么几天前我要把几位领导人请到华盛顿来。我认为他们将，我们都将会成功。别太灰心。

多尔：贾森，让我回过头来再和你谈一分钟，因为在国防预算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别。今年的预算是 70 亿美元（原文如此——译注）。而我们的预算比总统的多 100 亿美元。他把钱都放在他任期以外去花，即使他重新当选，到他离任之时也不会做任何事，什么事也不会发生。而我们现在并不现代化。

如果我们不能在加利福尼亚制造更多的 B—2 轰炸机——加利福尼亚已经丧失了 50 万个工作，那都是因为这场灾难，这些巨大的削减。我们没有得到总统许诺要进行的那种削减，他把削减额翻了一倍。

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回顾一下。我们正合理地增加国防开支——并不太多，但我们增加了一些——因为我们希望万一这儿有谁被征召时，我们已做好准备，贾森。

我没有听到雅西尔·阿拉法特所说的话，但我不愿说什么——对外交政策，我希望慎重对待。在这儿我不想就某些正在进行的外交事务与总统展开讨论。我希望总统做的，我想他也许已经做了，是他在最近的一个声明中所说的，号召无条件停止暴力冲突，让各方按他们应该做的那样持续讨论，并形成决议。

我们最不愿做的事是到处部署力量。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应避免在这个问题上玩政治，因为现在它仍岌岌可危。

克林顿：当以色列政府变更时，以色列人民说的是他们不愿放弃和平进程，他们需要更多的安全。后来产生了大量的互相不信任情绪。许多事或许本是不应该发生的。

我请雅西尔·阿拉法特和内坦尼亚胡总理到华盛顿，并使他们坐到一起来，他们单独讨论了 3 个小时。我确信他们需要实现和平的机会。我要再次说明的是，如果他们要求我们起某种合理的作用，我不知道我会如何反应。这将完全取决于他们要我们做什么。但关键在于他们遵守已达成的协议，并设法建立起相互信任。他们得为此花些时间，彼此信任。

拉宾总理相信信任能够实现，他为此献出了生命。我仍然认为，这是可以实现的。

莱勒：好，下一个问题由这个区域提出，由多尔参议员回答。后排后面那位先生。是的，先生，请。

德尔加多：多尔参议员，我是奥斯卡·德尔加多，一个有 30 年烟龄的吸烟者。大约 30 年前，我一天得抽一包多香烟。

你发表过一个声明——以前某个时候你曾说过，你认为尼古丁不会使人上瘾。你是否介意——你是否仍坚持这样认为、或者愿意撤回它、或者做些解释？

多尔：哦，这很简单。我在国会的有关记录可追溯到 1965 年，那时我们就是否应对香烟稍加注意进行了第一次投票。它们可能是危险的——从那以后，我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始终如一。实际上，1992 年我们讨论过一个法案，它要求所有各州都得遵守有关规定，否则它们将失去某些拨款。我们把它送交克林顿政府去实施；他们拖了 3 年半。就在这期间，每天都有大约 3000 名青少年开始吸烟。你把这些数字加起来看看，那将是大约 300 万人。

直到 1996 年才又说起这个话题——我不想让任何人吸烟。我的兄弟的死大概部分应归因于香烟。你问的是一个技术性问题：香烟会使人上瘾吗？它们也许会。我不知道。我不是医生。你不应该吸烟。你应该庆幸你戒掉了，奥斯卡，30 年啊。

对我来说，我们需要做的似乎不仅是要讨论香烟，更要讨论毒品。因为在这届政府过去的 44 个月中，12—17 岁的吸毒者的数量增加了两倍。吸大麻的人增加了 141%。吸可卡因的人增加了 160%。他们是你们的孩子。这都发生在这届政府任内，因为它削减了资金，减少了抑制毒品的力量。

如果我成为美国总统，我们将使用国民警卫队和一切必要的力量来阻止某些毒品流入美国。如果阻止了毒品的流入，就不会有人吸毒。不要吸烟，不要喝酒，不要吸毒。别干这些事。

克林顿：奥斯卡，多尔参议员与我之间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在限制年轻人得到香烟的途径方面联邦政府应做些什么的问题。事实上，我成为总统 6 个月后，我们据他刚才提及的那部法律提出了一项管制方案。它简单明了地规定所有各州——它规定孩子吸烟是非法的。如果各州想继续得到联邦资金的话，就必须在这方面做出重大努力。

然而，我们得到的只是评论，总是如此。他们对我们应怎样做发表了成千上万的评论，正是这使它被拖延下来。与此同时，也是在 1993 年，我们开始调查香烟使人上瘾的程度是否足以使联邦食品与药物管理局采取行动，禁止烟草公司对我们的孩子做其产品的广告及针对孩子经营和销售其产品。

以前从没有哪位总统采取行动来对付这个院外集团。我这样做了。多尔参议员反对我这样做。他出面对他的支持者发表演讲，说我做了件错事。而我认为我这样做是正确的。

至于毒品，我曾反复说过，吸毒是错误的、非法的，它能夺去你的生命。我们加强了执法，圣迭戈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加强了边境控制。我们还采取大量的其他措施。我希望有机会谈谈这些。

多尔：总统先生，如果住在圣迭戈就会知道，倘若有人携带 125 磅或这个数目以下的大麻并被捕，他仍可以回到墨西哥去。他不会被起诉。美国司法部把他们送回家去了。我认为这很重要。这些大麻数量很大，是一个重要来源。奥斯卡，你可别吸上这个。

在这个选举年，总统觉得他应该做些什么了：我没在毒品问题上采取任何措施，44 个月来我在这个问题上失职了；我们来对付香烟吧。你看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什么也没做过。他们没有说要做什么，是不是打算宣布它会使人上瘾。一旦它成为毒品，有关措施是只适用于少年人还是所有美国人？谁都不应该吸烟，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年轻人尤其不应该吸烟。我的历史

记录摆在那儿。1965 年以来我为此投过 8 次、10 次票。

莱勒：下一个问题由克林顿总统回答。由这儿提出。先生，请。

弗莱克：克林顿总统，我叫杰克·弗莱克，是退役飞行员。

先生，据官方预测，我们每年的医疗照顾和社会安全计划赤字在下世纪将以万亿美元计。从不同的人那儿你会听到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社会安全计划将会破产，有人认为不会。我觉得这极不公平，尤其是对那些正对这个制度失去信心的年轻一代人来说。我的问题是，假使你也认为我们的福利制度已处于难以为继的境地，你将提出什么样的具体改革措施？

克林顿：首先要指出的是，你说的是两件不同的事。就财政稳定性而言，社会安全计划和医疗照顾的情况完全不同。让我们分别来谈。

在如你所说的下世纪至少 30 年之内，社会安全计划是稳定的。但我们更愿意要一个能延续大约 70 年而不是 30 年的社会安全计划基金。我们必须做的，只是对它进行一些调整。要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像我这样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的数目，比正好生在我们之前和我们之后的人的数目都更大。我认为简单地说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在 1983 年所做的，当时多尔参议员也参与了。我认为当他服务于社会安全计划委员会时，他做这项工作做得很好。他们对社会安全计划做些温和的变革，以确保它在 21 世纪能继续存在并保持良好状态。我们也将这样做。显然，有些事是必须做的，而可以进行选择有 50 或 60 种。一个两党委员会将使这个问题超越党派政治，它能提出有关建议从而为人们提供支持。

医疗照顾就不同了。它现在就需要帮助。我提出的预算案将使医疗照顾信托基金的寿命增加 10 年。这比此前多年的许多时间里它所得到的都多。通过对此进行更多的管理，大量的资金可以节省下来。但应提供更多的选择，更多的预防性保健，降低通货膨胀率，降低我们支付给供应商的价格。不要我所否决的那个预算案将带来的保险费和实际成本的大量增加。这样我们就能够得到 10 年的时间，像解决社会安全计划问题那样解决医疗照顾问题。我们应组成一个两党团体来考虑一下，当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入退休时，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来挽救医疗照顾。但现在我们能够、也应该通过我的预算案使它延长 10 年，从而让大家都不必为此担忧。

多尔：如果你考虑的是未来的话，我想可以这么说——我们将能够解决问题。这是个政治年，总统在就医疗照顾问题玩政治。今年过后，我们就能像 1983 年解决社会安全计划问题那样解决它。当时那是个非党派的委员会。罗纳德·里根会集了蒂普·奥尼尔和霍华德·贝克尔，两个共和党人，一个民主党人，来就此进行工作。他们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我参加了。我们解决了问题，挽救了社会安全计划。我们建议——我想这大概是一年前了——对医疗照顾也采取同样的措施，然而白宫却称之为政治把戏。

上星期，我想是唐娜·沙拉拉说的，他说我们将把医疗照顾削减 1000 亿美元，并任命一个委员会。大概是得有一个委员会来做这件事。别在这个问题上玩政治。我想，如果我是一个年长的公民，我会对所有这些恐吓老年人、恐吓退伍军人及就教育问题恐吓学生的宣传感到厌烦。如果你没有什么思想，你就没有什么议程，你所拥有的就只有恐惧，你只能靠它了。多尔——肯普一方有思想，我们将挽救医疗照顾，就像我们挽救社会安全计划一样。

克林顿：他们的思想就是今年我国最穷的老年人应该付出更多。他们的思想就是那个美国医院协会所说的将导致 700 家医院关闭的预算案。他们的

思想就是我所否决的那个使每个人的实际支出增加的预算案。我并不是在选举年才提出医疗照顾问题的，先生。1995年初我就对他们说过。多尔参议员说，30年前他是投票反对医疗照顾的12个人之一，他为此感到自豪。一年前他还说：“那时我是对的。那不会有什么作用。”美国的老年人如今有最长的预期寿命。我们必须对它进行改革而不是破坏。

莱勒：下一个问题由这儿提出，由多尔参议员回答。这儿这位女士，请。

冈萨雷斯：多尔参议员，我叫苏珊·冈萨雷斯。我想知道，在改革福利制度方面你将采取的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

多尔：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这反复了三次。前两次我们把福利改革方案送交总统后，他都予以否决。第三次，他签署了，但宣布明年他就会改变它。副总统说，他们还打算使用我从来就不能理解的单项否决权来对此采取别的措施。我们需要做的，是保证我们所做的努力是让人们回到工作中去。现在站在这儿的我很久以前是堪萨斯州拉塞尔县的福利律师，我们的工作之一是每月审查福利支票并签署它们。这些支票中有3张是我祖父的。因此我知道不得不直面福利制度是什么滋味。

显然会有些人需要帮助。这是美国。你应该享有食物，你应该享有健康保险。这是美国。但与此同时，如果愿摆脱医疗照顾，回到社会主流中去，我们也将提供工作。我们会告诉你，你有5年期限，在此期间你将享有福利。你有两年时间去找工作。我们在一个法案中为儿童日托提供了更多的资金。这一法案由参议院通过后被总统否决，后来它又被提出，总统才签署了内容几乎一样的法案。

但这是个重要问题。我认为不应该对非法移民提供福利——紧急情况除外。这使某些州如加利福尼亚负担沉重。加州纳税人每年得为此花费30亿美元。

莱勒：该克林顿总统了。

多尔：那我就别碍事了。

克林顿：对非法移民来说，获取福利是非法的。好几年前就已经这样规定了，现在还是这样。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肚界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从1980年我就开始致力于福利制度改革，因为看到人们陷于这样一种使他们实际上孤立，使他们的孩子更易于陷入困境的制度，我感到不安。所以，在我任州长的很长时间里，我就已经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在我成为总统后，我用法律赋予的权力摆脱了某些联邦管制规定，帮助各州使人们获得工作。我们已把领福利的人减少了200万。现在，我有一个新的福利改革计划，将与私营部门合作，对雇用离开领福利者行列的人的雇主在税收上予以特殊的鼓励。另外，还努力在私营部门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至少100万个，使更多的人不再领福利而去工作。这很重要。我希望有机会更多地谈谈这些。没有什么问题比这更重要。

我还记得，10年前我遇见过一位女士，她说她想摆脱福利，以便在别人问“你妈妈干什么工作”时，她的孩子能给予回答。我又遇见了那位女士。她有4个孩子。其中一个有很好的工作；一个正在学习，准备当医生；另一个正在上技校；还有一个上高中，是一名优秀学生。我希望使更多的人能像这位莉莉·哈登女士一样。所以我制订了计划来做这件事。这仅仅是开端。

多尔：我们能做另外一件事。我们来谈谈增长。我们有一个宏伟的经济计划，我希望以后能谈谈它。普遍减税，以及针对孩子的减税，对18岁以下

的孩子每人提供 500 美元。削减资本收益税。为领和不领福利的人们创造更多的工作和机会。我们还有些别的规定。减少官司。出庭律师是总统的大支持者。他们当然喜欢诉讼。每次他们想否决某个法案时，总统都帮他们这么做。要知道，在美国我们必须有增长，要在私营部门创造更多的工作、更多的机会。

那些人离开了领福利者的行列，总统把这一功劳归于己身。可这是各州州长做的事，并不是联邦政府政府。政府也没有创造出工作机会，这些工作机会都是私营部门创造的。

莱勒：这个区域有人提问题吗？好的，女士。后排那位。这由总统回答。

约翰逊：总统先生，我叫帕梅拉·约翰逊，是土地所有者。我的问题是，你的党是否有削减资本收益税，尤其是未来的对退休的美国人减税的计划？

克林顿：首先，我们有一个庞大的计划，在人们出售住宅时削减其资本收益税。我的税收方案中的一部分内容，是要在人们出售住宅时免除达 50 万美元的收益税。我认为这是我们能给大多数普通美国人的最大的资本收益税优惠了。而这将在我的平衡预算计划中得到补偿。如今对投资于新的小企业、并已有 5 年以上的人，我们也有资本收益税上的优惠。这是我们另外的经济计划中的内容。我认为，这些对美国建设更强大的经济、更好的税收制度大有帮助。

不过我觉得，需要强调的最重要的事，是我们还需要以其他方式来帮助人们建设强大的经济，而我们不能进行任何没有补偿的减税。

多尔参议员和我之间的重大差别之一，是我现在告诉了你们，我将怎样把所倡议减免的每一分税收补偿回来。我们努力减少赤字，这有助于从事房地产业的人们，因为利率更低了。拥有住宅的人达到了 15 年来的最高点。我们使这个国家向正确的方向前进。我们可以减税，但我优先考虑的，是帮助那些需要它来抚养孩子，支付教育费用，以及首次购买住宅和需要它帮助来支付健康保险费的家庭。对你来说，在首次购买住宅时提供帮助，免除出售住宅的资本收益税是你所问及的最重要的部分。谢谢，帕梅拉。

莱勒：多尔参议员请。

多尔：帕姆，总统先生没有告诉你，他所有的减税都在 2000 年截止，但税收增长却是永远的。自由派的方法就是这样。你也知道。先给减一点儿税，减几年，然后使税收永远增长。他的计划导致的税收净增长大约是 600 至 800 亿美元。而在多尔-肯普经济计划中，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征收这种税，除非你的住宅价值超过 50 万美元。如果是的话，我也很高兴，向你表示祝贺。这是个好主意。他们发现了，捡去塞进了他们的计划。但那只是暂时的。我们的才是永久的。我们的计划是一个好计划。它能创造工作和机会。资本收益税率削减了一半，从 28% 减至 14%。

美国有 7 万亿美元资产被闲置。每天都有人对我说，如果我们削减资本收益税将会如何。我有一封来自一个堪萨斯的前选民的信。他在信中说他想出售在加利福尼亚的财产，投入他在堪萨斯的企业，但他不能，因为资本收益税太高。

我们要让经济运转起来。那将有助于社会安全计划。那将创造更多的工作。那将帮助那些想摆脱福利的人们。这才是美国方式。

克林顿：多尔参议员离开参议院之前，他和金里奇先生也建议，我们只有在能够得到补偿的情况下才能减税。我们都认为减税将是永久性的。但我

们需要证明能够补偿它们。在他离开参议院后，我们就放弃了这个计划。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专家说这个税收方案将在赤字方面捅漏子，抬高利率，削弱经济。而虚弱的经济将抵消减税所带来的所有好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平衡预算。我会告诉你们我将怎样一项一项兑现我所有的承诺。你们应该对我俩抱有同样的期望。

莱勒：好。下一个问题由多尔参议员回答。那边那位女士，请。

诺丹：我叫梅利莎·诺丹，是圣迭戈加州大学三年级学生。我想说我很荣幸，能代表美国的年轻人发言。

我的意见、我的问题与你有关，多尔先生。我想谈谈那些有关你的年龄的争论。你认为你能对今天和未来美国年轻人的看法做出反应吗？

多尔：嗯，我认为年龄很——你也知道，智慧来自年龄、经验和智力。如果你拥有其中一些因素的话——我拥有年龄、一些经验和一些智力——而这些加起来就成了智慧。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力量，是一个优势。有许多年轻人在我的办公室工作，为我的竞选活动工作。这就是美国。早些时候有人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团结一致。只有一个美国，我们属于同一个国家。我关注经济计划，因为我关心年轻人的未来。我关注毒品问题。总统在这方面疏忽职守已经4年。我关注犯罪。如今犯罪率下降，他会归功于自己。但这是因为市长、州长们以及其他人士抑制了犯罪。纽约市长鲁迪·朱利亚尼仅在纽约就使犯罪率下降了25%。当然，总统会对此居功。

我的观点是，我们要做的是寻找工作、机会和提供教育。就学生贷款而言，今年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已使它在以后6年里从240亿美元上升到360亿美元，增长了50%。这是最高额的拨款。我们为佩尔奖学金拨款6亿美元。这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还提高了每一笔佩尔奖学金的金额。我们的经济计划中针对孩子的500美元减税能用在孩子身上，它年复一年地滚动增长。你当然还没到这个年龄。但如果有一个两岁的孩子，到这个孩子准备上大学时，7%的利率已使这笔钱达到大约18000美元。

克林顿：我只能对你说，我并不认为多尔参议员年龄太大而不能当总统。我心存疑虑的是他思想观念的年龄。你的年纪不大，恐怕不记得了。但以前就有人这么试过、在选举年对人们许诺进行得不到补偿的减税。

多尔：你上次竞选时就试过。

克林顿：告诉他你能把握自己。你听到他说国会刚投票决定增加学生贷款和奖学金了吧。这是他走后才做的。他领导制订的上一个预算案规定削减佩尔奖学金，削减学生贷款。他们为此而使政府关门，我仍否决了它。

我的计划将根据典型的社区学院学费标准，对学生的有关费用进行一美元对一美元的减税。每年就大学学费减税每人1万美元。我们让家庭在个人退休金帐户中储蓄教育费用，支付时免税，而且这些都可得到补偿。我整个任职期间都在致力于你们的未来。这事关你们的21世纪的前景问题。我希望你们会考虑其中包含着的思想。谢谢。

多尔：如果一个人自己没有什么思想，我想他就会说其他人的思想陈旧。正像我早先说过的，他们没有什么思想。他们的思想是增税，花更多的钱。这就是自由派的哲学。如果那是你们喜欢的，那你们就得到了一个极佳的候选人。克林顿总统1992年到过加利福尼亚。他说他的第一个4年的中心主题是为中产阶级减税。如果现在你们都得到那减税了，那就祝贺你们。因为你们得到的是大幅度增税。你们得到的是增加税收2650亿美元。他站在那儿说

做这种许诺的政客应该被抛弃，而他就做过这种许诺。我信守诺言，你们将得到减税。在此后的几年中，不管你做什么，它都会有所帮助。谢谢。

莱勒：下一个问题由克林顿总统回答。这儿——是的，女士，请。

桑德斯：你好。我叫特蕾西亚·桑德斯。我的问题是，你是否认为美国已足够成熟、有足够的自知之明，以至于可以完全取消“肯定性行动”项目了？

克林顿，不，女士，我不这样认为。我反对配额。我反对给任何人以任何他们没有资格得到的特惠。但因为我们相信，某些歧视仍然存在，不是每个人有机会证实他们有能力，所以我支持那些正确的“肯定性行动”。我采取了更多的措施来清除我认为不公平的“肯定性行动”计划，并比我的前任更多地加强了对其他项目的限制，因为“肯定性行动”已经太滥。但我也努力给人们以机会，让他们证实他们有能力。我可以提供一些例证。我们已把给小企业管理局的贷款增加了两倍，对开办企业的妇女的贷款增加了3倍。这其中没有一个是合格的，每个人都必须达到标准。我上任以来，我们已在军中对妇女开放了26万个新工作职位。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指出，我们比以前更强大、更自信、更稳固了。我再提供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看法。对我来说，“肯定性行动”意味着一种特别的努力。这有点像多尔参议员倡议通过《美国残疾人法》时所做的，以及他对某些商店所说的：你们得让坐轮椅的人也能进来。除了给人们提供证明自己合格的机会、以及证明他们能做到的机会而外，我们不对任何事、任何人提供保证。

这就是为什么我得说，我同意科林·鲍威尔将军所说的：我们还没到那个程度。我们应该继续进行那些特别的努力即“肯定性行动”项目，继续执行我国的有关法律和政策。莱勒：多尔参议员请。

多尔：我们也许还没到那个程度，但如果给特权、给配额的话，我们就无法达到。一段时间里我曾支持过这种政策。这就又回到经验问题上来了。你得有一些经验、年龄和智力。我注意到，没有谁真正得到好处——除了高层的一小撮人而外。普通人并没有得到好处。得到好处的是有钱人、有各种工作的人。在我看来，我们似乎应该支持加利福尼亚的民权倡议。它不应以性别、种族或肤色为基础，也不应以是否残疾为准。我有残疾，但不应该有特权。我倒是愿在这场角逐中得到某些特权，但我没有。也许能给我一个。我的肺部有10个阴影点呢。

这就是美国。没有歧视。歧视应受到惩罚。但应有公平的机会。我们应努力确保大家都有参与的机会。机会公平。但在美国我们不应保证结果也一样。这可不是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的原因。

克林顿：我从未支持过配额。我一直反对它。我不支持结果也一样。但我确实支持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证明自己是有力量的。我之所以反对那个倡议，是因为我担心这将导致那些进行特别努力的项目的结束。我要再说一遍，想想《美国残疾人法》。做出努力，建设一些坡道，使坐轮椅的人也能上去。你不能保证他们都能得到工作，但你可以保证让他们有机会证明自己可行。

正如我说过的，对我来说这并不是党派性的问题。科林·鲍威尔说过同样的话。他担心这一倡议会结束特别努力项目。对不合格的人不能给特惠，不应有配额，但不要放弃进行特别的努力，直到你能保证每个人都有机会证明自己是合格的。

莱勒：好。下一个问题由多尔参议员回答。由这个区域的那位先生提出。

后排那位穿蓝衬衫的先生，请。

戴维：我叫蒂姆·戴维，是个机械工程师。多尔参议员，你将怎样减税并平衡预算？

多尔：很高兴你问到这一点。你的名字是？

戴维：蒂姆。

多尔：首先我想说，总统并未把有关配额的情况都告诉你们。因为司法部在新泽西州提起了我们称之为皮斯卡特威案的诉讼案。那很显然是一个有关配额的案例。一个教师是白人，一个教师是黑人，两人都同样合格，你知道他们会决定让谁留下来。不应该如此。

总统会说，他要修补它但不是结束它。有 168 个联邦项目允许配额存在，他只停了一个。

现在来谈我们的经济计划。蒂姆，很高兴你问到它。因为，你看起来像是那种可能从 15% 的普遍减税和每个孩子 500 美元的税收优惠中得到好处的人。或者——房地产税减免，这你现在可能还不感兴趣，但还有资本收益税的削减。如果你要照看年老的父母，每位可减税 1000 美元。我们认为这很重要，因为许多人照看他们的父母。

我们怎么补偿减税呢？可以通过宪法修正案来平衡预算。总统反对，使它没成功。他强迫 6 名民主党人投票支持他，结果该法案以一票之差失败。

我们将平衡预算。此后到 2000 年的 6 年里，总统想增加支出 20%，我只想增加 14%，那 6% 还给人民。

记住，那是你们的钱，不是他的，也不是我的。是你们的。你们不应为想尽可能多地留住自己的钱而抱歉。但他应为想拿得越来越多而道歉。他要给你们的那种政府的减税实际上毫无意义。

克林顿：在我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来的责任之一，似乎是能告诉人们一些他们可能不愿意听的东西，因为它是正确的。他们有一个 2500 亿美元的税收方案，其规模是另一个的一半。另一个达 5500 亿美元。他们通过了这个预算案。通过削减医疗照顾，有史以来第一次削减教育费用，削减环保执法费用 25%，取消对疗养所质量标准的保证，取消对残疾人健康保险的保证，他们得到了 2700 亿美元。

你可以不信我的话。《经济学家》杂志对许多经济学家进行了调查，其中 7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说，如果这一税收方案通过的话，那将需要对环境、执法和教育方面的开支进行大量的削减，削减 40%。

由此导致的对医疗照顾的削减，将比我上次否决的那个预算案能导致的更多。我的目标限定的减税是针对抚养孩子、首次购买住宅、支付医疗保健费用的。它能得到补偿，我会告诉你们我将怎样补偿它。他不会告诉你们，因为他做不到。

多尔：总统先生，你那目标限定的减税从未惠及任何人。这才是问题所在。没有人得到过。我必须指出，对你用“方案”这个词，我有些不快。你前一次就这么说过，你说它是个“冒险的方案”。副总统戈尔在圣彼得斯堡又重复了大约 10 次。

如果我有点政治资本的话，那就是我的诺言。我将信守我对美国人民许下的诺言。我们将减税并平衡预算。我们不会碰医疗照顾。它将增长 39%，社会安全计划将增长 34%。

总统自己没有什么思想，所以他就攻击我们的主张。我们的方案不会在

赤字方面捅漏子。1992 他就许诺要给你们减税，如果你们得到了的话，你们就投他的票好了。

莱勒：下一个问题由总统回答。那边那位先生，请。

伯恩斯：我叫杜安·伯恩斯，是个技击教员，也是位父

总统先生，你能否大致阐述一下你扩大《家庭和医疗休假法》的计划？

克林顿：谢谢。首先，我想说的是，我签署了《家庭和医疗休假法》。这是我签署的第一个法案。我对此感到非常自豪，因为它象征着我认为我们应该做的事。美国发生的好事不能都归功于我，但我和其他人一道努力使这些好事得以发生，我要为此而居功。

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好事应在家庭发生。就我所知，大概每个家庭关心的都主要是怎样才能在工作中取得成功的同时，又能顾及孩子。

在不失去工作的前提下，《家庭和医疗休假法》为 1200 万个家庭提供了时间，使他们在生孩子或家中有人生病时能休假。我希望它能在两个方面得到扩展。就是说，你可以在不失去工作的情况下获得一点休假时间，参加定期的教师一家长会议，或是陪家人定期约见医生。

我还希望看到有关加班的法律能得到改变，以使工人有更多灵活的时间可以自由处理。而且，如果以加班换来了额外的时间，他可以决定何时使用这些时间，可折成现金，也可用于与家人在一起，如果有家庭问题的话。

不管走到哪儿，我似乎都能遇到《家庭和医疗休假法》的受益者。在得克萨斯的朗维尤，我遇到了一位几乎为此落泪的女士。因为她保住了工作，又能花时间陪伴身患癌症的丈夫。今天和我一起来这儿的人当中有人在机场碰见一位女士，她说由于有了《家庭和医疗休假法》，她的儿子杰斯在她的孩子出生时能在旁相伴。所以，我确实认为它应该扩展。我们必须帮助人们在家庭和工作方面都取得成功。

多尔：88%的人——总统声称此法已涉及 1100 万人，然而只有 5%——记住，只有 5%的雇员受到《家庭和医疗休假法》的影响。我们有更好的主意。我们没能成功，但我们有更好的主意。如今我们已是多数党，也会有一位总统。我们将对雇主提供赋税优惠。用不着联邦政府来管，我们提供赋税优惠。这补偿了某些成本，因为如果你要雇人替工的话，就会有成本问题。这才是应当采用的方法，它把权力还给各州、还给人民、还给纳税人。不应总让联邦政府把手伸那么长。

但请记住，这个法案只涉及 5%的雇主，还有 95%的雇主和他们所有的雇员都没被包括进去。据我前几天才看到的《投资者日报》说，他声称因此而受惠的人当中 88%本已享受到了集体谈判协议和其他协议的权利。

我可以肯定，我们的办公室中有人享有家庭休假。我的朋友米切尔参议员就享受过家庭休假。我每天都和人们一起工作。我在医院呆的时间很长。我知道在医院是什么滋味。我们当然想要家庭休假，但可以有更好的办法来实现它。

克林顿：我只有 30 秒钟时间，来不及把这些统计数字都说清。这个法案包括了大多数工人。年龄不满 50 岁的雇员可免受此法约束。该法案原来包括了所有 25 岁以上的雇员，但由于有人反对，提高到 50 岁。多尔参议员是领头反对的。他阻挠了它的通过。他说这是错误的，会对经济造成损害。

我们的新建的小企业数创下了历史纪录，并且有 1050 万个新工作。这并没有损害经济。他仍认为这是错误的。我相信这是正确的。你们可以决定我

们俩谁对谁错，这取决于你们。

莱勒：下一个问题是对多尔参议员的。是你，女士。吉诺蒂：你好。我叫布里奇特·吉诺蒂，来自卡尔斯巴德，是一位妻子，有两个孩子。

多尔参议员，我要向你提的问题是，作为一名圣迭戈企业主的妻子，我发现美国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制造出足够多的美国自己的产品。你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多尔：好。我们已损失了 35.7 万个制造业的工作。今天，劳工统计局还说，他们可能弄错了。这一数字可能要大得多。我们还在这儿讨论什么新工作。我们最好等等，看结果如何。我们要用更富进取性的贸易政策和一揽子经济计划来实现它。我们要通过管制方面的改革来实现它。

要知道，管制每年要耗费一个普通家庭大约 7000 美元，不管你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7000 美元，和征税一样。这使许多人无事可做。

大约 7 个星期之前，我在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遇到了一位女士。她曾有一家小企业，有 63 名雇员。她最终放弃了这家企业。为什么呢？就因为文牍和管制。国会通过了一个《减少文牍法》。但总统使制造了四分之三的文牍的国内税收署免受此法约束。我们将进行管制的改革——我们还将进行诉讼改革。

你们知道，就在加利福尼亚的奇科，我从讲台上掉了下来。有几秒钟时间仰面朝天地倒下，就在我摔到地上之前，我的移动电话响了起来，一位出庭律师在电话中说，我想我们有一场官司可打了。（笑声）

我们得制止某些毫无价值的讼事。这使人们干不成正事，大家都干不成。让经济运转起来，削减资本收益税，为美国的每一个人创造更多的工作和机会，这才是我们要做的。我的话是可靠的，我信守诺言。我不会在选举后背弃诺言，也不会再在选举年进行新的许诺。我们将付诸行动。我们得使美国的工作机会增加，因为我们需要它——而他们的政策是错误的。

克林顿：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在我成为总统之前的 12 年，我们丧失了大量的制造业的工作。而自我成为总统以来，我们得到了大量的制造业工作。我们谈判达成了 200 多项贸易协议。

让我们看看加利福尼亚的情况吧。在加利福尼亚，我们第一次制造了价值 370 亿美元的供出口的电信设备。我们在日本销售各种商品，从电话、CD 到大米。如今我们正在日本销售汽车。

我参观过日本的一家克莱斯勒销售公司。自 70 年代以来，我们第一次重新成为全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和销售国。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强硬的、进取性的贸易政策，因为我们降低了利率。我们有良好的、稳定的经济政策。

还因为我们连续 4 年减少赤字，这是 20 世纪以来头一回。我整个 4 年任期中都致力于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看到赤字因一个我们无法补偿的税收方案而大大恶化，那样的话你们的利率就会上升；你们从减税中得到的所谓好处将因更高的利率而丧失。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致力于拓展市场。

1050 万个新工作中一半以上是在高工资地区，我们将在全世界进行更多的制造和销售。

多尔：你也许认为美国最大的雇主是通用汽车公司，可我有些新消息要告诉你。最大的雇主是人力资源服务业。它临时性地雇用失去工作的人，他们能工作 30 天或 60 天。这是良好的经济？我不这么认为。

这在今年创下了新的纪录。我们有的是一个世纪以来最差的经济状况。

我们有的是大约 2.5% 的最缓慢的经济增长。总统所继承的增长率是 5%。我们不再有储蓄与放款协会危机了。共和党人已将支出削减了 530 亿美元，这就是预算情况看来不错的原因。在头两年，我们有一个民主党总统和一个民主党国会时，它的情况并不那么好。

莱勒：下一个问题由克林顿总统回答。先生，请。

戈德法布：我叫鲍勃·戈德法布，是一个旅游代理商。你能否解释一下你在《非歧视就业法》方面的政策？该法禁止歧视，禁止人们仅因为是男、女同性恋者而被解雇。

克林顿：我支持这个法案。这就是我的政策。我认为，任何守法、纳税，按时工作，并不违法，也没有干扰他或她的邻居的公民，都应有在我们国家工作的权利，不应该受到歧视。我支持这个法案。

现在我还有一点儿时间，我得说，我在这些问题上遭到了许多次攻击。很难理会这种攻击。多尔参议员刚才说我们的经济状况是本世纪以来最差的。可在 2 月份他还说我们有多年来最好的经济状况。在 2 月份才说过的。

我不想对这类东西以牙还牙。我可以这么做。对许多事情我可以给予针锋相对的回答。但我希望我们能谈谈将来打算做些什么。无论什么攻击也不能创造工作、教育孩子，或者为家庭谋生提供帮助。任何侮辱也不能清除有毒的垃圾堆或者为年长者提供帮助。

4 年来我们致力于后者。如果你们再给我 4 年时间，我将继续致力于这些工作。我会试着回答那些指控，但我更愿意强调对未来给出直截了当的答案，我给你们的是这种答案。

莱勒：参议员请。

多尔：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但我不赞成为任何团体制造特权。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美国，各种不同的团体可能会有特权。但我是彻底反对歧视的。我不会制订任何因生活方式或别的什么而反对雇用某人的政策。我们没有这类政策，我的办公室从来没有过这种政策。将来也不会有。但就特权而言，我反对同性婚姻，而总统稀里糊涂地就签署了它。我想回到经济计划问题上去。因为，再说一遍，我认为它很重要。如果有什么能改变美国的话，那就是使经济增长。总统继承的是良好的经济，当然，那时有储蓄与放款协会危机，人们在出售资产。最后有个共和党的国会来削减支出了，于是他能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 4 年。这不是真的。有 1200 万人破产，创下了新纪录。信用卡债务之沉重也是前所未有的。我刚才已告诉过你们制造业工作的损失情况，而且这种损失还将增加。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良好的经济计划。让私营部门去创造工作机会，它们能做到。

克林顿：如果你相信 1992 年加州的经济状况比现在好，那你就应该投鲍勃·多尔的票。为帮助经济实现转折我付出了大量的努力。我可以提供一个小小的例子。在某些国防项目被削减的圣迭戈，我们资助了圣迭戈加州大学的一个研究项目。该项目研究的是用飞机上的复合材料来建造更轻而又更坚固的大桥。这是一个大项目里包含的小项目。多尔参议员反对它。现在，这种复合材料将用于圣莫尼卡高速公路各处大桥的建造上，以将地震的影响减至最小，并创造更多的工作。这只是个小例子。在辩论结束前也许我们还能谈到一些。

莱勒：下一个问题由多尔参议员回答，由这个区域提出。是的，女士，是你。

斯特拉特戈斯：多尔参议员，我叫贝尔莎·斯特拉特戈斯，在医疗保健部门工作。今晚能在这儿向两位提问，我深感荣幸。

多尔：谢谢。

斯特拉特戈斯：关于医疗保健——在今晚，我们刚才已谈到了一些、但谈的主要是医疗补助和医疗照顾。可是私营部门遇到了问题。受管制的保健正在接管一切，尤其是在加利福尼亚州。保健的质量正因此而大幅度滑坡。有许多人在需要时得不到必需的检查，并因此而不必要地死亡。由于这些，对受管制的保健业提起的诉讼也越来越多。我认为这确实是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如果你是总统的话，你将对此做些什么？

多尔：我所做过的事情之一就是反对克林顿总统提出的由政府接管医疗保健或健康保险，这导致了 17 种新税、50 个新官僚机构和价格控制。我们这样做就是因为害怕你所提到的情况发生。每个人都会被迫采用受管制的保健。你将不能选择自己的医生，这就是结果。我认为现在我们必须回头了。我知道他们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对受管制的保健进行调查。这也许做了一部分应该做的事。但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剥夺人们的选择权，逼迫人们都采用一种类型的保健，完全取消按服务付费的原则，或是不让人们去见自己的医生，使他们不得不去见别的医生，那么美国就倒退了一大步。

我们实行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健康保险制度，我们想让它就这样保持下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反对政府接管健康保险的计划，而克林顿总统则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使它在国会获得通过。他没能成功。最终我们获得了比他更多的票数。然后他们才决定放弃。这个计划是个大错误。

不管他会不会再做努力，我已听见有些人说那应该是我们采用的模式。如果他再次当选，也许他会返回来再做努力。我希望这两件事都不会发生。在我看来，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需要予以关注的问题。你们得仔细观察。看看加利福尼亚州所有这些受管制的保健的情况。否则我们就将失去我们所拥有的世界上最好的健康保险制度。

克林顿：我只是感到很惊奇。你们当中有多少是参加受管制的保健计划的？如果参加的是受管制的保健计划，请举手。有多少人喜欢它？

多尔：两个人。

克林顿：我努力做过的事情之一，就是确保我国每一个加入受管制的保健计划的人都至少可选择 3 种计划，并且每年都有权退出而不受惩罚。这并不是由政府来接管。它近似于《家庭和医疗休假法》。它只是试图确定游戏规则而已。我强烈主张通过一个联邦法案，废除对提供服务者的限制性规定。也就是说，我认为不能仅仅因为医生告诉了病人他们需要些什么、其他的费用更贵些的保健选择有哪些，就把他赶出受管制的保健计划。

如果我们能节省资金，又能把资源管理得更好，那是件好事。如果我们省下了钱，但使人们享受不到保健，那就是件坏事。没有哪个受管制的保健提供者能限制医生，或把医生赶出受管制的保健计划，就因为他告诉病人你需要费用更贵些的检查，更贵些的治疗手段，你的健康需要它。这就是个良好的开端。

莱勒：多尔参议员请。

多尔：我对他上面所说的并无异议。我认为这样做会有所帮助。但我认为，我们想要避免的，是 1993 年时克林顿总统向我们提出的那种国有化的医

疗保险制度。如果这还不算自由派主张，那我就从没听到过自由派主张了。17种新税，价格控制，50个新官僚机构。全美国都可能碰上这种烦恼。我们需要对付受管制的保健。问题并不仅仅出现在加州。在我们访问过的其他各州也出现了。这是个全国性问题，不只是各州的问题。

莱勒：下一个问题由克林顿总统回答，由这个区域提出。是你，女士。

奥康纳：我叫科琳·奥康纳。我在位于这条路上的圣迭戈梅萨学院教历史和政治学。我想提由另一位教师提出的问题，充当那些今晚没有出席的人的代言人。

有资格投票的美国人中有63%不去投票，他们甚至不参与选举过程。有几个党甚至不能参加辩论，如绿党、改革党、自然法党，所有这些都基本上被排除在我们眼下正参加的这次活动之外。如果我们确实想把这个国家团结起来，人人都能参与，建设一个新的美国大家庭，你认为总统能做些什么来开始这一进程、使人们重新参与进来呢？

克林顿：首先，我认为使投票更方便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强烈支持《汽车选民法》。我想在美国这是件大事。如今有成百万的人因而进行了选民登记。

其次，我们要考虑使选举更方便。你也知道，现在有几个州允许人们在3个星期内投票。许多人都很忙，到投票站去投票对他们来说并不容易。

第三，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类似的论坛。这是我强烈支持竞选筹资改革的原因之一。如果你想削减竞选费用，就得开放无线电波段。因为驱使竞选费用不断上升的，正是电视、广播、报纸广告和大量邮寄信件的费用。如果使波段向这类论坛更多地开放，你就会发现，在这儿参与的就不仅仅是你了。对今晚来到这儿并提出问题的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我都可以保证，有10万名美国人说过他们也希望能提问题。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改变政治的性质。

最后一件我认为我们应当做的事，是我自从成为总统以来一直在努力做的。这就是每当我处理公共事务，我都努力使它能直接、实在地影响某位美国公民，以使人们能认识到远在华盛顿发生的事与圣迭戈街道上出现更多的警察、清理这儿的垃圾以及加州南部边境巡逻人员增加两倍之间的联系，认识到我们在那儿所做的和在这儿所做的事之间的联系。我认为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办法。

多尔：我不认为有什么完美的办法。我投身政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对某些人们不参加投票感到忧虑。我怀疑这是否能算是我们这些候选人的过错。人们说：“我才不管呢。一张选票不会有多大影响。”我能提供上百个例子——你们也许能提供200个例子来说明一张选票确实产生了影响。就我所知这在国会曾多次产生重大影响。

竞选筹资改革也许会有所帮助，印度尼西亚或其他外国的富人提供了25万美元捐助，被《洛杉矶时报》发现后又归还。在出现这种情况时，或许会有所帮助。

也许应该有更多的辩论。我愿意在这个选举年举行另一次辩论。我们可以邀请所有的候选人，谈谈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使经济增长，不减税并给人们以针对孩子的税额减免，不削减资本收益税，使经济增长，那我们就将蹒跚着走进下一个世纪。如果我们使经济增长，它将有助于社会安全计划，有助于工作，有助于一切。

克林顿：我另外提个建议吧。因为你是位教师，你能在这方面施加影响。我认为，确实令人们感到沮丧的事情之一，是政治竞选似乎总是更多地与参加竞选的政客相关，而不是与人民相关。

这就产生了一种联系。我认为我们必须做的是让人们相信，两者之间有巨大的差别。如果你这样投票，在 21 世纪就会有教育部；如果你那样投票，就会没有。如果你这样投票，你就会得到《家庭和医疗休假法》的扩展；如果你那样投票，能保住这个法案就算幸运。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人们必须做出决定。

我认为美国人也需要负责些，想想他们的生活和我们在华盛顿所做的事之间的关系。

莱勒：这个问题由多尔参议员回答。这个区域，后排。女士，请。

西弗特：我叫艾里斯·西弗特，是个失业者。

多尔：叫艾里斯？

西弗特：是的，艾里斯。多尔参议员，我们谈到了对我们这些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的社会安全计划问题。但我们不应该也为自己退休进行储蓄和投资吗？你是否打算采取什么鼓励措施，使我们在退休时能自己照顾自己而不依靠政府和社会安全计划？

多尔：我们的经济计划中有——个人退休金帐户，我们认为这将鼓励储蓄。你也可以用这些帐户支付健康保险、教育或首次购买住房的费用。我们正好在做这件事。我认为有一件事是我们迟早要考虑的，这就是社会安全计划制度。因为有许多人不把资金投入社会安全计划。对此必须十分在意，因为必须保护那些已经置身其中的人们。这是必须考虑的事。

我并不是说就要这么做了。但至少应考虑它。在我担任处理社会安全计划问题的金融委员会的主席时，我们考虑了这个问题，考虑了所有各种选择。我们必须认识到的一点，就像过去我回家时我母亲对我说的，我所拥有的只有社会安全计划，别碰它。

我们没有碰它。我们保护它。我是乐观的。你们退休时，社会安全计划仍将存在。我们将对它进行修补。这可能在 2012 或 2015 年进行。1983 年调整后我们以为可以在 75 年后再进行调整，这没能实现。时间短多了。但我们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稳住了它。3700 万至 4000 万人按时领到了支票。因此，我们需要保护这套制度，要使它更稳固。但我们也得考虑其他的选择——这取决于那是什么样的选择。实际上，现在国会已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这是个两党委员会。它将考虑向下届国会提交的所有不同的选择。所以我想我们将等待，看看他们提交的是什麼，再行考虑。

克林顿：艾里斯，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共同见解。这个国家只有约一半人享受养老金计划的好处。对许多人来说，仅靠社会安全计划不足以维持生活，或者至少不足以使他们维持以往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解决怎样使更多的人享有养老金的问题，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为小企业工作、越来越少的人为大企业工作，享有养老金的人还在减少。因此，我的计划要使更多的人有资格在个人退休金帐户中进行储蓄，已婚的夫妇可以多储蓄一些。以后需要时他们可以免税提取这笔钱，用于支付紧急医疗、购买住宅或教育费用，当然也用于补充退休后的用度。在这一点上，多尔参议员的计划和我的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此外，我们刚通过了一项普遍的企业改革法案，它使小企业主可以更容

易地为自己和雇员取得享受 401 (K) 计划的权利，并使雇员更容易带着它更换工作。我的一位自小学起的最好的朋友是一位计算机软件推销员。他告诉我，在前一次更换工作时，他花了 9 个月的时间来弄清怎样把他的 401 (K) 计划转过去。现在这种情况再也不会发生了。我希望在以后的 10 年里你们将能看到，享受养老金计划的人的比例会大大增加，还会有一个安全的社会安全计划系统。

多尔：你是不是说过你是失业者？

西弗特：是的。

多尔：那么，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使你得到一个工作。这样我们就又回到经济计划上来了。创造工作和机会。降低资本收益税。进行改革以减少管制。制止某些无意义的官司，让美国的人们能够工作。我认为，这些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社会安全计划显然是很重要的项目，它应当——也将会得到保护。不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的这个计划，都将得到保护。我们必须保护那些已置身其中的人，就像我们在 1983 年所做的那样。而且我们将在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去做。我们使它超越了政治。人民对政治已十分厌倦。对医疗照顾我们也应当这样做。今晚我们或许能就此达成一个协议。

莱勒：好。这个问题由克林顿总统来回答。这个区域中有谁提关于外交事务的问题吗？先生，请。

史密斯：晚上好。我叫迈克尔·史密斯，是海军的电子技师。我的问题是：你打算怎样处理与日本的贸易赤字？

克林顿：让我告诉你我们都做了些什么。目前，我们已与日本达成了 21 项——很快会有第 22 项——贸易协议。由于我们所做的工作，在已达成协议领域，过去 4 年里与日本的贸易合同或对日出口已上升了 85%，我们与日本的贸易赤字已经减少。

直到 5 个月前，日本的经济仍处于严重萧条之中。如今它正在复苏。他们将能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我想贸易赤字将进一步减少。

这是我们所做的工作中取得真正成功的例证之一。我们第一次从加利福尼亚向日本出售了大米。

我参观过东京的一家克莱斯勒销售公司。我参观过设于俄亥俄州托莱多的一家吉普车厂，今年他们要出口 41000 辆右驾吉普车，因此而增加了 700 个新工作。

和传统上更开放的经济相比，与传统上较封闭的经济打交道更困难些。你得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

我们已原则上就保险业问题达成协议，现在仍在致力于在其他三、四个领域取得进展，但要做这件事，你得保证自己具有竞争力。如今我们是最具竞争力的国家，正致力于打开那些市场，努力销售产品，我们的贸易代表、商务部长和政府中其他所有的人都在为此而努力。

多尔：最重要的是我们别再出口我们的工作。35.7 万个好工作——制造业的工作已经丧失。我认为这与我们的贸易伙伴有部分的关系。我们无法进入他们的市场。我们应该坚持进入市场。如果我们不能像他们进入我们的市场那样进入他们的市场，我们就应该说：“等等。够了。时间到。如果你们让我们进入，我们就让你们进入。”

大家都知道，很难进入日本市场。他们想进入我们的市场。他们在这儿出售大量的汽车，创造出大量的工作——是那种销售进口产品的工作。这对

经济十分重要，我想我们得弄清楚。

我支持总统的贸易政策。但我们应当更具进取性。一旦制订了政策，那你就得为此努力，更具进取性地执行这种政策。因为美国的工作机会正在丧失。

这就是罗斯·佩罗所抱怨的。我要对改革党说，看看共和党吧。我们是改革的党，我们要把事情做得更好。而其中之一就是停止出口美国的工作。

克林顿：让我再说一遍，过去4年里我们已签订了200多个不同的贸易协议。这一数字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不仅仅是你们知道的那些大的，还有许多小的。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集中精力于那些我们真正擅长的事，并确保进行公平交易。我们刚与中国发生过相当严重的争执，因为他们复制我们的CD，使像加州这样的地方的工作遭受损失。因此我们已经——就像我们说过的，如果你想继续在这儿做生意和销售你们的产品，你们就必须停止对我们的CD进行盗版。他们同意采取措施，并证明他们已经这样做了，使这一问题有了很大好转。

对此并不存在简单的答案。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你得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处理，确保我们进行的不但是自由贸易，而且是公平贸易。我们在这方面的处境已比4年前更好，我为此感到自豪。

莱勒：下一个问题由多尔参议员回答——由这儿提出。先生，请。

凯特：我叫罗德·凯特，是牧师。

多尔：你好，罗德。

凯特：这个伟大的国家是由立国之父们创建的。他们对上帝的原则怀有十分虔诚的信仰。

如果当选为美国总统，你将怎样使这个国家回到这些基本原则上去？此外，你是否认为总统——居总统职位者有责任树立榜样以激励我们的年轻人？

多尔：毫无疑问，我们的立国之父们有着非凡的智慧。除你所提到的之外，他们还对这个在华盛顿的全能的中央政府感到忧虑。那实际上会剥夺你的财产。我随身带着第10条修正案，我不能把它拿出来，否则就犯规了。它提出应把权力还给各州和人民，这儿的人民。

你得做出更多的决定。荣誉、职责和国家，这就是美国的意义所在。

身居世界上最高、最重要的职位，美国总统当然有责任为年轻人，就像我们以前谈到的那样，树立榜样，为所有人树立榜样。

在公共道德方面，他是有责任的。如果你的政府中有30多个人，或者离开，或者受到调查，或者被投入监狱，或者出了别的什么事，那你就有道德问题了。这是公共道德，我谈的不是个人道德。如果有900份档案被酒吧保安之类的人收集起来，并雇用一名安全官员去接收，那就是公共道德问题。在水门事件中我认识一个人，他就因为看了一份档案、一份联邦调查局的档案而进了监狱。被白宫扣押的档案达900份。是像你们这样的人的档案。他们为什么要查看你们的档案？总统要负很大的责任。对此我是这样理解的，也将这样做。

克林顿：这是个有史以来最富宗教精神的、伟大的国家。然而，有趣的是，在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我们又有着最大的宗教自由，这包括不信教的自由。

洛杉矶县就在这条路上，它有众多的人口；我们有来自 150 个不同民族和种族团体的人，以及大量的宗教教派。但是，每一种宗教的基本原则实际上都是一样的，我努力执行的是支持尊重宗教的政策，并帮助父母们把那些价值观传播给他们的孩子。让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签署《恢复宗教自由法》的时刻是我最感自豪的时刻之一。它规定政府必须极力避免干涉宗教信仰。因此我改变了司法部的决定，让一所教堂偿还一个叫泰德的人，因为在捐献时他已经破产了。我支持在我们的学校进行性格教育项目，支持无毒品学校项目。我支持为父母们提供用于电视的 V—芯片，以使他们在不愿让年幼的孩子看他们不该看的东西时，他们能不让孩子看到。

这正是我们要做的，即给像你这样的人和我们的家庭以把那些价值观传授给我们的孩子的权利。

多尔：我认为——进来之前，我和妻子、女儿进行了祈祷。因为不管发生了什么，这是上帝的意愿。它是上帝的意愿，它就将发生。按我的看法，为学校的自愿祈祷者制订一条宪法修正案是个非常好的想法。我支持，总统反对。

在我看来，不管是哪一位总统，这都是他最大的责任之一。人们对美国总统的期望比对美国其他任何人的期望都更高。过去总是这样，将来也会是这样。

莱勒：好。这是最后一个问题，由克林顿总统回答，由这个区域提出。女士，请。

杜布：我叫伊薇特·杜布，也是个牧师。我属于大都会统一派教会。

克林顿总统，也许今晚你能帮我解决个问题。我好几次听到多尔先生说“我们大家一起”，但当他被问及是否支持男、女同性恋者的平等权利和平等就业时，你说你支持，而他说他不相信特权。我想这是个有关所有人的平等权利的问题。我不明白为什么当问题是“平等权利”时，为什么有人要用“特权”这个词。

你能帮助我理解这一问题吗？

克林顿：我要回答你的问题，但让我先谈谈别的事。我们不需要一个让孩子祈祷的宪法修正案。我所做的，是让司法部和教育部第一次对美国的每一所学校发布了一套指导原则，指出当孩子们进行宗教活动，当他们祈祷或做任何宪法允许范围内的事时，不能仅仅因为他们身处公立学校就对他们进行干预。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这方面经历的人都会告诉你，在表明人们在包括公立学校在内的公共场合享有宗教自由方面，本届政府比多年来的任何一届政府做的工作都多。

现在，我觉得应该让多尔参议员自己来说明你所提出的问题，让我来说是不公平的。我将就此结束——我的意思是，这是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努力使你高兴的话，就会使辩论本身的性质偏离。我来谈谈我的感受吧。

在我们国家存在许多分歧，我们当中的某些人觉得其他人的决定是错误的、甚至是不道德的。但根据我们的宪法，只要按时到岗，并遵守法律，努力工作，做应该做的事，你就有权要求得到公平的待遇。我们的制度就是这样运转的。

在世界各地，人们陷入了分裂——波斯尼亚、中东、北爱尔兰、卢旺达和布隆迪——你可以一一列举出来，就因为他们之间的分歧。我们中间也存在着某些类似的敌视情绪。从教堂的焚烧中就可以看到这些。我尽最大努力

去做的事之一，就是告诉美国人民我们必须超越这些。我们必须明白，当我们团结起来共享价值观而不是被分歧所隔开时，我们才能更强大。

莱勒：多尔参议员请。

多尔：我希望我已经把我的观点表达清楚了。我说过我反对歧视。你也知道，我们的残疾人曾遭受歧视，而残疾人口多达 4300 万。我还能回忆起人们宁愿到街道另一边去也不与坐轮椅的人碰面的例子。因此我们要结束歧视。我想这本身就是回答。在美国不应存在歧视。我们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要说，对我来说似乎就应该是这样的。我们不应歧视——不应对种族、肤色或别的如生活方式、残疾等进行歧视。这才是美国。我们都为此而自豪。但我们并未完全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的是能带领我们进入下一个世纪的优秀的、强有力的领导。

没有人提出外交政策问题，我对此感到很遗憾。因为就在本星期，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说：“在外交政策方面，多年来我们确实对总统夫妇知之甚少。”这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承认。这进一步证实了我在哈特福德辩论中所指出的，即这届政府实际上没有外交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其政策是应付式的政策，也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幸的是，在这方面并没有人提出更多的问题。

克林顿：让我再说一遍，对总统来说，最重要的责任莫过于指出，如果你坚信我们的《宪法》、《权利法案》和《独立宣言》，你就可以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和我们一起走上通向 21 世纪的桥梁。我们只要知道这个就行了。如果我们一味恶意地互相攻击，我们就没有尽到责任。这不会创造工作，也不能教育孩子。这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需要坦诚地表达观点的分歧，讨论未来。如果我们能战胜困扰着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这些分歧，未来将成为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时期。

莱勒：好。现在请发表结束致辞。多尔参议员，你先请。时间是两分钟。

多尔：我要谢谢来到这所大学的每一个人，并谢谢你，吉姆。谢谢所有可能仍在收看的人们。这才是这次选举的意义所在。这不是我的选举，也不是克林顿总统的选举。这是有关这一过程的选举。它要选出一位美国总统。我们有分歧，我们应该有分歧。有人提到了其他党派。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同的观点。否则我们都认为这会是个相当无趣的地方。我们应当进行更多的辩论。也许我们可以就经济问题再进行一次辩论。

但我只想这些。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耀。想想看，我来自堪萨斯的拉塞尔，在廉价公寓中长大，父母没有上完中学，二战后在医院呆了 39 个月，每天得用纽扣钩才能穿戴整齐。我明白，真正的美国人有着实际的问题，不管是谁，生活无靠的母亲、单身父亲或母亲、家庭、年长者还是身有残疾的人，都有实际的问题。

在这场竞选活动中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克林顿总统反对限定国会议员任期，反对平衡预算的宪法修正案，他还反对有关自愿祈祷的修正案，反对保护美国国旗的修正案。人民为国旗而献身。这儿有许多军人。他们做出牺牲，为美国奉献了一切。我们应该以宪法修正案来保护美国国旗。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关注经济状况。我的时间快用完了。这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光荣的时刻。我要求选民们做出的是一个决定。我希望他们在几年之后会为他们投出的选票而自豪，为他们满怀希望地投了我一票而感到自豪。我对你们

只做一项承诺，我说话算数。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说鲍勃·多尔的话是算数的。我信守诺言。我向你们保证，经济状况将会变得更好。我们将有一个很好的经济计划。进入下一个世纪时，美国将更美好。谢谢大家。

克林顿：谢谢，吉姆。谢谢你们，女士们先生们，以及所有收听、收看的人们。我想说，有一点我同意多尔参议员所说的：在一个国家，象我们俩这样，一个出生于堪萨斯的拉塞尔，一个出生于阿肯色的霍普，由寡母抚养长大，最终能竞选总统，能有机会作为总统来为大家服务。我首先要说的，是谢谢你们使我有机会成为总统。这次选举与我们应怎样进入 21 世纪的不同设想有关。我相信，共同努力，互相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以使我们天赋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是这能使我们过得更好，还是说“各干各的”能让我们过得更好？是共同建设那座通向未来之桥、使我们大家都由它走向未来能使我们过得更好，还是说“你自己走吧”会使我们过得更好？如果你们不同意——今晚离开时请带走一切，只把这个留下。如果收看辩论的人没有留下，我希望你们留下。这是一次真正重要的选举。在我们如何工作，如何生活，如何彼此联系方面，这个世界已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巨大的变化。我们所做的决定将会有重大的实际影响。

所以今晚我们讨论了有关我们的责任问题。我想谈谈你们的责任。你们的责任就是参加 11 月 5 日的投票。因为你们将决定现在我们是否要平衡预算，但又保护医疗照顾、医疗补助、教育和环境。你们将决定，我们是否要继续通过《布雷迪法案》来与犯罪做斗争，并完成部署 10 万名警察的工作，是否要对家庭提供更多的保护，使他们的孩子免遭毒品、烟草、帮派和枪支之害，是否要为我们的孩子提供世界级的教育，让每一个 8 岁的孩子都能阅读，每个 12 岁的孩子都能登录互联网络，每个 18 岁的孩子都能上大学。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些，我们就能建起那座通向 21 世纪的桥梁，这个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将会更加伟大。

谢谢大家。

莱勒：谢谢，参议员。谢谢，总统先生。就此结束——1996 年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一共 3 次，这是最后一次。

译者后记

1996年8月，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大党先后在加州南部的圣迭戈市和北方密歇根湖畔的芝加哥市召开了全国党代表大会，美国大选由此进入高潮。正当此时，著名的兰登书屋于8月14日宣布，其所属的《时代》图书出版公司将在一周内推出克林顿总统的新著《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21世纪对美国的挑战》。一时间《今日美国报》、《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全国性大报纷纷予以报道，使紧锣密鼓进行着的两党选举又增加了一些热度。

从3月开始直到11月5日选举投票这一天，克林顿一直在各种民意测验中领先于主要对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多尔10到20个百分点，并在最后顺利蝉联总统宝座。《希望与历史之间》一书的出版，扩大了其政治观点和政策主张在选民中的影响，无疑有助于巩固克林顿当时的领先地位。

现在，1996年美国总统角逐战的硝烟已散，比尔·克林顿正在为1997年1月20日正式进入他的第二届总统任期做准备。我们中国读者此时来看克林顿新著，主要的意义有如下4个方面：第一，通过阅读此书对美国的选举政治有所了解；第二，增加对克林顿本人及其代表的“婴儿潮”一代人的政治性格的了解；第三，比较全面地把握克林顿总统的政治哲学观点、他对21世纪美国的展望、他管理国家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第四，考察克林顿第二任期的主要政策思路。

虽然白宫新闻主任唐·贝尔和兰登书屋女发言人玛丽·贝·罗奇否认克林顿著作的出版是一种竞选行为，但是从各方面看，《希望与历史之间》一书却是一本标准的竞选政治读物。近年来美国兴起了政治读物出版热，头面政治人物争相著书立说，显示自己的学识，宣传自己的主张。在共和党方面，黑人将军鲍威尔、众议院议长金里奇、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迪克·阿米等人于1995年出版了政治著作，1996年则有多尔与夫人伊丽莎白合著的《多尔一家：全面的伙伴》一书问世。克林顿和民主党方面自然不甘人后，在1992年大选中他就与竞选搭档戈尔合著了《人民第一》。此后，第一夫人希拉里出版了关于儿童教育的《全村人的心血》一书，副总统戈尔出版了关于改革政府结构的《重建政府》一书。

《希望与历史之间》体现了美国政治读物的一些共同特征。首先，罗列政绩，攻击对手。克林顿不厌其烦地反复提醒选民注意他过去4年的政绩，诸如财政赤字由2900亿美元降至1170亿，增加了1000万就业机会，使100多万人由依赖福利走向工作自立，犯罪率大幅度下降等等，这是全书重复率最高的部分。同时，不失时机地频频攻击共和党对手，称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极端主张迫使政府两度关门，“伤害了許多人”；多尔的预算计划会损害医疗照顾、医疗补助、教育和环境等等。其次，高扬普遍正义和理想主义大旗，为特定的政治目标进行辩护和申论。对于政治人物来说，最主要的任务总是确定能获得尽可能多的人们内心赞同的目标。目标是代表一定利益的，然而目标的确立又不能仅仅诉诸于利益，因为利益永远是多元的、相互冲突的、狭窄的，所以必须给目标披上普遍价值的外衣，给它提供某种道德基础。读者可以注意到。（希望与历史之间）一书充满了“自由”、“民主”、“机会平等”和“立国之父的理想”等等字眼。所有美国政治读物都竭力显示理解民间疾苦和人民心声，以一种平等的姿态与读者交流。克林顿一再声明，

这本新著是几年来他“与美国人民关于国家命运对话的继续”。一般不敢把自己摆到“教师”的位置，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来“教育”读者。另外，为了与尽可能多的人交流、沟通，美国的政治读物文风活泼，词藻华美流畅，同时又通俗易懂。

在宣布出版克林顿新著之前，美国新闻界毫不知情，此事堪称白宫保守得最好的秘密之一，著作的出版有出奇不意的效果。此外，宣布消息的8月14日正是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第三天，这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共和党全会的新闻冲击波。为了避免政治麻烦和促进销售，克林顿放弃了市价达100万美元的稿酬，条件是出版商必须一次印刷40万册精装硬皮书，并以每本16.95美元的较低价格推向市场。整个出版策划实际上是一次精心考虑、极为成功的竞选战术行动，必定出自竞选专业人士之手。这里顺便就要说一说美国选举的“专业化”问题。

美国是世界上选举最多的国家，有50多万个公职是选举产生的。选举是美国公民参与政治的主要环节，是美国人引以为骄傲的“美国式民主”的核心内容。但是，美国人自己也承认，其选举过程存在大量的“漏洞”，诸如金钱作用过大、侧重于攻击对方阴暗面的消极竞选泛滥、新闻媒介的误导、投票率过低等等。另外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竞选越来越专业化，这也是战后以来美国选举制度演变的一个重要方面。选举的专业化有两种表现：第一，政治咨询行业日趋发达，成为欣欣向荣的“朝阳产业”；竞选专家的作用突出，报酬越来越丰厚。候选人现在不是依靠政党，而是主要依靠专家来确立竞选战略，即如何争取选民，提出哪些主张，如何筹措经费，如何最有效地分配资源（怎样做广告、怎样揭露对手、怎样包装自己等等）。这些专家的工作被人戏称为“出售候选人”。他们不受党派约束，谁给钱就为谁服务。今年最出风头的竞选专家是迪克·莫里斯。他过去为共和党帮过忙，今年则成了克林顿的高参。第二，民意测验的作用越来越显著。民意测验本质上讲是反映舆论的渠道，但是现在往往被专家们用来为各自的竞选目的服务，从而成为反过来影响舆论的工具。

竞选活动专业化是现代社会中的必然趋势。它带来的后果之一是传统政党作用的下降，这是美国政党衰落的一个原因。它对选举制度的损害主要在于，通过对选民的诱导和对候选人的包装，使得选举过程不再是选民意志的自由表达，而是“受到诱导的、不由自主的选民”的自由投票。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60年代初是美国人口生育的高峰期，这一时期出生的人们被称为“婴儿潮”一代，克林顿就是这一代人中最突出的代表。与1992年大选一样，今年的总统选举不仅是两党之争，而且是代际之争，是“婴儿潮”一代人与布什和多尔代表的二战士兵一代人之争。克林顿的胜利象征着美国的政治权力由上一代人向年轻一代的转移。这可能是当今美国政治中最有深远意义的演变。

1946年8月19日，威廉·杰斐逊·克林顿出生于阿肯色州的霍普山城。霍普的英文是“Hope”，为“希望”之意，阶以后来克林顿的支持者常常称他为“来自希望之城的人”。

克林顿的幼年家境非常不幸。生父布莱恩在他出生前3个月遭车祸而亡。继父罗杰·克林顿酗酒成性，导致家庭不和。这种经历养成了克林顿忍耐自制、善于竞争、极有主见的性格。依靠个人奋斗、勤学苦读，克林顿争取到了良好的轨育机会。1964年秋，他进入首都华盛顿的乔治敦大学主修国

际政治专业；毕业后他成为著名的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深造两年；1971年进入那鲁大学法学院，两年后获法学博士学位。在大学求学期间，克林顿积极参加了反越战的学生运动，避开了服兵役的义务，并在1970年初去过一趟莫斯科。这既使他在政治上早熟，又留下了日后引发政治争议的隐患，并给他的青年时代打上了自由派的烙印。

离开耶鲁后，克林顿回到家乡阿肯色州，在这里开始了其政治生涯。1974年，他尚未满28岁，就正式投入竞选国会众议员，初试身手即有声有色，给对手造成极大威胁。虽然竞选失败，但是他的政治才华得到新闻界和政界的肯定，获得了“政治神童”的称号。1976年克林顿赢得州司法部长职位的选举；1978年角逐州长宝座获得成功，这位32岁的民主党人成了阿肯色州历史上最年轻的州长；1980年在州长选举中败于共和党人，但两年后他即卷土重来，由此获得“打不败的小子”的绰号；此后，他一直掌握州长职位，直到1993年1月正式入主白宫。

从克林顿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婴儿潮”一代积极追求“成功”，并且善于获得成功的一面。从《希望与历史之间》一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代人的其他政治特征，包括：第一，他们是第一批在电视时代成长起来的人，懂得舆论的力量，了解舆论的作用。这可以从克林顿本人对其新著的精雕细琢中体现出来。第二，这一代人经历过理想主义激情的震荡。感受过约翰·肯尼迪的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为你作了什么，而要问你自己为你的国家作了什么”的鼓舞，在克林顿的著作中人们仍然可以感受到这种理想的冲动。他把现在称为“充满可能性的时代”，呼吁人们“要拥抱未来”，指出：“历史常常要求美国作出选择，使希望战胜恐惧，使崇高意愿战胜消极倾向。”当然，对于同一代人中的失败者而言，他们更多的则是理想破灭之后的玩世不恭，这是在他们当中出现“嬉皮士”、“雅皮士”现象的原因。而这一面在克林顿的充满乐观主义基调的著作中是看不出来的。第三，他们比前人更具有现代感，其关注焦点比较新颖。《希望与历史之间》反复强调了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强调人类对自然的责任；另外，对信息时代和网络的作用该书也有切实的描述。这都是不同于老一代政治人物的特点。

在“机会”、“责任”和“社区”3章中，克林顿对他们所谓的“两种错误论调”进行了不断的抨击。一种是民主党的传统主张，要求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全面干预，“政府应该花更多的钱”；另一种是共和党的一贯主张，认为“政府从来就是不好的，只要摆脱政府，让人们自己照顾自己，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克林顿主张的是一种“中间道路”的政治哲学观。

自30年代初的“新政”以来，美国出现两种对立的政策思想。一派是民主党自由派的主张，他们奉行凯恩斯主义，主张扩大政府，由政府出面对国民经济进行干预，对社会生活中的弱势团体（穷人、少数种族、妇女等等）进行扶持，以强行实现相对的平等。这一派的主张在70年代以前属美国政坛的主流思潮。另一派的代表是共和党保守派，他们反对政府干预，主张由市场竞争的“看不见的手”来自发地调节经济和社会生活。他们的主张更接近于“新政”以前美国社会的传统思想。另外，他们更坚持传统的宗教观和家庭价值，对犯罪问题、吸毒问题、自由选择堕胎问题等更不宽容。80年代以来，随着“保守派旗手”里根的当政，共和党这一派的主张逐渐占据了上风。

从90年代初开始，克林顿强调自己是“新民主党人”，他从上述两派的思想中都吸取了一些东西，又都扬弃了一些东西。从《希望与历史之间》一

书看，克林顿的“新民主党人观”更成型了。一方面，他声称“大政府时代已经结束”；他为自己裁减 22.5 万联邦雇员、废除 1.6 万页的规章条文和削减近 200 个项目等成就感到骄傲，表示“我们没有在精简人员上止步”；他要求巩固家庭，严厉对付犯罪，承认“政府在非常个人化的事务中几乎不能起什么作用”，等等，从而与民主党的传统主张拉开了距离。另一方面，他反对放弃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责任，指出“不该回到各自为战的年代”，“市场确实是了不起的，然而市场（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中）并不能给我们安全的街道、清洁的环境、平等的教育机会、贫穷婴孩的健康孕育以及健康而可靠的晚年”，从而又与共和党划开了界线。

由于多数美国选民属于中间派，因此克林顿政治主张上的“中间特征”对他获得选民支持是有利的。这是他在总统大选中两战皆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政治观点的中间性质还使克林顿的立场很容易在两派之间移动、转换，而不会有大的思想障碍。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常常要批评他立场缺乏一贯性、变化太快、过于实用主义的原因所在。

在克林顿的未来政策走向方面，连续性大于变革性。很明显的一点是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分量仍然远远高于外交事务，《希望与历史之间》一书讨论的重点依然是国内事务。这是由冷战后的大格局决定的。随着外来威胁的消失，国内问题将始终占据首要位置。无论由谁当政，这一点都不会改变。

在国内事务的轻重安排上，现在的次序是：平衡预算、减税、改进教育质量、改革福利制度与医疗保险制度。这与克林顿第一届任期有所不同，当时的次序是：刺激经济增长、全面改革医疗保险制度、平衡预算和教育改革，等等。

不过，与上届任期相比，克林顿对外交政策的重视程度还是有所增加的。在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方面，他的决心更大了，他强调要“通过保持为世界和平。自由与繁荣所必需的最强大的力量，来确保美国获得持久的安全”。他在书中严斥了孤立主义的论调，声称“我们能成为世界和平缔造者”。

克林顿确立的第二任期美国对外政策目标将依然是安全、经济和推进民主 3 大支柱。不过，综观《希望与历史之间》全书，对安全问题的强调更加突出，而关于民主和人权的议论其分量比以前小。

具体说来，克林顿未来的对外经贸政策变化不大，其原则仍然既拒绝保护主义，又不会更靠近自由贸易，而是追求“公平规则下的公平贸易”。克林顿在书中津津乐道于这些事实：过去 4 年美国与贸易伙伴签订了近 200 份贸易协定，为美国产品打开了不少国外市场的大门。其中与日本的协议达 21 项，对日出口增加了 85%。显然，他对其经贸政策是满意的。

在对外政治和战略关系方面变化会大一些，主要包括：第一，坚决实现北约东扩，同时尽可能维持与俄罗斯的合作关系；第二，更加重视亚太地区；第三，注重防止核扩散、恐怖主义等所谓“新威胁”。

克林顿新著于 8 月底问世后，曾连续十几周被《纽约时报书评》列入畅销书排行榜。尽管排行榜只是说明了市场的反应，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本书的确值得一读。这是我们坚持把它翻译出来的原因。

翻译分工如下：金灿荣翻译了序言、前言和第一场总统候选人辩论词；邱君翻译了第一章、结语和谢辞；张立平翻译了第二章和副总统候选人辩论词；王荣军翻译了第三章和第一场总统候选人辩论词；最后由金灿荣进行了统校。

由于水平所限，译文中肯定还有不当之处，欢迎读者不吝赐教。

金灿荣

1996年12月于北京

